

證言2·28

葉芸芸編・寫/戴國輝序



人間出版社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歡迎查詢與借閱

台灣大學圖書館



1676490

證言2·28

葉芸芸編·寫／戴國輝序



人間出版社

85.5 言辭

葉芸芸 / 蘇新



人間出版

〈序〉

以客觀、理性的學術立場

看二·二八

目錄

戴國輝 / 以客觀·理性的學術立場看二二八 3

陳映真 / 最好的燔祭 9

■ 第一部：證言篇

何昉錄音·整理 / 楊遠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後 14

周夢江 / 我所知道的謝雪紅 23

葉芸芸 / 二·二八事變中的謝雪紅 33

——訪周明談謝雪紅·「二七部隊」·

吳振武和鍾逸人

蘇新 / 王添灯先生事略 41

蘇新遺稿 / 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61

何昉訪問整理 / 周明談二·二八 70

吳克泰 / 二·二八事件親歷記 81

葉芸芸 / 二·二八事件和台北學生 89

——訪葉紀東先生

葉芸芸 / 三位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回憶 94

——訪吳克泰、蔡子民、周青

葉芸芸 / 「山水亭」舊事 109

——陳逸松談二·二八前後的

蘇新、林日高、李友邦、林添丁

和呂赫若

葉芸芸 / 歷史的提示 119

——訪台灣先行代體育家林朝權

陳碧笙 / 參加台灣旅京滬十團體記略 131

——赴台調查「二·二八」事變經過

林憲、戴國輝對談 / 二·二八的前前後後與丘念台 136

目錄

曾重郎／懷念竹中辛志平校長 149

——紀念台灣二·二八事件四週年

葉芸芸／L氏的回憶：二月事件的台中市 155

陳開元／二·二八在台南 162

■ 第二部：見證篇

周夢江／二·二八事變見聞記 167

✓王思翔／二·二八縱橫談 176

——一個外省人的反思

錢歌川／四十年前的台灣零憶 184

丁名楠／二·二八事件親歷·見聞雜記 190

——兼及陳儀的評價

■ 第三部研究篇

許登源／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經濟 204 ✓

陳玉璽／歷史傷痕40年 223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

李哲夫／不要替歷史戴面具 234

——評對「二·二八」史實的歪曲

葉芸芸／是個結束，也是個開始 243 ✓

——主辦二·二八紀念會的一些感想

葉芸芸／後記 248

《序》

以客觀、理性的學術立場 看二·二八

撰文／戴國輝

九八三年春夏之交，我正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訪問研究期間，葉芸芸小姐爲了籌辦『台灣與世界』月刊，特地到柏克萊來看我。

雖然，我早就認識葉小姐的尊翁葉榮鐘先生，但我不曾聽過葉家還有一能文善墨、且有熱情辦雜誌的小姐。

相聚一談，我發現她對台灣史、特別是日據末期、光復初期的史實相當熟悉，對台灣史的社會科學層次的認知寬廣且高深，頗與一般台籍同鄉有異，使我甚爲驚奇，同時也非常高興。

我向她強調了三點：(一)刊物的立場要超然；(二)編輯同仁本身，須要建構有自我提昇、培養連帶感之共識，以資推展業務；(三)堅持堅韌的持續性而奮發圖強，以期突破當前僑界在每外所發行，以「台灣問題」爲主題之雜誌的水平。而我願意在學術方面對這份雜誌貢獻出一些棉力。

當天，我還很具體地建議她開闢一個專欄，整理有關二·二八事變的資料和史料。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變，對光復以後的台灣歷史是非常重要的。自發生事變以來，已超過三十五載於茲，台灣的政局雖不斷地「與時推移」，但言論自由及學術研究自由之尺度卻未見相應向前放寬。有關言及二·

二八事變之禁想仍然存在。

過去談「二·二八」，均屬情緒性的或政治掛帥性的「偏頗」之類，始終難於找出具有理性、客觀、公正的討論，更談不上社會科學層次的學術研究。

事變的發生，誠然的是一場人間悲劇。長年累月延續著的影響，不但無以告慰無辜被犧牲的、不分省籍的孤魂及遺族，更是難以真正癒合因「二·二八」引發的省籍矛盾及傷痕。倘若放置這個創傷，不讓人言及、研討或研究，將會成為威脅今後台灣社會安寧之「火種」。

我對『台灣與世界』這樣一份超然的刊物的出現，寄予甚大的期待，因而建議要把二·二八事變的資料和史料做客觀的介紹及注解，以便提示台灣當代史研究的「範例」與「刺激」，並企圖為將來的學術研究做初步性的準備。

歷來對待二·二八事變，已有幾種特定的政治掛帥立場：一個是傾向台灣獨立的立場；一個是國府的立場；另一個是中共的立場。一般而言，這幾種立場都甚少沉默大眾的聲音，仍然是「各取所需」，以個自堅定的政治掛帥立場來解釋、甚至於利用這一段歷史悲劇，形成一場學術界人士難於介入的泛政治屬性的爭論。

從研究歷史科學的觀點來省察，對這段歷史的整理與解釋，若先有了政治掛帥立場，而不經過調查研究（包括資料和史料的批判性整理），終局將只是把「歷史」扭成現實政治的短暫性利害之爭。

筆者對於長期來只依據禁忌來覆蓋歷史創傷的鴛鴦心態及政策一直主張不便苟同。它不但連治標都達不到，遑論治本，將讓「歷史陰影」繼續延續甚至於累積成「民怨」而為禍根。

另一方面，我亦不贊成部分台籍同鄉藉已往之禁忌和壓抑

而形成並籠罩在許多有關人士心中的這一道神秘的歷史陰影，來大作政治性煽動蠱惑文章，甚至於將欠缺純真內涵、懷有情緒性的一類「道德」批判，轉變為政客型之政治的訴求，以為製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的手段，來達到政客自己所意圖的政治目的。這一類作法無異是報復主義的顯現，只能延續悲劇性的惡循環而已，無法達到療傷止痛、以及吸取歷史教訓之境界。

只有站在正義、公正、不偏不倚之客觀理性的學術立場上來對待及研究二·二八事變的全貌，才能接近事變之真相；才能有效地撫平歷史性的創傷，以便經吸收其悲劇性負面經驗而轉變為正面的歷史殷鑑。

作為研究二·二八事變的前提所需，『台灣與世界』月刊一方面搜集整理資料和史料在專欄上刊登，另一方面，葉小姐十分擅於利用她父執輩的人脈，多年來在台灣、大陸、日本、美國各地採訪，累積了很多有關事變的見證人之發言及見證記錄，為了學術研究，做了非常紮實的準備工作。她默默地堅持這一項辛苦的工作，實在難能可貴。

我很高興看到如今這些「見證記錄」結集出版，這本集子最可貴的特色是，葉小姐並不依據政治立場來選擇採訪對象，而是透過個人私誼，尤其是她的父親的人際關係所搜集的見證記錄。當然，見證記錄不完全等同於歷史真相，也不等於說葉小姐肯定所有見證人的看法。我相信，葉小姐的真正意願是：為了更開放，更民主，更科學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元的聲音及資料而已。

作為一個歷史學術研工作者，我感激並感謝葉小姐多年的努力。她的確為理性的，公正的，正義的、科學的二·二八事變研究，打下了必要的前題性的基礎。這是把二·二八事變歸

還歷史真面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很大的成就。因此，我是樂於給這本見證集寫這篇序的。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

於日本·梅苑 戴國煒

最好的燔祭

——代序

撰文／陳映真

近幾年來，在台灣進行著有計劃、有組織地把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二·二八事件」）和台灣獨立運動聯繫起來的大量輿論和「學術」工作。

然而，歷史地看來，二·二八事變中的「兩個戰線」，即台北和各地方「處委會」的政治鬥爭，以及以台中地區為焦點的武裝鬥爭中所遺留下來的文件、政治檄文、口號和至今倖存者的證言和見證，都清楚說明這不幸的事變和事變潰挫以後由廖文毅在日本東京麥帥的盟軍總部翼護下開始發展的台灣獨立運動，其實是毫無關係的。

最早把毫無關聯的二·二八事變和台灣獨立運動硬生生地牽扯在一起的，恐怕竟而是國民黨陳儀當局。基調上是台灣民衆反法西斯獨裁、反內戰、反殘酷掠奪的民主化鬥爭的二月事件，在遭到血腥鎮壓之後，陳儀國民黨當局隨即將事變定性為因「奸（共）黨陰謀」、「台民受日本奴化教育過重」，從而陰謀獨立於祖國之外的叛亂行爲。

五〇年代以後在東京；六〇年代末起在北美；八〇年代起在島內的台灣獨立運動，把國民黨對二月事件的污辱性的裁誣，當做光榮的黃袍，往自己的身上披著不放，至今尤烈。

但是不論是帽子或者是黃袍，畢竟都是虛構的東西。四十年來，一方面是屠夫用盡心思湮滅和誣蟻這一段悲傷的歷史；另一方面是一些和這個悲劇的歷史毫無直接行動、組織和事實

上的關係的人們，却忙著把那無聲的、悲愴的血漬往自己的西裝上塗抹，當做光榮的勳章，炫耀世人……却使事實上美國曾經利用二月事變分裂中國民族的歷史事實，巧妙地隱遁，使美國至今得以裝著一幅事不干己的姿態，逃避了歷史的偵訊。

據蘇新在「王添燈先生事略」（本書40頁）中說，當時台北美國新聞處的喬治·柯爾（George Kerr）曾經專門下了請帖，請王添燈和幾個台北仕紳喝茶相敘。王到會後，發現是一個談論台灣獨立的「茶會」，愛國主義者王添燈遂拂袖而去。目前滯居大陸的蔡子民也做這證言：喬治·柯爾在二·二八事變中對台灣人說，如果台灣人需要武器，只要說一聲，美國可以立刻從馬尼拉運來…（「三位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回憶」，本書第93頁）

據美國紐約聖約翰大學梁敬錚教授和台灣王曉波教授所蒐集的材料和所做的研究，這位「柯喬治」先生也在二月事件後找了廖文毅、廖文奎昆仲，到上海找魏德邁將軍，遞上一份「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力說中國無能落後，沒有能力和資格治理台灣，呼籲美國協助台民「暫時脫離中國」，交聯合國託管三個月後進行「公民投票」達成獨立。同年，台北美新處處長卡特羅（Robert J. Catlo）向當時「台灣參政員聯誼會」講話，宣傳美國「台灣地位未定」論點，鼓勵台民向盟軍總部投訴受國民黨苛政之苦，表明美國可以協助台灣脫離中國，而如果台民願意接受美國託管，可以提出託管條件…

事實上，自一九四七年以後，美蘇在全球範圍內的冷戰對抗正在逐年增強。尤其在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形勢逆轉，美國白宮、國防部、軍部（國家安全會議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和駐台北美國情報單位進行密集的作業，深入探討使台灣成為美國武裝封鎖中國大陸的遠東反共戰略基地的具體問題。一九四

八年，即二月事件的次年，已經解密文件顯示，新任台北美新處處長康查理（R. P. Connium）在一次在台美國情報人會議中訓令不再在台灣推銷聯合國託管論，原因是「台灣人排外性強，不肯接受」，說台灣人雖然「反蔣」，「但不肯接受外國人統治」，今後「宜利用反蔣情緒，煽動台灣獨立」…

看來當時台灣人民的民族氣節似乎遠比目前要崇高而堅定的。康查理的訓令，說明美國在台灣促銷的民族分裂主義遭到重大挫折。一九四八年徐蚌會戰後，中國大陸內戰局勢又有重大的逆轉。解密後，美國外交文件顯示，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密切商議「扶助台灣自主份子，發動台灣獨立，以切合美國利益」，並伺機倒蔣，「支持台灣人政治領袖，利用其自主運動」，鞏固美國在台灣的戰略利益。六月，著名的肯楠提出「台灣問題意見書」，具體提出台灣地位未定，在美國佔領下舉行「公民投票」，與東南亞國家會商「共同派軍佔領台灣」，更換「台灣政府」…

一九五〇年，著名的台灣作家楊遠發表了使他投獄十二年之久的「和平宣言」。宣言的全文已在兩年前重見天日於台灣。宣言的開頭，竟是呼籲人民「協力消滅台灣獨立和聯合國託管台灣論」。陳儀接收體制的超經濟掠奪，在短短十六個月後，激起台灣市民的反抗。而在殘酷武裝鎮壓之後的第三年，絕大部份台灣民眾仍然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分裂運動，究其原因，畢竟是五十年日本殖民地支配留下來的深刻的教育，挫折了美國所煽動的陰謀吧。

二·二八事變當然不是美國「陰謀策動」的產物。但是為了逐漸成形中的兩極對峙的世界——太平洋冷戰構造，眼看中國大陸的赤化已無法避免，早自一九四六年，美國就有佔據台灣，包圍社會主義中國大陸的戰略計劃。這個計劃的核心，就

是塑造一個親美、反共，與中國長期、甚至永久分裂的台灣。這樣一個戰略構想下，美國力圖利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蜂起事件達成其目的，是極為自然的事。

然而，當韓戰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爆發，美國迅速、明白地選擇了在二·二八事變中殺戮台人的國民黨政權，而至少在表面上「放棄」了支持「台灣人政治領袖」的「自主」、「獨立」運動。這除了是因為當年艾奇遜國務卿預見並促進中蘇共可能的反目，而放棄公然、直接佔領台灣，扶贊一個獨立的台灣人國家的政策，避免美國的帝國主義對台佔領激發中共的反帝民族主義而倒向蘇聯，但是一九四六年以來美國在美新處幹員柯喬治、卡特羅、康查理之流努力兜售各式各樣「託管」、「自決」、「獨立」論却遭到台灣民衆橫眉冷目以對，恐怕才是一個重要因素。也就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在美國協助台灣進行土地改革、農村復興、對台灣進行各項巨額軍、經援助和合作計劃的同時，美國事實上默認並支持國民黨從五〇年到五四年的、範圍廣泛、徹底、凶殘的政治肅清運動、殺害了三、四千個真實和冤假的「匪諜」，長期囚禁了同樣數目的「赤色」份子。而其中有大部份的人，正是參與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事件而倖活的民主戰士，成爲被撕裂成兩半的民族母親遺腹的死嬰！

親歷了二·二八事變的台灣中共地下黨人的證言，也說明了二·二八事變絕不是共黨策動的蜂起，原因是當時的黨人在人數、組織、和實力上尚極幼小。台灣二月蜂起的次年四月三日，左翼力量遠遠比同時期的台灣者強大的韓國，在濟州島上掀起了反對美軍佔領軍政當局分裂韓國的革命。美國主帥的盟軍總部，會同李承晚軍警，展開了殘酷的武裝鎮壓，屠殺了濟州島七萬韓國農民，是爲著名的「四·三事件」。如果台灣的

二月蜂起真是強大的左翼所策動和領導，二·二八事變的結束，就不能不以更大的修羅地獄的血湖屍山去換取吧。

當然，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和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的全面政治肅清，以及因這兩次武力鎮壓而形成的戰後台灣四十年反共權威主義體制，在台灣人的心靈中留下深刻的傷痕，並且在海峽分斷、極端反共意識型態支配、外來勢力的支持和鼓動，和中共在經濟、政治上幾次劇烈的波折和起落，逐漸在部份台灣人的苦悶中滋長了分離主義的情緒。

時至今日，長達四十年的世界冷戰結構，正在快速崩解。冷戰時代所湮埋的悲慘歷史，終於要從逐步浮現的屍骸，發出沈痛、淒厲的指控。時代錯誤地要死抱著冷戰價值，企圖繼續湮滅和歪曲歷史，夢想在美國重新回到太平洋軍事佔領和干涉海峽條件下，使中國民族分裂固定化…的勾當，是注定要失敗的。正確、嚴肅、科學地解明二·二八事變的真相，從中記取深刻教訓，以避免重複這歷史的悲劇，真正地從民衆的視座正確地把握歷史的事實，並且脫却冷戰的邏輯，從冷戰的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的網絡中去究明悲劇的核心，重建民族的團結、和平與主體性，才是安息因二·二八事變和政治肅清而犧牲的無數英靈最好的燔祭。

我所敬重的朋友葉芸芸以長年大量、認真的工作，走訪了目前散居中國大陸的二·二八事件親歷者，蒐集了珍貴的證言和見證，並陸續刊於已經廢刊的、在北美普受尊重的華文綜合雜誌『台灣與世界』。如今再經相當的增補，交由人間出版社刊行，使小出版社倍感榮光。

爲了閱讀的方便，出版社依文章的性質分成三個部份：

「證言篇」的部份，主要是事變親歷而倖存者的回憶和證言。其中有親歷者自己寫的文章，也有葉芸芸和她的同事所做

的訪談記錄。證言者絕大部份是台灣籍新聞和文化工作者，其中也有當時「地下黨」的黨人。時移勢易，他們有了較好的條件和客觀環境披露被湮沒近半個世紀的、他們所親歷其事的歷史細節和內情。

「見證」篇部份，主要是親身目睹和經歷了二月蜂起的、當時在台從事新聞、文教工作的大陸籍人士的回憶和記錄。

最後一個部份是「研究篇」。是一九八七年三月『台灣與世界』雜誌社主辦、『台灣思潮』雜誌社、「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協同主辦的一次關於二·二八事變的學術研討會的主要論文，收有像許登源所寫「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經濟」這樣難於一見的深刻論文三篇。有多篇同樣發表在這個研討會的文章，因其性質，分別編入「證言篇」和「見證篇」。這是應該向作者和讀者特別聲明的。

人間出版社和讀者們一樣深深地感謝葉芸芸和她的同事們所付出的寶貴時間、心血和精神。沒有他們的誠摯、深情而又嚴正的工作，這一本珍貴的史料就無法結集成形。旅日台灣史學家戴國輝先生不但在本書的形成過程中貢獻了他極為寶貴的指導與協助，他的序文也為本書增添了力量和鼓勵。這都值得我們和讀者深致謝忱的。

第一部

證言篇



楊逵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後

何昉錄音·整理

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之後，我把「首陽農場」改名為「一陽農場」，並且辦了一份「一陽週報」，來慶祝台灣光復，從此我們可以站出來自己和平建國。不過，這段時間中國國民黨把社會搞得亂七八糟，引起二二八事變。當時羣衆基礎極強，不是幾個領袖可以搞出來，而是自動自發的。台共當時剛剛開始向學生及工人發展左派組織，一點力量都沒有；到二二八發生，就把過去被日軍抓去當軍伕的返台人士，發展成武裝組織，跑入山上，但勢力極其薄弱。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在台北剛發生時，我在台中發出明信片大小的傳單，抗議二二八暴行。當時也沒同「台中人民大會」交涉，就把它名字印上去。次日清晨，就到大街小巷散發出去，連議員們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大家湧到台中戲院開會，也不用排節目，就紛紛上台發揮。只消幾個鐘頭把台中的憲兵和軍隊武裝解除，這個情形維持了四、五天。

當時台中有一份「和平日報」，是國民黨辦的，不過編輯比較進步。我在該報主編副刊「新文學」。二二八發生時，外省人都不敢出來，我就把他們安排去一家旅館保護，自己跑去工廠和工人印號外，報導開會及遊行的消息。那段時間，台中組織處理委員會派我負責組織部，隨時印傳單，過去國民黨控制的農會、工會和學生會，很快地都自治了。

對二二八情勢估計

在處理委員委會控制台中好幾天時，台共負責人蔡孝乾（註1）來找我。他對局勢很有把握，要辦人民日報，並要我負責。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勢維持不了多久，一旦國民黨大軍開來，烏合之衆隨即會散去。因此我建議辦流動性的週刊或半月刊，組織的基礎可做通訊員和傳播員；此外我認爲，大家集中在市中心雖熱鬧，卻一點意思也沒有，一旦軍隊開來，大家就會散掉，因此寫了一篇文章「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呼籲大家到鄉下去，擴大控制面。我把這篇未署名的文章交給一位在「自由日報」任職的朋友。由於記者缺乏經驗，就將該文署我的名字登出來。

「從速……」一文刊出後，孝乾並不贊同。他說，國民黨的軍隊已被民衆接收，改成「二七部隊」，爲什麼不能辦日報。我認爲大陸地闊有可能，台灣太小不可能。孝乾說，如果不可能辦日報，就去山上組織游擊部隊。我說，台灣環境也不允許。兩人講話不投機。沒兩天，國民黨軍隊開來，大家散光光，我也逃了。起初我不想離開台灣，還想大家一起做些事。孝乾有一個小組組織做通訊員，與我聯絡。我在逃亡時，身上帶著油印機和臘紙，有一位朋友當司機帶我到處跑。這時，謝雪紅他們很快就離開台灣。到我想走時，海邊已加強戒備。我從鹿港跑了一圈找船，但封鎖很厲害，不能出去，只好又轉回來。

報紙罪證神秘註銷

四月中，我和（太太）葉陶回到家中。晚上就有人去通風報訊（可拿獎金十萬）。半夜即被抓走，關在二七部隊裡。那時，國民黨已佔領軍營，控制了二七部隊。關在那兒的人很多，內定要槍斃



十七人，我和葉陶都在名單內。執刑前一天，換魏道明當台灣省主席，他改變過去白崇禧的處理方向，採用安撫政策，結果救了十六條命，只槍斃了一個。當時，有一個法官叫我去問，那張刊登「從速……」文章的「自由日報」赫然擺在桌上，旁邊放了電擊的東西，叫我坦白講。我想報紙既在上面，註定沒命了，勿需再講。他怎麼問我都不應。最後他說，你想想看，不然就要電，隨即離去。這位法官後來去我家把賴和未發表的原稿，和才出一期的「文化交流」雜誌全都拿去。法官就從此失蹤。我猜他可能逃去大陸。之後，我被調到台北許多單位，都沒有人問及「自由日報」這件事。這份報紙可能給那個法官毀了，使我罪名減輕。以後我聽人講，調查局有一個比較開明，是我朋友的好朋友，二二八之前就來到台中。二二八時開始抓人，他只抓走私和經濟犯，其他人都不動。有一天，我的朋友帶他來看我，我把「送報伏」送給他。過幾天另一位朋友請客，我們都被邀。他看到我就跑出來告訴我，「送報伏」一文令他流淚。又聽人說，這個調查局的人與那位失蹤的法官有接頭，並把我的「送報伏」給失蹤的法官看。

我和葉陶被送到台北情報處去關。早期關在那裡的人，終日眼睛都被蒙起來，讓關在一起的人不能互相認識，連審問和吃飯時，也是蒙著眼睛的。我們去時，才剛解除。那裡難友說，王白淵早些時候也關在這兒，他每天唸著楊逵怎麼還沒來。他想，這件事我一定逃不掉的。我關在那兒時，他已被移到他處關去。我們剛到時是四月，開始漸漸放人，到了七、八月時已沒剩多少人，房間空出不少。看守的人把我和葉陶另外關在一間。我們可以看古典小說、「水滸傳」，九月即出獄！

釋放時，獄方跟我講，以後如果在文化界工作，可與台灣指揮部參謀商量。出獄後，我開始印一些書，像魯迅、沈從文，老舍等作品的中日文對照本。付印前，有一位少尉來找我。他說他曾在東

北辦雜誌，對文化事業很關心，當場脫下金戒指給我去印書。但是錢仍不夠，我叫他再等等。後來，台北有一位朋友支持，支付所有發行資金，才發行了「台灣文學」叢刊。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非常厲害，四萬塊新台幣換一塊舊台幣，一本薄薄的書就要一、兩千元。

「和平宣言」的陰影

一九四八年「力行報」找我去編副刊「新文藝」。「新生報」和其他文化界的人士也常常來找我。文化界人士有感於二二八後常發生衝突（雖然很多台灣人遭到士兵修理，但是一般外省人處境都很危險，連外省的文化人士也遭民衆修理），所以組織了文化界聯誼會來溝通文化界，從而影響民衆，以彌補鴻溝。朋友們叫我起草「和平宣言」。一九四九年，一千餘字的宣言寫好，即油印廿幾份，寄給關心的朋友，他們都是外省人。這時，「大公報」特派員去「新生報」找副刊「橋」的主編歌雷（註2），在那看到「和平宣言」草案，頗感興趣，隨即把「和平宣言」當做消息在「大公報」上報導出來。那時，共產黨已攻入北京，國民黨派去和談的張治中、邵力子也一去不返，南京政府任命陳誠做台灣省主席。陳誠在赴任途中，路經上海，有記者問他關於「和平宣言」的問題。待陳誠抵達台灣開記者招待會時，就對記者說，台中有共產黨的第五縱隊，並說要把這種人送去填海。我見到這個消息，心裡就有警覺，知道這是針對我而講的。

同年（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師範學院學生騎腳踏車經過派出所，被警察抓去修理。學生當即羣集派出所前示威。同一天，我就被抓。在這之前，「新生報」副刊「橋」想搭一座橋，來溝通本省及外省人民，意思和我的相仿。主編歌雷很多事找我商量，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會，把我抓去當主席。由於我不會講普通話，由一

位從日本回到台大的外省人做翻譯。這些座談在文化界的反應相當好。我們也常去師範學院座談演講。我猜他們認為，師範學院發生此事，可能與我有關，所以就在同一天逮捕了我。

米上校的陪審與槍斃

歌雷的叔叔是參謀長，所以歌雷一個人很快地就被放出來。剩下我和「新生報」台中地區負責人鍾平山。此外，「力行報」從社長到工友統統被抓去、抓這麼多人，可能是想看看我們與師範學院和「力行報」有無組織關係。我被送去陽明山警務招待會疲勞審問。吃飯吃過就開始問，幾個人輪流問到天亮，持續了五六天，晚上電燈通明，也不讓你睡覺。在疲勞審問期間，警備總部派一上校陪審。我因為幾天未睡極沒有精神，在陽明山旅館看後面的樹，半睡半醒。這位上校從後面拍我，講了一句很怪的話：「你有印度甘地的風格！」然後就講些沒關緊要的事，他手裡拿了一本劉少奇的「組織問題」。過一段時間，我被送去軍法處。有兩個朋友從保密局送到軍法處，與我關在一起。他們問我認不認識姓米的，又說這個人就是陪審的那位上校，米上校和我的兩位朋友一起關在保密局。他託這兩位朋友傳話，遇到我時向我問好，並說他將被槍斃。

審問後，發現事實上我只有辦演講、在「力行報」編副刊，並沒有組織關係，過了不久就開始放人，只有「新生報」台中負責人鍾平山因贊成我寫「和平宣言」，被判十年，我被判十二年。這個案子是軍法審判，不能請律師，也是秘密的，像古時縣官判刑，隨便問問就判。在場只有一個法官、檢察官、書記官和警衛，如此而已。判完，就送去台北監獄，等船期坐船送去火燒島（綠島）。

轉信事件不了了之

有一段時間，我被送到情報處。對面的牢房有人叫我。我一看，原來是在嘉義鐵路局機關庫的火車駕駛員。他告訴我，在二二八期間，火車全都停駛。當時應張志忠（註3）之求，他特別開火車要交一封信給我，由我轉交給蔡孝乾。當時他負責攻佔嘉義飛機場，由於情勢不利，因此寫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從台中開飛機去嘉義助陣。這個事件，我過去並不知道，也沒有人提出過。這件事嚴重，我看是過不了關了。後來，情報處叫我去審問，問到我這個問題，由於證據確切，我不能辯解，因此不予作答。奇怪的是，這件事情普通都會刑求，他卻給我紙和筆，和氣地叫我回去牢中慢慢想，寫出來。我想，我與蔡孝乾的關係，以及代轉信給蔡孝乾的問題，都需要有一個交待，不然是通不了關的。

蔡孝乾與我是在日據時代文化協會上認識的。不久，他就去大陸，加入共產黨，參加了延安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來派他來台做台灣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孝乾在台灣是做地下工作，我不是共產黨，是公開的，我們互相稍微知道一點點，但並不知道他的實在情形，因為我公開，隨時會被抓，因此他有事也不讓我知道。當時我就寫孝乾與我是在文化協會認識，以後他去大陸我就知道了；二二八時，他來找我，因為他在大陸從事文化工作，回台看到我從事台灣文化工作，所以找我在文化工作方面合作，搞一個報紙，要我負責，我認為在動亂中不可能辦日報而拒絕。此外火車駕駛員遞信，是有其事，不過信的內容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寫好自白書後，審問我的人拿去也不問，就沒事了，最後被送去火燒島。這件事與「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一文同樣，我受到保護，我想，那時他們裡面這樣的人很多。

獄卒的特別照顧

再講回一九四九年四月六號我被抓。由於此案是因為我寫「和平宣言」，與葉陶沒有關係，所以葉陶先回去。過了三、四個月以後，基隆中學發生「光明日報事件」（註4）。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哥哥鍾浩東（註5）是該校的校長，因印「光明報」被抓。同時也抓了林正享。林正享被刑求很厲害，亂供葉陶是「光明報」的台中負責人，於是葉陶再度被捕，也關在軍法處牢中。牢房兩排房相對，中間有一塊空地，可以看到對面牢房。一位看守衛兵對我十分客氣，普通喊犯人時叫號碼的，他卻叫我楊先生。此外犯人每天早上只有一杯水漱口洗臉，前後僅兩、三分鐘，不能洗澡。可是在下午沒有人管時，他會打開門叫我去浴室洗澡半個小時。待我洗完，他就開門讓我去葉陶那邊講話；倘若有別人來，他就敲響鑰匙警告，我趕快跑回自己的牢房。我至今仍不了解為什麼這位衛兵對我特別好，是不是他上面有人叫他這麼做？

葉陶在軍法處牢裡住了四個月，由於缺乏證據，所以被放。當時我最大的孩子資崩十七歲，不只要做工扶養弟妹，而且每隔一兩個星期就要跑台北一趟，給我送東西。當時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親人被關的下落，資崩卻有辦法找到我囚禁的地方，而且還幫別人找到親友囚處。我從台中換到台北去關時，是坐火車二等車廂。孩子們為了省錢，只能坐三等車廂。資崩找楊基先幫忙，才得以換成二等車廂，跟我坐在一起，這是資崩有辦法的地方。

楊基先是一位律師，在日治時代第一次台共審判事件中，他義務替台共辯護。在我入獄後，葉陶種花，初期未有收入，連孩子們的學費都籌不出來，都靠楊基先照顧，為孩子付學費。後來楊基先競選台中第一屆市長時，葉陶和資崩都去幫忙。在競選宣傳時，警察專找麻煩，助選員都跑掉，只有資崩留下來座鎮照顧競選事務

所。後來楊基先當選第一屆台中市市長，那時我已去火燒島，遇到市政府剪樹，楊基先就叫資崩去做，對於孩子們極其照顧。我返回本島時，他在經營果園，不久癌症去逝。

火燒島的「同學」

在火燒島時，政治犯中前前後後大概有十個醫生，像呂水閣、古金閣、胡寶珍、王荊樹和「阿斯匹靈」等。他們就在火燒島醫務室替同學看病。「阿斯匹靈」叫什麼名字，我已記不得。當時在火燒島，藥真少。遇到感冒、肚子痛、頭痛時，這位從西螺去的醫生就開阿斯匹靈。這些醫生，為火燒島的同學貢獻不小。呂水閣出獄，幫了不少人。那時有一個在國防醫學院就讀、尚未畢業就被抓去火燒島的青年，返台後找不到事做，呂水閣就叫這個青年去他那做醫務。我們剛弄東海花園時沒錢，呂水閣經常寄來三千、五千，資崩創業時，也向他無息貸款五萬元，等到資崩賣掉大地皮換成小地皮時，才償還這筆借款。

幾年後，呂水閣患急性肝炎，病情非常危險，就醫後並未完全治好，來美探望女兒，返台後診斷得了腸癌。醫生開刀發現，病情已不可收拾，癌腸未割就重新縫上。不久呂水閣即去逝。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五年五月。

【註解】

註1：蔡孝乾，鹿港人，曾任井岡山蘇維埃政府教委會會長，台共第一次大會當選中央委員，因上海讀書會事件被檢舉，逃到解放區，後被台共開除黨籍，曾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延安當過中共中央候

補委員，抗戰期間擔任八路軍特工部長，負責對日本戰俘的工作。一九四五年為中共派到台灣發展工作。

註2：歌雷本名史習枚，復旦大學畢業。

註3：張志忠，嘉義朴子人，本名張梗，日據時代就去大陸參加抗戰，後來與蔡孝乾一起為中共派到台灣發展工作，任中共中央台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二二八事件期間在嘉義負責武裝工作。

註4：「光明報」是中共台灣地下黨的報紙，手寫油印本。二二八以後由呂赫若躲在台北編印。

註5：鍾浩東是蔣渭水的女婿，抗戰期間夫婦一起到大陸，跟隨丘念台，光復後，隨丘念台回台，後來被槍斃。

我所知道的謝雪紅

撰文／周夢江

台灣“二·二八”起義主要領導人、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主席謝雪紅女士，離開人世已有十九個年頭了。她當時在台灣，特別是在台中一帶，是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人物。而今天知道她的人不多了，可是流言蜚語却多起來：有些人將她捧為台灣獨立的旗手，有些書如台灣出版的《蔣介石傳》竟說她是親日分子。這些流言蜚語不知從何而來？雖然，我的老鄉元代的高則誠可以將東漢著名文學家蔡邕寫成《琵琶記》中負義的蔡伯喈，但這畢竟是戲曲傳奇，可以允許虛構。而歷史的真相却是不能歪曲的，我們要向後世負責。

謝雪紅女士雖然和我僅僅相處一年（1946年），但這一年在她一生中是至關重要的。因為1927年她從蘇聯留學回來後，來到台灣，即在上海被捕，日人引渡關押在台灣，不久，因證據不足而獲釋。1931年再次被捕，判刑十多年，關押九年後，因病保釋在外就醫，至日本政府投降後獲得自由。1947年二·二八蜂起失敗她離開台灣，從此沒有回去。她開始流亡於香港，以後來到大陸領導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工作，後被錯劃為「右派」，受「四人幫」迫害，於1970年11月死於北京，終年70歲（虛齡）。

面對流言，我要寫出1946年我所知道的謝雪紅的幾件事，請大家公正地判斷她的為人。

一、謝雪紅與《和平日報》

謝雪紅是台灣彰化縣人，1946年住在台中市中山公園附近她弟弟經營的大華酒家樓上。同年三月我和王思翔（張禹）、樓憲（尹庚）在台中《和平日報》工作。《和平日報》社長李上根是王思翔的黃浦軍校江西分校同學，原是駐台中某師《掃蕩簡報》的負責人。抗日戰爭勝利後，各省都有由《掃蕩報》分社或《掃蕩簡報》改組的《和平日報》分社，總社則在南京。台灣《和平日報》（正式名稱是「《和平日報》台灣分社」）成立後，亟待出版，但李上根却是光桿司令，於是便聘任樓憲為經理，王思翔為主筆，我為編輯主任。

這時，報社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人手，全部編輯、記者、報務人員、印刷工人以及經理部業務人員、會計等統統沒有。二是沒有資金，李上根接收來的只有一幢三層樓房（後為報社社社）和一座旅館（後為宿舍）以及一個造紙廠（這廠情況不詳），原來的「簡報」經費很少，南京《和平日報》總社也沒有撥給開辦費。因此，我們必須實行以報養報的方針，才能使報社站得住。而這一切必須取得當地人士的支持。

為了獲得當地人士的支持，我們拜訪了林獻堂等許多台中著名人物，他們都很冷淡，只有實業家張先生和謝雪紅較為熱情。當時謝雪紅在台中名氣很大，是蘇聯留學回來的共產黨員。我們還聽到一些傳奇式的有關她的身世的故事，如說她少時賣身葬父，為人「下女」，以後掙脫牢籠到國內參加北伐革命等等。她出身貧苦家庭大概是事實，我親眼看見一位窮而老的尼姑是她的親姐姐。而我們也願意接近謝雪紅，這裡有我們的個人因素在內。當時我們名義上雖都是國民黨員，但樓憲早年參加“左聯”，追隨過魯迅先生。王思翔和我則是在家鄉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而逃亡到台灣來的。

因此，我們對國民黨的腐敗深為厭惡，對共產黨較有好感，於是我們歡迎謝雪紅的支持。報社中絕大多數人員都是謝氏介紹來的，如謝氏的助手以後出任台盟秘書長的楊克煌，到報社任日文編譯科長；一位曾在農民協會工作的林西陸出任副經理。此外編輯、記者以至一般職工幾乎全是謝氏介紹的。報社還聘請她為顧問。謝雪紅為什麼支持《和平日報》呢？她當然知道它是國民黨軍方報紙，她的目的何在？我在今天回顧過去，認為她想因此而獲得一個為台灣人民發表意見的地方。因為她知道我們也對國民黨政府不滿，而且年青、單純，不是老奸巨滑的官僚政客。她的目的在報紙出版的開頭幾個月可說是基本上達到了。因為這時國共兩黨正在談判，全國的政治空氣比較自由。但是報紙出版了三、四個月，情況起了變化。

為了打開報紙銷路，取得台灣讀者的支持。《和平日報》批評它所發見的台中官員的貪污現象，敢於支持當地紳民對政府的鬥爭。於是就不斷的和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的官吏、警察產生摩擦。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記得十分清楚，台中縣一個地方議員受到警察的欺負，向報社投書訴說冤情，我們刊登了，而且發表短評斥責警察。台中縣警察局竟派幾十名武裝警士衝進報社，持槍威脅社長。幸虧《和平日報》是軍方報紙，師政治部馬上派人來解圍，台中縣長劉存中只得面向我們道歉。同時，報社還經常召開各界座談會，謝雪紅幾乎都有出席，會上揭發時弊，我們亦一一刊登。於是台中當局就認為《和平日報》所以如此，是受謝雪紅影響的緣故。

二、台中山區發現軍火庫事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必須歸還中國，有些日本

人是不甘心放棄寶島的，於是在國民黨軍隊未大量開進台灣之時，日軍利用這個時機，偷偷指揮高山族同胞將大批軍火運到深山裡埋藏起來。日人不敢利用漢族台胞，他們知道漢族台胞愛國熱情高，怕以後加以揭發。當時台中州軍火最多，台中南部又是高山峻嶺，便於藏匿，因此該地埋藏的軍火庫最多。台中州居民略略知道這一情況，想到這將給台灣留下後患，於是一些愛國的青年便偷偷監視日軍這個舉動。

台中縣水里坑地方一位林姓青年，他曾釘梢過一次日軍埋藏軍火的事，記住一個大略地址，1946年日軍全部撤退後，他便天天在那座山中找尋，終於發現一個地窖，設法打開窖門，裡面竟藏有大量的槍支彈藥以及坦克大炮。林君馬上向台中縣政府報告，可是縣政府官員却對此事不感興趣，口頭上答應派人接收，却又要林君先加保管，以防壞人偷盜。這位愛國青年只好自己天天在山中守衛，同時託人要求謝雪紅加以幫助。謝氏為此三番四次向台中縣官員提出，可是腐敗的國民黨官員因這事沒有油水，反而吃力麻煩，便故意拖延不予處理。那位林姓青年一面天天看守，勞累不堪；一面又怕日本間諜報復，憂慮重重，結果竟一病不起。謝雪紅對此十分氣憤，便將這事原原本本告訴我，希望報紙加以揭發，利用輿論力量催促台灣當局辦理此事。可是這時《和平日報》和台灣政府的嫌隙已經較深，而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又是親日的，當時台灣《新生報》公開承認，台灣留用的日本人員有七千零八人，比內地來台的公務員多出一倍。因此《和平日報》社長不敢刊載這個新聞。同年六月，報社新聘了一位採訪主任丁君，他是上海《僑聲報》駐台灣記者。我便將這事告訴他，由於我不敢將消息的來源透露給他（怕對謝雪紅不利），他只能寫了一則簡短的新聞在上海《僑聲報》發表。可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機關報——《新生報》馬上公開否認：「難道台灣真有軍火無人要的事嗎？恐怕雖三尺童子也不會相

信。」謝雪紅看到《新生報》後認為應該反駁，於是由我寫一篇較長的新聞給上海《文匯報》。我用“黃英”的化名寫了一篇《台灣的秘密》，除詳細報導軍火庫發現的經過外，還批評陳儀縱容日人箝制言論等等。1946年（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0月21日的上海《文匯報》第五版以大半版篇幅發表了這篇通訊，編者加上醒目的大標題：「山中軍火無人接收，告密青年抑鬱而死」。在具體的事實面前，這次《新生報》不敢作聲了。事實雖然公開，而謝雪紅和我們却不能去催或去問台中縣政府。所以以後這事也不知如何處理。近年大陸發行的《參考消息》時常刊有台灣發現日人軍火的新聞，可見這類日人當年埋藏的軍火庫是為數頗多的。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謝雪紅的愛國思想，也可以看出謝氏當時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中國國民黨政府收回台灣，開始是受到廣大台胞的歡迎，也受到謝雪紅這些台灣共產黨人的認可。因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畢竟是代表中國主權，代表中華民族的政府。所以，謝雪紅和那位姓林青年一樣，為了愛護自己的祖國，為了消除日本侵略的隱患，將這個軍火庫的發現報告給台中縣政府，希望政府加以接收。謝雪紅對陳儀政府的腐敗，比之一般台胞的認識當然深刻，但也不是一開始就反對它的，而是一步步走到反對方面的。特別是當暴風驟雨般的「二·二八」羣衆起來時，身為台灣共產黨領導人，她才勇敢的站出來領導人民，公開和台灣當局展開鬥爭。

三、《新知識》的出版和《和平日報》改組

《和平日報》剛出版沒有幾天，樓憲就被迫離開了。因為報社主任秘書韋××在我們籌備時到大陸探親，他回台灣時感到大權旁落，提出自己要兼任經理，於是樓憲走了以後又回台中任二中校長。幸林西陸是副經理，經理部還基本上是謝雪紅的人。由於《和

平日報》時常揭發台中地區的腐敗現象，台中當局使用種種辦法壓李上根辭退謝雪紅介紹來的人。如有一次通過台灣警備司令柯遠芬將李上根訓飭一頓等等。於是李上根便將他所知道的是謝介紹的人，如楊克煌、蔡鐵城等統統辭退了。可是因王思翔和我仍在，所以謝雪紅對報紙的言論還有一定影響。王思翔與我不是共產黨員（1948年間我們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當時謝氏曾叫我參加，我口頭答應，但未履行手續。當時我們與謝的合作基礎主要是對國民黨不滿。

1946年國共兩黨和談期間，上海出版了許多進步的內容充實的雜誌。上海，台灣雖近在咫尺，但台灣政府却禁止這些雜誌進口。《和平日報》是新聞機構，報社人員時常來往南京、上海一帶，所以報社資料室倒擁有許多進步的雜誌。我們和謝雪紅商量，創辦《新知月刊》，以介紹國內進步文化為主，也刊登台灣稿件。謝氏變賣了一副金首飾作為經費，便準備出版了。我按照台灣報刊出版法向台中市政府登記，但心中知道刊登內地進步的文章准會出麻煩，於是和謝商量對策。謝叫楊克煌帶我去見台中市著名律師、南京中央政府、國民大會台灣省代表林連宗先生，聘請他為《新知》雜誌社法律顧問（義務職）。林先生慨然同意，（以後「二·二八」蜂起失敗，林在台北遇難）。我們天真地希望用法律手段保護雜誌。《新知月刊》由台中一家印刷店承印，內容是選登薛暮橋等幾篇經濟論文和反對內戰的文章，以及謝雪紅、楊克煌，我們兩人的作品。封面用一張屠夫宰殺雞籠中小雞的漫畫，暗示國民黨殘害人民。編輯用樓、周、王三人的真實姓名。雜誌剛印好，我準備第二天提取。當日下午我因事去台北，晚上回來在火車上碰到樓憲，我將樣本給他看，他當時因忙於校務，實際上未參加編輯。當他看了封面翻翻內容，責怪我說：「這雜誌肯定會被查封」。樓憲的話不幸而言中，當我第二天下午去提取雜誌時，早有

一個台中市政府的人員在等我了。這人對我說，他奉市長黃克立的命令來查禁《新知識月刊》。我說你們要查禁，應該通過法律手續。這人不理，逕自問印刷店老板共印多少份。這老板大概在日據時代見過查禁書刊的。他反問這人說：你們市政府認為那篇文章有問題，可以抽去或刪改，我們可以重印。這個台中市政府人員厲聲打斷他的話：「不關你的事，你印了多少份都拿出來就是了」。幸虧這位老板幫忙，他搬出300份說：「全部都在這裡」。這個台中市政府人員命令他帶來的兩個便衣小特務，將300份雜誌捆起來放在車上走了。我被搞得目瞪口呆，毫無辦法。我們所想像法律保護完的幻想全破滅了。只好將剩下的200份帶給雪紅，說明經過。謝對這些事的經驗比我豐富，笑笑說，能留200份還算不錯。這剩下的雜誌，其中150份由謝秘密分發，50份由我暗裡托一位朋友在台北書店銷售。同年八月間，台灣長官公署明令取締二十多種書刊，《新知識月刊》是其中之一，終於壽終正寢。經過這事後，我們發現時常被入釘梢。樓憲的台中二中校長只做半年也被免職。

接着《和平日報》誤刊了陳儀辭職的新聞，一天晚上，電訊室送來一則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陳儀辭職照准的新聞。這新聞如何而來，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因事關重大，編輯部同人請社長李上根決定。因為台中市這時只有《和平日報》一家報紙，無法向其他報社查對，同時也怕其他報社搶先，於是李上根決定編發。可是第二天台灣全省報紙都無這條新聞，台灣當局認為《和平日報》有意搗蛋，李上根只好乘飛機趕往南京請罪。過了一段時間，李回來了，帶回一個南京總社派來的副社長兼總編輯，報社編輯部改組，王思翔被免去主筆職務，專編副刊；我被免去編輯主任，外調花蓮港分社社長。台灣當時報社的所謂「分社」，實際是報紙推銷處，我不願意幹，在1947年1月間就離開了《和平日報》社。至此，謝雪紅

對《和平日報》的影響消失了。「二·二八」蜂起失敗後，《和平日報》被查封，王思翔倖幸乘小船逃回家鄉，李上根也被囚禁了幾個月，才獲得保釋。

這時謝雪紅也離開了台灣，聽說通過地下黨的關係化裝搭乘國民黨兵艦離開的。《和平日報》從1946年3月創刊，到1947年3月初查封，整整一年，也可說和謝雪紅當時的活動相終始。

最後，我想講幾句謝雪紅當時（1946年）和國內中國共產黨是有聯繫的。因為我的女友經常住在她家中，所以我到謝處的次數也很多。有時我在她家看到一些介紹延安的書籍，有一次我看到當時陝甘寧區中共政府的組織法。這些書都是國民黨的「禁書」，一般人看不到的。特別是：有一次，我的女友對我講，她想和台中青年何集槐等人到大別山解放區。何集槐等人我是認識的。因為我也想去，便向謝氏提出自己的要求。由於謝當時對我不夠了解，她避而不答，我的女友反而遭到她的嚴厲批評而且也沒有去成。以後我只聽說何集槐等幾個人到國內去了。1950年解放初期，我在上海遇見何集槐，這時他改名為何建人，擔任上海某公司工會主席。聽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爪牙迫害而死。從何集槐這事可知謝當時和國內中國共產黨是有聯繫的。上面我講過，我沒有參加共產黨，所以我對謝氏她們台灣共產黨的其他情況都不了解。

悼念謝雪紅女士（七律兩首）

英年留學莫斯科，巾幗英雄軼事多。

葬父賣身傳閩里，斬妖斥敵動山河。

誰知狐鼠憑城社，遂教鸞鳳困網羅。（註）

他日台灣回祖國，定知泉下起歡歌。

四十年前雨後生，無端橫禍棄家行。

京華浪跡難求食，海外飄零幸識荆。

山有室廬堪宿客，人非草木豈無情。

自從負屈歸天去，兩岸濤音作哭聲。

（註）指受“四人幫”迫害

無題（七絕一首）

台灣往事已成塵，甌越蹉跎誤此身。

更有不堪回首處，海天極目憶斯人。

周夢江 1989.6

【作者簡歷】

周夢江，原名大川，男，漢族，1922年生於浙江省平陽縣。少年家境清寒，畢業於溫州師範學校。早年從事新聞工作，曾任福建《南方日報》編輯，1946年2月赴台，任台灣《和平日報》編輯主任，《中外日報》編輯，1947年3月回上海，歷任杭州《當代日報》記者，溫州《中國民報》副總編輯。1949年5月溫州解放後，長期任中學文史教員。1976年調入溫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參加《漢語大詞典》編寫工作。業餘從事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宋史的研究，是中國宋史研究會和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員。近十餘年寫有論文六十多篇，發表於《宋史研究論文集》、《中國史研究》、《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中州學刊》、《浙江學刊》和杭州大學、河南大學、杭州師範學院、溫州師範學院等學報上，曾為《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史》、《中國古代史》等所轉載，並為日本學者山根幸夫《中國史研究入門》收錄。專著有二部：《葉適與永嘉學派研究》、《止齋集》校點，現均未出版。1982年退休，享受講師待遇。

二·二八事變中的謝雪紅

——訪周明談謝雪紅、「二七部隊」、吳振武和鍾逸人

■ 撰文／葉云云

前言

周明先生的本名是古瑞雲，台灣台中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台中商業學校畢業。現在「上海外語學院」教授日文。

一九四六年夏，周明經謝雪紅的介紹，在台北「中外日報」任會計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回到台中參加反國民黨民衆武裝力量「二七部隊」，任隊長鍾逸人的副官。撤退到埔里之後，他指揮二七部隊與國民黨軍隊的戰鬥。事件過後，他與謝雪紅、楊克煌一起離開台灣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到大陸定居迄今。這一段經歷，他在接受何昀女士的訪問時，已有詳細的敘述。（何昀：「周明先生談二二八」）

一九八七年二月，周先生應邀到紐約出席「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研討會」，鍾逸人先生也到舊金山灣區參加陳芳明所主持的「二·二八四十週年紀念會」。於是，當時序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繞過了半個地球，這兩位昔日的戰友，意外地，在北美的紐約市重逢。這意外的一章，因我提起鍾逸人的名字，說他也正好來了美國，周明激動地喊著：「啊！鍾逸人還活著！」他自出走大陸四十年來，就沒有任何在台昔日戰友同志的音訊，甚至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死，而他自己的親弟弟，則在他逃離之後，被國民黨逮捕，等於

是頂他的罪而死。因而，他先前接受訪問時，幾乎都不敢指出任何人的名字。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我到「上海外語學院」訪問了周先生，所談的內容比較廣泛，僅將其中涉及二·二八事件的部份，整理成本文，並經周先生本人補正。

葉：二·二八事件當中，台中地區的武裝部隊是怎麼組織起來的？

周：說實在的，武裝力量完全是羣衆自己組起來，大多是三五成羣自己組織起來之後來找謝雪紅的。有的是個人來找謝雪紅，就聽她指揮，當時她坐鎮在「作戰本部」。吳振武那兒也有一批人，大半是台中師範的學生，鍾逸人也有一批人。這些隊伍後來匯成「二七部隊」隊名是楊克煌取的，因為事件是發生在二七日晚上，為紀念這個日子取的部隊番號。

後來逃亡途中，謝雪紅告訴我，組織二七部隊是當時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的建議。張對謝說，羣衆自動自發成立武裝力量很多，有必要建立自己能夠信任能夠控制的武裝力量，也就是基幹民兵部隊。張在抗戰中在新四軍擔任團長，有很豐富的游擊隊經驗。所以，二七部隊，基本上就是從謝雪紅原有的羣衆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謝還對我說：「你雖然會一再推崇鍾逸人，但我對他的政治立場很不放心，所以我叫你去控制二七部隊。」

葉：謝雪紅與「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如何？

周：頭幾天，台中的羣衆召開市民大會，包圍了市政府警察局。因為中部國民黨軍力較薄弱，附近市鎮羣衆又及時支援，到了三月四日，台中市國民黨的黨、政、軍機關基本上都為羣衆所掌握了，謝雪紅在這中間是起了相當的作用。

「處委會」就在這個時候（大約是三月四日）成立，謝雪紅是被「處委會」那些人強迫去參加的，她也是處理委員之一。據謝雪

紅後來告訴我，這也是聽張志忠的意見，而她本人也同意的。他們認為資產階級在羣衆當中有相當的影響力，所以要團結，要和他們組成統一戰線，但也要防止在一定的時候，資產階級可能妥協投降。本來謝雪紅不願理會，但張志忠苦勸她要參加。基本上，謝認為那是一次失敗的經驗，參加了以後，處委會給她一頂「參謀」的帽子，把作戰部長封給吳振武，指揮權就交出去了（註1）。但實際上武裝隊伍仍然願聽謝雪紅的指揮，一方面是謝在羣衆中有威望，另一方面，用謝的話說，是吳振武始終「怠工」，「按兵不動」的緣故。

葉：事件當中，吳振武腳部槍傷一事，到底真象如何？有人認為他當時已屬特務系統，有任務要暗殺謝雪紅，不忍下手，因而打傷自己藉機脫離武裝部隊，你認為這種解釋合理嗎？

周：謝雪紅、楊克煌確有過這樣的猜測。三月四日，謝曾派兵逮捕了三十多名正在密謀暗殺她的CC份子。三月五日，我從台北來到台中，第一次在作戰本部見到謝時，有三、四個彪形大漢站在四周貼牆處，謝神色緊張對我耳語：「你別離開我，這幾個人顯然想對我下毒手。」大約是三月六日下午，謝雪紅、楊克煌和吳振武同車出巡，謝對吳講了許多深明大義的話，吳終低頭不語，直到臨別時才說句：「謝先生，我以前不認識您，現在我對您有所理解了。但我有難言的苦衷，對我今後的行動請您諒解。」就在這天晚上吳「受傷」了。謝、楊兩位根據這些前前後後的事實，推斷吳可能奉命暗殺謝，但聽了謝的一番話之後，不忍下手，用謝的原語說是「良心發現」。為了搪塞他的CC派上司，便以「受傷」掩人耳目。這些情況是三月下旬我和謝隱匿在大肚鄉時，她親口對我說的。一九八七年我到美國時，曾到洛杉磯求見吳振武，想証實此事但他拒絕了。

葉：鍾逸人先生在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中，提到他與謝雪紅

在二七部隊的領導上有過數次衝突……

周：他是對謝雪紅很不滿，好幾次跟我說：「歐巴桑（指謝），我很尊敬她，但是這件事情我實在無法贊成。叫她要公開出面的事情少去，她總是硬要出面，她的背景是「紅的」（共產黨），人家一聽就怕死了。」鍾逸人的意思是出面的事由他去，謝雪紅最好都不出面，在後面提提意見做幕後參謀。

鍾逸人的主張，始終是以武裝來做合法鬥爭的後盾。謝雪紅當然不同意這種幼稚的看法。因為一旦武裝起來就不可能再合法鬥爭了，武裝本身就不是合法的。所謂合法鬥爭，反而給敵人以喘息時間。鍾一直和吳振武很合得來，而不肯贊成謝雪紅的主張。謝是認為要擴大武裝，支援各地的武裝鬥爭直至奪取政權，成立人民政府，鍾想的是有個武裝部隊就行了，接下來應該以此為政治資本，在承認國民黨政權之前提下去交涉，說得乾脆點，就是與虎謀皮，基本上和「處理委員會」那些士紳的主張相近。鍾逸人尊敬謝雪紅，主要還是個人的情感，他們是鄰居，他從小就認得謝雪紅，但是對於共產主義他是不信的，對共產黨更沒有好感。那時候他相信的是三民主義。我那時候也相信三民主義崇拜孫中山先生的，對共產主義了解很膚淺，只看過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和日共山川均的「共產主義 ABC」，我會參加二·二八，實在是國民黨太欺侮台灣人了，自己身為台灣人，該為自己的民主而努力，而不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想法很單純。

三月十二日，二七部隊大約兩百人左右撤退到埔里，鍾逸人住在旅館，我和大隊人馬全住在小學裡。在埔里我和鍾也發生意見衝突。事情是這樣的：三月十三日上午，鍾逸人派人來請謝雪紅、楊克煌到他住宿的旅館，說是當地區長、士紳要和他們會見。我曾勸阻她「別理他們，不會有好結果的」。謝說，「不，我們應儘可能爭取他們的支持」。將近中午時分，謝派人叫我去，一過門只見

謝、楊、鍾之外還有三、四位西裝革履的士紳圍生著，都板著臉、默默相視。謝一見我便開口說：「這幾位先生叫我們放下武器，解散隊伍，隊伍是你指揮的，所以想聽聽你的意見。」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武器不能放下，隊伍不可解散，放下武器就等於自殺，我們不幹。」有一位大概就是區長先生吧，說：「白崇禧答應，放下武器就不咎既往，保證生命安全。」我說：「那是騙人的鬼話，我們一定要鬥爭到底。」他又說：「可是你們在這裡打起來，老百姓會遭殃的。」我說：「我保證不在鎮上打，到郊外去打。」鍾逸人低頭不語，謝聽了之後露出微笑，略帶譏諷的說：「他們不肯放下武器，你們說怎麼辦？」我便退出去，他們也隨即不歡而散。從此我再也沒見過鍾逸人。後來大約是三月十六日傍晚，他曾從魚池打電話給我。以後談及此事，謝說：「我們談判了一個上午，雙方僵持不下，鍾逸人已開始動搖，所以我叫你來的。」

葉：謝雪紅和楊克煌為什麼在國民黨軍進攻之前就先行離開埔里？

周：三月十四日，有個台中人謝富來找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在武德殿談了很久，後來他們三人就走了。從此事也可以看出我們和鍾逸人的分歧。一到埔里我就主張立即以武力佔領區公所、警察局等機關。謝主張和平解決，鍾則根本反對。十三日鍾離開埔里，十四日下午謝出走之後，當晚我派兵佔領了區公所、警察局和郵電局，可惜的是沒有想到佔領銀行。我急著上前拉住謝的衣袖問：「這緊要關頭到哪裡去」她神秘地對我耳語：「現在不便說，我要暫時躲起來。」她只告訴我，將來可以到什麼地方，用什麼暗號連繫找她。當時我非常納悶，也很懊喪的。情況愈來愈緊張，領導的人卻一個個先走了，鍾逸人在撤到埔里的第二天帶著軍費回台中去了，軍費是謝雪紅交給他的。三月十五日，國民黨軍到了埔里鎮郊吊橋的對面，交戰對峙了一天一夜，我們已經糧盡彈絕，只好

解散隊伍，叫大家逃命，我自己也到竹山找到謝、楊，後來又一路保護他們逃離台灣。在逃亡的路上，謝雪紅跟我講很多過去的事情。也是那時候，她告訴我謝富到埔里找他們，是傳達地下黨的命令，要所有黨員離開戰鬥部隊，隱蔽起來，爲的是保存黨的力量。（註2）

葉：我還以爲謝雪紅與楊克煌當時並無黨員的身份。到底，二·二八事件當中，中共地下黨與謝雪紅有組織上，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嗎？

周：這個問題說起來很複雜。怎麼講好呢？「香港會議」（註3）她也參加了，那時她如果不是黨員怎能參加呢？在台灣的時候，我還不是共產黨員，不知底細，到了香港之後，謝雪紅講過她的黨籍問題。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一九四六年底蔡孝乾到台中找謝雪紅，當時謝要求恢復黨籍，並請求讓「人民協會」成員集體加入中共。蔡的回答是，中共黨章規定，只能個別申請入黨而不能集體入黨。至於謝個人，需填寫入黨申請書及經歷。謝拒絕了蔡的要求，她認爲在白區留下有文字的證件太危險。從此以後謝自認中共黨員，張志忠也把她當做中共黨員。二·二八後，她和楊克煌原打算去日本，但後來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可能是張志忠）（註4）叫她來上海找李偉光（即李應章）。在上海期間，中共中央上海局曾將中共中央致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秘密指示給她看（文字極細微，謝看不清楚，由我代讀）。由此可見中共早已把她視爲台灣地黨的重要幹部了。可是一九四八年的香港會議上，謝與蔡之間發生了爭執，儘管謝已以黨員身份出席，會議上蔡卻不承認她爲黨員。據說後來的折衷辦法是，承認她於一九四六年重新入黨，一九四八年六月補辦手續。但不知爲什麼，以後報上公開介紹都說一九四七年六月重新入黨。她和蔡孝乾一直有矛盾，從台共的時代就開始。蔡回來後，對戰後台灣情勢的估計，兩人又有分歧。謝雪紅認爲台灣人

民會起來進行武裝暴動，蔡卻認爲不會。不過，謝雪紅似乎比較能接受張志忠的意見，張也是台省工委之一，嘉義朴子地方的人，二七部隊撤退到埔里也是他的建議。據張領導下的黃文輝（現在上海）說，張早就做了打游擊的準備，二·二八之前他就常到阿里山、霧社等山地勘查地形。

葉：鍾逸人強調，他自己在二·二八事件當時的政治主張，是要求台灣爭取到像愛爾蘭的自治地位。依您的了解，謝雪紅當時的政治主張是什麼？

周：謝雪紅一直都主張台灣要「高度自治」直接普選。早在一九四六年她就提出來了。到了香港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都是相同的主張。不過，這個問題到了全國解放以後，在「台盟」內部自己產生了爭論。李偉光和王天強等人反對再繼續提民主自治，認爲全國解放後，只有少數民族地區才有設立「自治區」的必要。楊克煌與謝雪紅意見是：台灣的政治、經濟與大陸大不相同，少數民族或全國各地區當然都有不同的特性，但是，台灣所有的特性卻是其他各省所沒有的。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來，經濟上發生很大的變化。楊克煌認爲當時台灣的工業生產已超過農業，也超過大陸，依照馬克思的理論，政治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經濟結構不同，政治的處理自不能一概而論。謝雪紅也強調台灣與大陸斷絕已經超過五十年了，台灣人不了解國內的事情。二·二八事件過後，台灣人痛恨國民黨，但是對共產黨卻無了解。她甚至主張：應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爲團結台灣人民的政治核心，而不是以中共爲核心。

【註解】

註1：時任台中師範校長的洪炎秋，曾促吳振武組織學生武裝隊伍，以防受共產黨謝雪紅控制。見洪炎秋「一個短命校長的雜憶」，

收入「三友集」台中中央書局。

註2：（周明的說明）一九五二年上海「台委會」整編時証實：二·二八暴發時地下黨員互相失去連繫，有的主動參加，有的不敢出面。大約三月十日前後（即國府援軍登陸後）台工委發出通知，命所有有黨員立即停止活動，隱蔽起來。謝富起初贊成武裝起義，他的兒子也參加了二七部隊。我們撤入埔里時，謝富通知L氏隨隊撤入，」第二天才趕到埔里，楊克煌叫L回台中請謝富籌軍費。14日謝富到埔里不但沒有帶軍費，反而通知謝、楊隱匿，並帶走了兒子（中僑學生）。我給L氏看過此稿，証實了以上事實，所以我們說的沒有矛盾。謝富可能直接受張志忠領導，而張志忠是積極領導武裝鬥爭的。黨員停止活動的命令是蔡孝乾以省工委書記的名義發出的。由此看來，省工委內部對起義有意見分歧。

註3：「香港會議」正式名稱可能是「中共中央華南局上海局聯席會議」，一九四八年六月份在香港召開。參加者有當時在香港的台灣共產黨員以及部分由台灣、上海去參加的黨員。

註4：根據葉紀東先生的回憶，是蔡孝乾。

王添灯先生事略

撰文／蘇新

王添灯台北市人，茶業資本家，擁有一家相當規模的茶行，時為。台灣茶業公會會長。一九四六年被選為「台灣省臨時參議會議員」，『自由報』『人民導報』社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時，被選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擔任宣傳組主任。事變失敗後，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被殺害。

王添灯辦「自由報」

大約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我頭一次和王添灯見面。我到『人民導報』以後不久，蕭友山（蕭來福）告訴我：王添灯請你到他家裏去坐坐。我問蕭：王添灯是什麼人？蕭說：是茶業公會會長，潘欽信是公會的秘書，想跟我們商量辦報的事。

當天晚上參加座談的有：王添灯、潘欽信、蕭友山，此外王添灯的一些友人也在座。潘和蕭說：「台灣光復」後，有必要辦一張「民間報」，但怎樣辦，辦多大規模，如何準備？王添灯說，辦報他是外行，但如果經濟上需要他幫助，可以量力而行。當時因為我沒有準備，只憑自己的經驗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說，一般說來，辦報有三種組織形式：一是組織「有限公司」，公開募股，選舉董事會和董事長（社長），作為一種企業來經營（如『民報』、『人民導報』）；二是作為一個政黨、社團的機關報來經營，由政黨、社團的領導機關（如過去的『大眾時報』是「台灣文化協會」

的機關報)來辦;三是作為「同仁報」,由若干「志同道合」的同仁自願出錢出力共同經營(如過去的『台灣文學』、『民俗台灣』)。但是,形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辦什麼樣的報。既然是「民間報」,應該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人民說話。

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把這三種形式比來比去,最後決定辦「同仁報」。『自由報』就這樣誕生了。王添灯擔任社長,蕭友山擔任經理,負責出版和財務。我答應再請幾個進步記者和編輯參加,義務供稿,由我編好後,交給蕭去出版。後來,先後參加的有『新生報』資料室主任王白淵,記者周慶安,『民報』記者徐延琛、蔣時欽;『人民導報』記者詹世平、助理編輯郭某等。以後不久蔡慶榮從日本回來,據說他在日本曾擔任過『華僑報』總編輯,由王白淵介紹,請他擔任『自由報』總編輯,一切經費由王添灯負擔。蕭友山兼任王的茶行職員,由茶行發工資,潘欽信仍擔任茶業公會秘書,由公會發工資,其他記者編輯不拿工資。但後來,王添灯還是酌量發了一部份「車馬費」,以示慰勞。

『自由報』到「二·二八」期間,時發時停,共發行了多少期,我也記不清了。但發行後,很快得到了讀者的好評,因為它比較能夠反映當時台灣人民的生活、鬥爭和要求,而且相當明顯地反映了當時台灣地下共黨的方針政策。當時『自由報』的基調是「台灣地方自治運動」。

「重慶談判」以後,公佈了『談判紀要』和『雙十協定』。國民黨極力封鎖消息。但李純青主編的『台灣評論』首先把『紀要』和『協定』發表出來,於是台灣人民也開始醞釀「台灣地方自治運動」。台灣地下共黨積極地支持了這個運動,這也符合當時共黨中央對蔣管區的方針政策的。

當時『自由報』的大部份「同仁」,都各自與地下黨有聯繫(有的是組織關係,有的是工作關係),各自對『自由報』發生影

響。我記得『自由報』前後受到台灣警備司令部的一次警告和一次停刊的命令,最後在「二·二八」期間被封閉。社長王添灯被殺害。國民黨統治台灣初期多數台灣人民對國民黨還抱有幻想的時候,『自由報』對於教育台灣人民,組織台灣人民起來反蔣,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而凡是想起『自由報』的人都會懷念王添灯先生。

王添灯在「台灣省臨時參議會」的鬥爭

王添灯在政治舞台上首次露出頭角的是在「台灣省臨時參議會」的鬥爭。陳儀為了欺騙台灣人民,在一九四六年×月(記得是初夏)演出了一場「假民主」的醜劇,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圈定一部份人,由全省性的人民團體推薦一部份人組成「台灣省臨時參議會」,作為「諮詢機關」,叫這些議員去聽聽「政府」的「施政報告」。當時所謂「施政報告」的主要內容是「接管台灣的經過」和「今後的施政方針」。

日本投降當時,台灣人民認為「祖國政府來了,今後可以不受歧視,不受壓迫,不受剝削了」。可是,沒有幾個月,台灣人民發現,他們受到了更大的歧視,受到了更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是來「劫收」台灣的。當時台灣到處流行著一句話:「五子登科」。「五子」是指條子、房子、車子、女子、金子。各機關、各派系為了搶奪房子,到處貼封條。所有日本人的房子、大小機關的建築物都貼上了五花八門的、莫名其妙的機關公章的封條。日本人留下的各種各樣的車子都被一搶而光。為了爭奪女子和金子,國民黨各派系的「同志」,竟演出「全武行」,打得頭破血流,在台灣人民面前露出了一羣強盜的原形。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受到了美軍空襲的很大破壞,大小城

市幾乎全受到轟炸，交通癱瘓，生產停頓，物資奇缺，民不聊生。但國民黨卻熱衷於搶劫，無心醫治戰爭創傷。台灣本來是一個糧倉，但竟出現了糧荒，奸商囤積居奇，市場有行無市，失業人羣到處流浪，火車站、公園、防空洞都成了乞丐的「集體宿舍」。國民黨的官員們「花天酒地」騎在台灣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台灣人民在「黑天暗地」裏叫喊：「中國啊！你是我的祖國嗎？」台灣人民能忍耐多久？他們對「祖國政府」的期望很快就像肥皂泡消失了。

「台灣省臨時參議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的，陳儀認為，台灣人民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半世紀的奴役和奴化是無知的羣氓，開一個這樣的會，裝一點民主，多喊幾聲「台灣同胞」，台灣人民就會感恩流涕，但他沒有想到，台灣人民的政治嗅覺是這樣的敏感。

「資源委員會」的接收大員在「參議會」報告「接管台糖企業的情況」以後，王添灯和林日高聯名出提「質詢」，追究台糖公司十五萬噸白糖的下落。據王添灯和林日高揭露，蔣幫「資源委員會」將台糖公司從日本人接收過來的十五萬噸白糖無償地轉交給貿易局運去上海，致使台糖公司缺乏再生產資金，不得不向台灣銀行借了四十億台幣。在上海出售的台糖，零售價格每斤一百三十元，但在台灣卻是每斤一百七十元，相差四十元，乘以十五萬噸（一噸兩千斤）僅台糖一項，台灣人民就被奪去一百二十億台幣。對這一揭露，國民黨官員啞口無言，狼狽不堪。

王添灯在質詢時問陳儀：「陳儀長官很關懷台灣同胞，開口閉口是台灣同胞、台灣同胞。對長官的關懷，台灣同胞非常感激的。但是很不幸的是，那些接收大員不是關心台灣同胞，他們關心的是台灣糖包，對這點，陳長官知影不知影！」

當時台北四家民間報『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自由報』採取統一戰線，統一用稿（四報記者採訪的新聞共同使用），

對省議會的鬥爭，進行了大量、集中的報導。記得當時四報都加倍發行，但大街上到處都有搶購報紙的人羣，羣衆拍手稱快。

第二天，王添灯和林日高又揭露了國民黨貿易局和專賣局的貪污舞弊案件。僅專賣局和貿易局兩局長就吞沒了接收物資幾千萬元台幣。最後不得不請兩位局長到會對質。

王添灯出人意外，質問專賣局長：

「你知不知道專賣局報銷七十公斤鴉片這種事？」

答：「據說是給白蟻吃掉的」。（引起哄堂大笑）

王問：「既然是給白蟻吃掉的，那麼，我提議：請幾個權威的科學家和醫生來試驗，看看白蟻吃不吃鴉片？」

王添灯提出了一個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人研究和試驗過的很有趣的科學問題。試驗結果，白蟻不吃鴉片，證明鴉片是人吞下去的。因此，專賣局長被扣受審，但這一案件後來卻沒有下文。

經過這一場鬥爭，本來除茶業界以外不大出名的王添灯一躍成爲台灣政界的著名人物。一個商業資本家從哪裏來的這種政治水平？我只提供一條線索：潘欽信是王的秘書，是王的智囊；林日高是王的至密朋友；蕭友山是王的茶行的職員，又是『自由報』的經理；上面這三人都是舊台共的領導人。此外，『自由報』的「同仁」都是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王添灯就是在這些人的包圍之中的。

王添灯拒絕美帝的利誘

有一次王添灯請我吃飯，蕭友山也在座，他對我們談過這樣的事情：參議會開會後不久，黃朝琴（議長）去看王添灯，黃對王說：「日人時代，台灣的紡織工業不發達，今後這一行大有希望，但要有能幹的人出來經營。長官（陳儀）很關心這件事。希望物色一個台籍的能幹的企業家擔任台灣紡織公司的董事長，許多人希望

你出來」。

王添灯哈哈大笑。「我只能做茶葉的生意。我多年經商，得出一條經驗：一個人最好不要去做自己不會做的事情。再講，我作為參議員對政府提出了一點點批評，這是我的責任，如果是因為我批評了政府，政府就請我去當什麼董事長，那麼，台灣人民將怎樣看待我呢！」

美帝國主義也在王添灯身上打主意。有一次王添灯叫我去商量如何對付警備司令部對『自由報』的警告，當時潘欽信也在場：王添灯向桌上攤開一張「請帖」，說是台北美國新聞處長卡爾 CAR（註1）通過翻譯陳振興請他去赴美國新聞處的茶會。王添灯問：「去好，還是不去好？」我看看潘欽信，潘欽信說：「去看看卡爾在茶會上說些什麼？其他人談些什麼？」

王添灯到會時，卡爾還沒有來，只看到七、八個台灣紳士（都是王認識的人，是些什麼人，記不清了），有的走來和王添灯握握手，有的坐在沙發上只點點頭，他們就跟王添灯聊起來，有的稱讚王添灯在議會的鬥爭，有的說『自由報』「很有意思」，有的開門見山，「台灣不能這樣下去了，最好是自治或者獨立，不知王先生有什麼高見？」

王添灯已經覺察到卡爾為什麼開這樣的「茶會」，也開門見山，對那些談論「台灣獨立」的紳士們說：「今天這個茶會真有意思，原來你們都是卡爾先生的好朋友，但真對不起，我是中國台灣省參議會的議員，你們對我談這樣的問題，未免太失禮！」並告訴翻譯陳振興：「請轉告卡爾先生，說他找錯了對象！」，就離開了。

以後的卡爾的一系列活動說明，卡爾的「台灣獨立」運動的陰謀，從這個時候就開始了。「台獨」的頭目廖文毅、彭明敏跟卡爾都有過密切的關係。彭明敏在美國寫了一本『回憶錄』，卡爾給他

寫了序文。卡爾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曾經在台北高等學校擔任過英文教師，實際上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

王添灯任「人民導報」社長

一九四六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丘念台的秘書林憲到『人民導報』編輯部來找我，說是丘念台叫他來告訴我，並要我立刻轉告宋斐如。

林憲說：「今天下午省黨部開會，討論『人民導報』的問題。李翼中（省黨部主任）主持會議，宣傳部長林紫貴提出：要向南京控告『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總編輯蘇新，根據是創刊以來的言論，特別是對於『東北問題』的立場，說『人民導報』裏面肯定有共黨份子。還沒有作出最後決定，因為丘念台先生及其他執委不同意。丘念台先生認為，台灣光復剛幾個月，如果過早地刺激台灣人民和輿論，對今後的工作不利，是不是先跟宋斐如先生談談。丘先生直接找宋先生不方便，所以叫我（林憲）來告訴你。丘先生的意思是宋先生主動找李翼中和林紫貴談談，必要時也可以作些妥協。」

深夜。「大樣」還沒有看完，我就立刻趕到宋斐如家裏。我把林憲的話轉告了他。宋斐如說：「明天馬上找他們」並囑咐我：「今後用稿慎重一些，特別是少轉載上海民主報刊的文章。他們認為我們定跟共產黨站在同一個立場」。

第二天下午，宋斐如給我來了電話，叫我通知主筆白克、（註2）經理宋某等到他家裏去開會。

「上午請李翼中和林紫貴到草山，吃了一頓午餐，我一個月的薪水就去了一半。」他說著，笑了一笑，「當面客客氣氣，背後卻殺氣騰騰」。他說，「省黨部要求改組『人民導報』，勸我辭去社

長職務，甚至威脅說，是當教育處長，還是當社長，兩者選其一，不得兼之。其次，撤換總編輯，由黨部派人去接任」。

「豈有此理！」沒有等宋斐如說完，白克就跳起來，「只許他們放火，就不許我們點燈！」一連說了幾句上海話，又加了幾個「他媽的」。

但宋斐如卻很鎮定，和平常一樣，用溫和的語氣繼續說：「沒有跟你們商量，我已經答應他們：我可以辭去社長，但撤換總編可以緩一緩，等蘇先生的去處安排好以後再說。作出這種妥協，是考慮到如果被控告，報館肯定將被封，我的教育處長也當不成，蘇先生也有可能被審訊，這樣，對報館，對我，對蘇先生都不利」。

「我覺得，把事情弄到這個地步，我應負大部份責任。」沒有等別人說話，我就想搶先表態，但宋斐如趕緊打一個手勢，笑了笑（笑一笑，再說話，是他的習慣），搶著說下去。

「請蘇先生不要誤解，我和其它人都沒有這個意思。蘇先生的問題以後再談，是否先談我辭去社長以後，請誰來擔任社長？這個社長必須有錢，有社會地位。『人民導報』還不能自養。」

這個社長，的確不好當，要有錢，要有社會地位，在羣衆中有威望，對辦報有興趣，又敢頂，又能頂，像這樣的人，哪裏去找？幾雙眼睛不約而同注視著我，他們以為我熟悉的人較多，對於辦報又有一些經驗……但我一下子也想不出有什麼適當的人。

「至於社長，我看，倒有一個比較合適的人，但不知道他肯不肯？王添灯，茶業公會會長，參議員，『自由報』社長，是一個『自由人』，當局卡不了他。是不是我先去摸摸底，之後，宋先再和他見面。」

「關於你的問題，……」宋斐如似乎有一點不安，這次沒有先笑再說了，「你自己有沒有想法，有沒有什麼打算？」我知道，宋斐如對於我的工作滿意的，也是信任的，現在不得不離開，可能

有點捨不得，但他更關心的是，給我安排一個比較合適的工作。

「關於我自己的問題，為了保護這張報紙，我可以辭職，我也同意緩一步，因為社長、總編同時退出，可能會引起社會上的各種猜測，影響較大。我的去路，問題也不大。我現在是台灣文化協進會的常務理事，我可以把這些情況告訴理事長游彌堅（當時台北市長）和常務理事會，我可以到那裏去。」

經過一段時間，『人民導報』登出了一條啓事，宋斐如辭去社長，王添灯就任社長。再經過一段時間，我也離開『人民導報』，到文化協進會，擔任宣傳組主任，主編『台灣文化』。

王添灯支持高雄農民的鬥爭

王添灯就任『人民導報』社長以後不久，就遇到一場「官司」。我還沒有離開『人民導報』以前，有一天簡吉急急忙忙跑進編輯部，說有急事要找蘇新。當時我正在印刷廠，助理編輯小郭在廠門口喊聲「蘇先生，有人找」，我馬上回來編輯部。每次有人來找我，我都馬上見，這已經成為習慣，不，這是我的工作需要，因為「會客」常常是「重大新聞」的來源。

簡吉是日治時代台灣農民運動的領袖之一，舊台共事件時被判十年徒刑，我們同在台南監獄「服役」。出獄後，我們沒有再見過面，只是聽說，日本投降後，他又開始搞農民運動了。一見面，他就緊緊握住我的手，「老蘇，高雄的農民又起來了！」就從公文包拿出高雄農民跟國民黨警察大隊武鬥的詳細材料，並簡單作了些說明：這場鬥爭的起因是高雄的一個地主組織一幫狗腿搶割農民的稻穀，引起衝突，地主請高雄警察局派大隊去鎮壓農民，打傷了人，有的已經抬入醫院……希望『人民導報』聲援他們的鬥爭。

我想，這件事必須報導，既然『人民導報』打出「人民」二

字，就必須名符其實地成爲「人民」的「報導」，如果連這樣的事件也不敢報導，必將在人民中間喪失威信。本來我有權處理這件事，但考慮到不久前發生的問題（指「省黨部」強迫改組『人民導報』一事），我也慎重起來，把這份材料給宋斐如、王添灯、陳文彬（主筆）看，並闡述我的看法，他們都同意我的看法，並授權給我妥善處理。宋斐如囑咐我：要準備應付警察局的控告，要有充分的人證物證才站得住腳。王添灯叫我派得力的記者到現場調查，訪問受傷農民，把他們的講話都記下來，同時到醫院去探望受傷農民和醫生，請醫生開診斷證明，把稻穀被割的現場、武鬥的現場、傷人都拍回來。我立即派呂赫若跟簡吉一起趕去高雄，並叫他如果情況屬實，打電報回來就登報。兩天以後，電報來了：「情況屬實」。於是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時間，整理出一篇報導。不出所料，見報後兩天，台北『新生報』（官方報紙刊登了一條「高雄警察局控告『人民導報』的啓事」誣蔑農民是「暴徒」，『人民導報』「爲匪張目」等等。「官司」終於打起來了，被告人是王添灯和蘇新。呂赫若也回來了，爲了反駁警察局的誣蔑，我又把記者的採訪記發表出來，同時打電報給簡吉，請他陪同受傷農民到台北來以備作證。

大約一個星期，台北地方法院就發出「傳票」，要王添灯、蘇新出庭受審。我和王添灯事先商量好：「你只承認知道這件事，關於怎樣報導，可問蘇新，一切由我來對付」。當天，旁聽人很多，簡吉和受傷農民也在旁聽席，隨時可以出來證。

開庭後，判官（閩南人，說閩南話）先問王添灯。王添灯按照我們商量的那樣，只回答了上面這幾句話。接著就問我：「這件事是你負責報導的嗎？」答：「是」。問：「有什麼根據？」於是我就把簡吉訪問報館的經過以及派記者到現場去調查的結果詳細地陳述了一遍，並把幾張照片遞給判官看，同時叫簡吉和受傷農民出來

作證。接著，王添灯又站起來，叫聲「判官大人，請讓我說幾句話，希望法院主持公道。地主和農民衝突，警察局只能進行調解，不應該偏袒地主，迫害農民，甚至打傷農民。判官大人，你們也知道，台灣同胞是如何歡呼台灣光復，如何歡迎祖國的親人，但不到一年就發生這種事件，我看，這是真不幸的……」

兩個判官接耳私語，不知說了些什麼？不到一個鐘頭，審訊就結束了。判官宣佈：「審訊到此結束，必要時再開庭」。旁聽席上，有人低聲說：「王添灯實在厲害」並以尊敬的目光送王添灯出去。

以後不但沒有再開庭，過了幾天『新生報』又登了一條啓事：高雄警察局撤銷對『人民導報』的控告。這個案件就這樣不了了之。事後，王添灯還到旅館慰問了簡吉和受傷農民，並交給我一包錢，對我說：「他們可能有困難，錢不多，你就說，報館給他們補助一點路費和這幾天的生活費……」當時我很感動，覺得王添灯這個人真會體貼人。

王添灯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鬥爭

「二·二八起義」發生後，陳儀爲了緩和台灣人民的不滿，更重要的是爲了爭取時間調兵來鎮壓，組織了一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是「政府官員、國大代表、參議員、省參議員」。王添灯是省參議員，所以他是「當然委員」。「處理委員會」的主任是黃朝琴（省參議會議長），王添灯被選爲「宣傳組」組長，王添灯的任務是每天會後發佈當天「處理委員會」的新聞公報，必要時到電台向全省廣播。

王添灯雖然在省參議會的鬥爭中已經顯出他作爲政治家的一定水平，但在這樣的重大問題，這樣的緊急時刻要擔負如此重大責

任，肯定是很艱巨的，所以潘欽信、蕭友山、蔡慶榮、蘇新，這些『自由報』的同仁自然地就成爲王添灯的「參謀」。他在會上的發言、提案、廣播稿都是這些人爲他起草的，王添灯的客廳成了「參謀部」，成了「參謀部」和王添灯之間的聯絡員，他整天往中山堂跑，送東西，不會引起別人懷疑。另一方面，蕭友山成爲「參謀部」和地下黨負責人之間的聯絡員。我們遇到重大問題或意見不都一致的時候。都一一請示地下黨負責人。我們起草『處理大綱』三十二條時，蕭就聯繫了好幾次，最後，據說「時間緊迫，來不及開會討論，就這樣提出去」。所以可以肯定這三十二條是經過地下黨同意的，事實也證明，這個『處理大綱』也符合同年三月八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支持台灣人民的地方自治運動』的精神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間，我在香港寫了一本『憤怒的台灣』，下面抄錄其人的一章：『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及其處理大綱』一部份。

三月六日，陳儀接到第廿一師已由滬開出，憲兵第四團也已離開福州赴台的中央密電，即召集柯參議長以下幕僚，在長官公署會議室，部署援軍開到後的作戰計劃，但是他對於昨天「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條件卻欣然接受，並向全體人民廣播，撒最後一次大謊。他說：他是如何忠國愛民，尤其是愛惜台灣同胞，所以他對於昨天處理委員會的決定甚爲關心，已決定如下幾點原則，希省民信賴政府，靜待全體的解決。(一)省行政機構已考慮將長官公署改爲政府。現向中央請示，一經核准，即可實施，改組時，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長盡量任用本省人士。(二)縣市行政機構，在準備手續完成的條件之下，縣市長民選定七月一日起開始實施，在民選以前，不稱職之縣市長，政府可免職，由地方民意機關推選候選人三人，圈定一人充任。(三)其他行政改革，俟省政府改組後，由其決定，縣市方面，俟縣市長調整後，由其決定，縣市方面，俟縣市長調整後，由其負責。

但是，對於陳儀這個廣播，大部份的處理委員們，卻不知道是陳儀的緩兵之計，而以爲陳儀有著誠意改革台灣政治，他們也已有出出風頭的日子了。

由於前天「處委會」所決定的「台灣政治改革案」，並不具體，於是推舉「宣傳組」長王添灯起草更爲具體的方案，要求陳儀付諸實施。三月七日，「處委會」照常開會。但是今天市面已盛傳大批蔣軍將到，人心甚是惶惑。今天的會議，旁聽者特別多，原來陳儀已經佈置許多特務混入會場，一則由陰謀破壞會場的秩序，二則由這些特務份子提出可以構成「罪責」的各種脫軌的要求，以爲鎮壓的證據。因此，會議一開始，就陷於混亂狀態。

王添灯說：「當局對於我們的政治改革要求，都無不接受，但是諾言與實行是兩件事，沒有附諸實施的諾言，對於我們有何用呢？數日來，各位委員和一般旁聽者，都提出了許多意見，今天可以總結這些意見的時候了。台灣的政治改革不是天天在這個地方鬧個不休就可以實現，所以我今天提出對於此次事件的處理和政治改革的最後方案，要求當局不可食言，必須附諸實施。如果當局祇有諾言，而不實施的時候，要怎麼辦，我無須在這裏說明了。」

對於王添灯一番「言順名正」「氣壯理直」的話，陳儀派去會場的特務份子，一齊咆哮，喧嘩吵鬧，會場頓時陷於混亂，無法制止。

但王添灯等到會場冷靜時，慢慢地起來說明他的「處理大綱」及「政治改革方案」，分爲：「對目前的處理」七條，「根本處理」（包括軍事方面五條，政治方面廿條）二十五條，共三十二條。在討論之間，其他代表再追加十條，其中有幾條與王氏的提案重複，因會場混亂，無法整理，以致雜亂不成體統，尤其是「根本處理」的「政治方面」第廿九條「本省人之戰犯漢奸即時釋放」，這條是由 CC 特務份子，國民黨台灣鐵道特別黨部書記長黃國信提

出，其他的特務份子叫喊贊成威脅通過的。這樣，這四十二條要求就成了「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之罪，成爲「大屠殺」的藉口。

「處委會」閉會後，代表即向陳儀提出這四十二條要求，但遭到陳儀柯遠芬的堅決拒絕。於是，這些委員們才覺到一向都被陳儀柯遠芬所騙，悔悟不得，灰心又不得。又因獲悉蔣軍已到，有的就跑了。

但王添灯卻泰然自若，以毅然的态度，於是晚向中外闡明這次台灣民變的原因經過及台灣人民的基本要求，其次向全省人民作最後的廣播，報告本日「處委會」開會經過，及所提要求被陳儀柯遠芬所拒絕的詳細情形，宣讀四十二條「處理大綱」。

最後他向全省人民呼籲：「處委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委會」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才能達成全體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同胞繼續奮鬥！

從此以後，台灣省民就不能再聽到王添灯氏的聲音，而且經過數日，王添灯氏就永久與台灣人民離別了！

「處委會」所提四十二條

「處理大綱」如下：

一、對於目前的處理

一、政府在各地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裝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二、政府武裝部隊武裝解除後，地方之治安應由憲兵共與非武警察及民衆組織共同負責。

三、各地若無政府之武裝部隊威脅時，絕不應有武裝戰鬥行爲，對於貪官污吏不論其爲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理

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不應加害，而惹出是非。

四、對於政治改革之意見，可條舉要求條件，向省處理委員會提出，以候全盤解決。

五、政府切勿再移動兵力，或向中央請遣兵力，企圖以武力解決事件，致發生更慘重之流血，而受國際干涉。

六、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七、對於此次事件不應向人民追究責任者，將來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對於因此次事件而死傷之人，應從優撫恤。

二、根本處理

軍事方面：

一、缺乏教育和訓練之軍隊，絕對不可使駐台灣。

二、中央可派員在台徵兵守台。

三、在內陸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台灣爲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台徵兵，以免台灣陷入內戰漩渦。

四、本省陸海空軍應盡量採用本省人。

五、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政治方面：

一、制定省自治法，爲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二、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三、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爲省議會）之同意，

省參議會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公署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四、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各處長及各縣市警局長，應該如是）。

五、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警察即刻廢止。

六、法制委員會委員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七、除警察機關以外，不得逮捕人犯。

八、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九、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十、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

十一、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紙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十二、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十三、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

十四、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十五、實行所得稅統一累進稅，奢侈品稅相續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

十六、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充任。

十七、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如接收工廠礦應置經管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

十八、撤消專賣局，生活必須品實施配給制度。

十九、撤消貿易局。

廿、撤消宣傳委員會。

廿一、各地方法院長各地方主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廿二、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過半數以本省人充任。

廿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以前，暫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此條與第一條重複）。

廿四、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產生的方法，各由鄉鎮代表選舉候選人一人，然後再由該縣參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

台北市二名，台北縣三名，新竹市一名，新竹縣三名，台中市一名，台中縣四名，台南市一名，台南縣四名，基隆市一名，彰化市一名，高雄市一名，嘉義市一名，高雄縣三名，台東縣一名，花蓮縣一名，澎湖縣一名，屏東市一名。

廿五、勞動營及其他必要之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廿六、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省政府自行清理（此條與第十七條重複）。

廿七、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受之利益，應切實保證。

廿八、本省自六月一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

廿九、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三十、送與中央食糖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時值估計，撥歸台灣省。

王添灯是怎樣死的？

三月八日，蔣軍廿一師從基隆登陸，當天晚上就殺入台北。接著蔣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也開進台北，開始捕人。三月十二日夜裏，王添灯住宅被蔣軍包圍。蕭友山爲了保護王添灯，自從「二·二八起義」以來，一直在王添灯家裏住宿，當晚，蕭叫王同他一起從後院窗戶跳出去，但王卻從旁門躍出去了，那裏已有蔣軍把守，結果沒有逃成，被捕。蕭友山逃脫了（以上據蕭友山的回憶）。

王添灯被捕後兩三天，就傳出王被殺的消息（也許是蔣幫故意透露以試探人民的反應）。但誰也不知道王添灯是怎樣死的？他的家屬也始終沒有能夠領回王的屍體。

「二·二八起義」失敗以後我逃出了台灣，從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香港。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次莊希泉（現任人代常委）帶我們（謝雪紅、楊克煌、周明、丁光輝等）到香港鴨二洲去參觀廈門同鄉經營的「麵線廠」。廠長請我們吃「肉麵線」、「魚麵線」。莊希泉向廠長和廠的工人們介紹說：「這些台灣同胞是台灣二·二八起義失敗後逃出台灣，到香港來的。」一個青年工人就說：「我也是二·二八以後離開台灣的……。」

其它人在參觀工廠的時候，我就和這個青年工人聊起來（可惜，當時沒有問清楚他的姓名）。據這個工人說，他是廈門人，被抓去當兵。在憲兵第四團（團長是張慕陶）當憲兵。張慕陶審訊王添灯，跟張慕陶大聲爭辯，他被打得很厲害，鮮紅的血從臉上往下流，後來滿頭滿面都是血塊，但是王添灯絕不屈服，大罵張慕陶。他很害怕，覺得太殘忍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他看到王添灯被燒死的情景。當時正好是他站崗，從審訊室聽到張慕陶罵王添灯：「你這個野心家，想當台北市長……」。王添灯回答說：「我從來沒有想

過要當台北市長，我就當……」。張慕陶暴跳如雷，「好！就讓你到（陰）間去當台北市長吧！」，命令衛兵往王添灯身上潑汽油，從頭上到腳底，都是濕淋淋的。最後拉到一個地方，點火把他燒了。王添灯大喊大叫，但不知道喊些什麼，因爲那個青年嚇得暈倒了。以後，覺得台灣這個地方太可怕了，所以就設法離開台灣到香港來。

一九四九年，「二·二八起義」二週年那一天，我到「大春行」去看林田烈，正好蕭友山也在那裏。大家都是同一個原因被趕出台灣的。「二·二八」這個日子，誰也忘不了。我就和蕭友山談起王添灯的死。「王添灯死得真慘！」我就把在鴨二洲麵線廠聽到的情況告訴了蕭萬山。蕭熱淚盈眶，好久說不出話。「王添灯死了，太可惜」，蕭說：「蔡（註3）的說過：王添灯在我們黨最困難的時刻，爲黨犧牲了。我們黨正需要更多的像王添灯這樣的開明資本家……」。

「是啊！在黨最困難的時刻，爲黨出力，爲黨犧牲了……王添灯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分鐘，還念念不忘台灣人民，台灣人民將永遠懷念他！」我這一句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對別人說的，還是對自己說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台灣人將永遠紀念這個日子。

王添灯，台灣人將永遠懷念這個人。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寫於北京）

【若干說明】

- 本文係一九八〇年歲末，蘇新託友人李黎帶給我的幾篇手稿之一。詳見「關於蘇新回憶錄音的整理」（「台灣與世界」第六期，一

九八三年十一月)。手稿卷頭有蘇新的手批「可以了解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我的一些情況」。

• 本文題目原為「王添灯」，發表時依編者建議改為「王添灯先生事略」，除此而外，全文均保持原狀，未做任何更動。小標題亦為原文所有。

• 本文所涉及的人物頗多。本人曾請教學者專家及前輩，做了一番考證。有三個必要的人物補註，考證後，認為目前仍不宜發表者，故暫略去，俟適當時機補入。

蔡福同識

【註解】

註1：此處顯係蘇新記憶有誤。時任台灣美國新聞處長者為 ROBERT J. CATLO。依文意推斷，此處所指者可能是當時美國駐台副領事 GEORGE H. KERR，即「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 一書之作者。

註2：參見「懷白克」一文。江南著，「台灣與世界」第四期，一九八二年九月。

註3：據推斷，「蔡」應指當時中共地下黨在台灣之領導人蔡孝乾。蔡氏在一九五〇年被捕後叛變，向國民政府反正，導致地下黨的迅速潰滅。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四年三月。

關於「二·二八事件 處理委員會」

蘇新遺稿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四日，台盟鄭洪溪（註1）打來一個電話，一 叫我到陳文彬（註2）家裡去，說是「台灣兒女」的作者翟俊杰要向我了解「台灣二·二八蜂起」的情況。

我們談了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熱心於為台灣題材的作家。我們的談話雖然主要是如何修改「台灣兒女」，但也談到許多有關台灣問題的看法，其中之一，就是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是戰線，不是路線

據老翟說，在北京的台灣同志有人認為「二·二八蜂起」時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主張「武裝鬥爭」，一條是主張「談判」，而代表「談判」路線的就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他問我：當時是不是這樣？

我認為，把當時的武裝鬥爭和「處理委員會」對立起來，作為兩條路線的鬥爭來認識，是很不恰當的。我認為，這是兩條戰線，而不是兩條路線。

平常時，我們講「路線鬥爭」是指黨內的正確路線和「左」、右傾的錯誤路線而言。中共歷史上有過十一次重大路線鬥爭，都是

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我沒有聽說過，「二·二八」蜂起時，台灣地下黨內有過主張「武裝鬥爭」和主張「談判」的兩條路線鬥爭，更沒有聽說過「處理委員會」就是代表「談判路線」。

我們對「處理委員會」應該有一個正確的看法。「處理委員會」並不是我們黨提出的，而是陳儀提出的。陳儀裝出一副公道、民主的面孔，指定有關官員、省參議員、參政員、國大代表組成「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二·二八事件」。

地下黨和處委會的聯繫

陳儀開始的想法也許是爲了把大事化小，把小事化了，來緩和台灣人民的不滿。但是，事情很快就發展到台灣的政治改革。代表也擴大到包括全省性的人民團體的代表。這樣，本來是作爲「調解」機構出現的處理委員會，終於變成台灣人民的各種政治力量和蔣介石集團進行政治鬥爭的場所。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台灣地下黨應該怎樣對待「處理委員會」，怎樣應付這場鬥爭呢？

如果當時「處理委員會」裡面有黨員，這些黨員要不要參加？我認爲應該參加；如果代表裡面沒有黨員，要不要在代表裡面爭取一些同情者作爲黨的代理人，在「處理委員會」進行鬥爭？我認爲，應該這樣做。

「處理委員會」裡面，除敵人以外，還有各種派別——左、中、右。我們的方針是爭取中間，壯大左派，孤立右派，打擊敵人。即使「處理委員會」是純粹爲了談判，我們也應最大可能地爭取有利於人民的條件，何況「處理委員會」不僅僅是爲了談判，更重要的是利用這個講壇，揭露敵人的陰謀和欺騙，去打擊敵人；一方面宣傳、鼓動和教育羣衆，促使羣衆起來鬥爭。

武裝鬥爭是針鋒相對，談判也是針鋒相對。不估計敵我力量，

不分析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一概反對「談判」是不對的。難道毛主席到重慶去和蔣介石談判，毛主席、周總理、董必武副主席參加「參政會」都是錯了嗎？

根據「二·二八」當時的敵我力量對比和當時的客觀形勢，我認爲當時台灣地下黨對「處理委員會」的方針是正確的，工作也有成效的。

當時，「處理委員會」的委員裡面沒有黨員，所以地下黨及時地把王添灯（註3）、林日高（註4）等人，作爲黨的代理人爭取過來，而且通過他們爭取了不少人，形成了強有力的左派隊伍，還爭取了中間派，孤立了黃朝琴一伙的右翼，打擊了敵人。陳儀的官方代表終於退出了「處理委員會」。

「處理委員會」只開了七天，這七天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是一場「狂風暴雨」。以王添灯爲代表的左派控制了整個「處理委員會」。王添灯的提案受到了多數代表的贊同，他的發言引起了一陣陣的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

王添灯、林日高是完全按照地下黨的方針、指示進行了鬥爭的。當時我們始終與地下黨的負責人保持著密切的連繫。當時的關係如下：

蔡前（註5）

廖瑞發

蕭友山（註6）

潘欽信（註7）蕭友山 蔡子民（註8）

小郭 ××× 蘇新

×××

王添灯 林日高

處委會

我們幾個人，實際上就是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參謀部。當時，王添灯的發言、提案、廣播稿都是我們給他準備的。遇到重大問題或意思不甚一致的時候，都經連絡員蕭友山請示廖瑞發（又名廖煙，舊台共），再由廖請示蔡前的。

「處理大綱」是正確的

不要因為蔡前後來（一九五一年以後）叛變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以前正確的就是正確的，以後叛變是以後的事情。對於歷史事件必須保存原來的真面目，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愛好、恩怨來加以篡改。至於因為嫉妒，故意抹殺別人，歪曲歷史，那就更加惡劣了。

關於「處理大綱」，今天也有人非議。說「處理大綱」是「台獨」的先聲，「處理委員會」是「台獨」的影子。我想：這個先生大概是國民黨的孝子賢孫。我認為，「處理大綱」要區別「三十二條」和「四十二條」。我們準備的（經地下黨同意的）是三十二條。後來變成四十二條是因為在最後一次會議上，有些代表再增加的（多數是與三十二條重複），有的是國民黨特務為了製造構成「叛國罪」的證據，起哄、亂叫、強迫會議通過的（我在「憤怒的台灣」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我們提出的三十二條，根據當時的台灣的具體形勢，我今天仍然認為是正確的，是代表台灣人民的利益的，完全符合黨中央的方

針、政策的。當時台灣地下黨是正確貫徹執行了黨中央的方針的。

貫串三十二條的基本精神是「地方自治」。重慶談判的「會談紀要」和「雙十協定」裡面有關於「地方自治」的條款。如果這些條款附諸實施，可以大大地削弱國民黨在蔣管區的統治力量，對我們是有利的。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的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支持台灣人民的地方自治運動」就體現了當時黨中央對台灣二·二八蜂起的方針政策。

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從今天的已經變化了的形勢或已改變了的方針、政策，去看過去的歷史事件，我認為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不能因為我們今天反對「台獨」，就否定當時的台灣地方自治運動。當時的地方自治運動是向國民黨統治者要求自治，是爲了削弱國民黨的統治力量，擴大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而不是爲了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不能和今天的「台獨」相提並論。我們說，「二·二八」是「反蔣」，蔣幫說是「叛國」，「台獨」份子說是「反中國」，哪一種說法對，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是最好的注釋。三十二條，條條是「反蔣」，沒有一條是「叛國」，也沒有一條是「反中國」，即使是後來增加的十條，雖然提法不妥，但也不成爲「叛國」或「反中國」的東西。

光輝的蜂起事件

還有人非議說：「處理委員會」是陳儀的工具，陳儀利用了「處理委員會」的談判，討價還價，拖延時間，調兵來鎮壓，甚至把「二·二八起義」的失敗歸咎於「處理委員會」。

我認為，這種看法也是片面的。

陳儀利用了「處理委員會」，我們也利用了「處理委員會」。

陳儀利用「處理委員會」的談判，爭取時間調兵；我們則爭取時間，組織人民武裝。「處理委員會」僅僅存在一個星期。在這一星期，蔣幫的黨政機關已經完全癱瘓，特別是「處理委員會」成立「政務局」以及各縣市也成立「處理委員會」以後，蔣幫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局勢的能力。而地下黨恰恰抓住了這個大好形勢，大膽地、迅速地建立了各地的人民武裝力量。

在這麼短時間內，如果沒有各地「處理委員會」來牽制蔣幫政權，地下黨能夠這樣迅速、這樣大規模地建立武裝，進行這樣廣泛的武裝鬥爭嗎？在沒有一槍一卒情況下，在短短的一個星期內，能夠組織全省人民起來進行如此英勇的武裝鬥爭，在台灣革命史上也是沒有的，在祖國大陸，除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外，也是罕見的。

我們應該這樣來估計當時各地處理委員會所起的積極作用：儘管處理委員會裡面有一部份壞人進行破壞和搗亂，這些破壞和搗亂都始終沒有得逞。

形勢不利非戰之罪

至於「二·二八起義」失敗的原因，也應該有正確的分析。「二·二八起義」的失敗，不能歸咎於「處理委員會」。「處理委員會」（省的和縣市的）始終沒有作過「決議」反對武裝鬥爭。王添灯的演講和廣播都是鼓勵「全省人民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從來沒有說過「你們不要鬧，靜待處理委員會的處理」之類的話。當然，在那樣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也不應該公開提出「你們不要等待處理委員會，趕快起來進行武裝鬥爭」之類的話。到最後一次向全省的廣播時，王添灯才提出這個號召。所以，認為「處理委員會」妨礙了武裝鬥爭，是沒有根據的，也是沒有理由的。

那麼，是不是由於當時地下黨領導不力？否！當時的地下黨的領導是很得力的，方針、政策也是很正確的。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看到台灣人民起來以後，勇敢地站出來，果斷地決定武裝鬥爭，並且把所有力量都投入了這場鬥爭，在短短的一個星期內，組織了那麼多的武裝力量，最後還召開了全省性的武裝鬥爭的會議，有組織地展開了武裝進攻，這是很寶貴的。

那麼，是不是台灣人民不勇敢？大敵當前，不敢前進？否！台灣人民是非常勇敢的，青年學生能參加戰鬥的都參加戰鬥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農民提供糧食和戰用物資，婦女也出來護理傷員，有的家庭，父子、兄弟都被殺害了，仍不畏懼，繼續戰鬥。

二·二八起義的失敗，都不是什麼人的過錯，而是當時整個中國革命戰爭的形勢的必然結果。就台灣一地而言，中共在台灣開始建黨還不到一年，沒有多少黨員，工人農民還沒有組織起來，在工人農民中間還沒有紮根。

二·二八起義是「官迫民變」的自發事件，事前毫無準備，誰也沒有預料到，國民黨到台灣一年半就會發生這樣大規模的反蔣鬥爭。當時，在祖國大陸的解放戰爭仍處在敵強我弱的階段，蔣幫幾百萬軍隊正在向整個解放區推進，我們是守勢，這樣，就使敵人能夠抽調兩個師的兵力來台灣進行鎮壓。

但反過來說，由於台灣人民的二·二八蜂起，迫使敵人不得不從蘇北戰爭抽調兩個師來台灣，這樣就牽制了敵人的兵力，削弱了蔣軍對解放區的進攻，在這一點上，台灣人民在當時的解放戰爭中，付出了重大代價，作出了一份貢獻。

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七日於北京

【若干說明】

一、本文係蘇新生前交給我的幾篇手稿之一，其他已發表的有「連溫卿與文化協會」（「台灣雜誌」#18,2/82）和「王添燈先生事蹟」（「台灣與世界」#9,3/84）兩篇。（詳見蔡福同：「關於蘇新回憶錄音的整理」，「台灣與世界」#6,11/83）。

二、蘇新寫成本文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本人接到手稿亦早在一九八〇年歲末，惟因本文內容較為敏感，頗有涉及爭論之處，處理時力求慎重，迄今方決定發表。並幾經考證，隱去數處人名，係目前尚不宜發表者，同時也加了幾個人物註腳。

蔡福同識一九八七年一月廿日

【註解】

註1：鄭洪溪，台灣彰化人。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後離開台灣，現居北京。參閱鄭洪溪：「回憶台灣四·六事件」（「台聲雜誌」#3,1984）。

註2：陳文彬，台灣高雄縣岡山人。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哲學系畢業。一九四六年返台，先後任台灣大學、師範學院教授，台北「人民導報」總主筆，建國中學校長。二·二八事件後為保釋學生，為警備總部拘禁數月，一九四九年五月再受通緝離開台灣。到大陸後，長期從事文字改革研究工作。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病逝於北京，終年七十九歲，生前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

註3：王添燈，台北市大稻埕人。茶業公會理事長，第一屆省參議員，「自由報」、「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一九四七年三月初遇害。參見蘇新：「王添燈先生事略」（「台灣與世界」#9,3/84），本書40頁。

註4：林日高，台北縣板橋人。日據下，台共中央委員，曾坐牢五

年。戰後第一屆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事件後坐牢數月。一九五五年以掩護匪諜罪名被判死刑。

註5：蔡前，本名蔡孝乾，彰化縣鹿港人。日據下台共中央委員。井岡山蘇區人民教育委員會長，參加過長征。一九四六年返台發展組織，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九五〇年被捕後投降，導致中共台灣地下黨迅速潰散。

註6：蕭友山，本名蕭來福，屏東縣人。日據下台共礦區工運領導人，曾坐牢十年，二次大戰末期出獄。二·二八事件後逃離台灣，經香港到大陸，遭遇坎坷，曾一度精神失常，現居北京。

註7：潘欽信，日據下，台共中央委員，中共廈門市委書記，台共案被日人判刑十三年，二次大戰末期出獄。二·二八事件後逃離台灣到大陸，境遇極為坎坷，一九五〇年代初自殺未遂，不久病故。

註8：蔡子民，本名蔡慶榮，彰化縣二林人。一九四六年台北「自由報」主編。二·二八事件後到大陸定居。參見葉芸芸：「三位新聞工作者的回憶」（「台灣與世界」#39,3/87），本書94頁。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七年三月

周明談二·二八

周明口述·何昉訪問整理

我畢業於台中商業專科學校，在校時我就崇敬孫中山先生，讀過日文版「孫文全集」；曾經為首組織「反日研究會」；多次設法要到重慶參加抗戰，但沒有成功。當時我相信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國民黨能夠救國救民。

一九四七年，那時我家很窮，白天我在台北一家「中外日報」（董事長是林宗賢）當會計，晚上到延平學院讀書。二月廿七日那天台北發生查緝私煙事件，當時第一個發現此事趕到現場去採訪的是吳克泰和周青（現在均在北京），他們寫完報導後又和該報專員徐淵（已犧牲）及陳本江（已在台灣病逝）一起回到現場去。次日清晨，一夜未眠的吳克泰跑回報社告訴我這消息。這一天「中外日報」第一個闖關發表這篇詳細報導。報紙一出，頃刻售完，影響很大。當時大稻埕（貧民窟）的窮人馬人上敲鑼打鼓示威，要求把殺人犯交出懲辦，羣眾派代表進去與專賣局談判，局長溜掉，只有小職員在那應付，羣眾很生氣，於是轉向台北市專賣分局，衝進去把東西燒掉，還打死了一個人。我當時在現場，看見來了一卡車的憲兵，被羣眾圍住，沒辦法只好溜走。羣眾眼看沒結果，就到長官公署去請願，衛兵從屋頂用機關槍掃射，打死幾個人，打傷了不少人，我聽到槍聲跑到現場。到了這地步，羣眾忍無可忍，於是有人佔領廣播電台，馬上向全台灣廣播，號召台灣人民起來鬥爭。二二八事變為什麼全台灣很快就能動員起來，除了羣眾早已存在普遍的憤怒情緒外，我看報紙、電台這些傳播工具比較發達是個很大原

因。

我親自參加過兩次集會，一次是在全台北的學生大會，另一次是延平學院學生會。全台北的學生大會先開，要長官公署的人出來，與他們辯論。結果下面的處長局長出面，陳儀沒有出來；當時學生上台講話很有條理，不是胡鬧，國民黨那邊也有學生上台替國民黨辯護，一下子便被人轟下台。

還有一次是延平大學學生會，當時延平大學多是窮學生，大家一一上台發表意見，認為過去日本人壞，但他還有他的法律，打死人至少要懲辦，而今國民黨腐敗透頂，打死人還能無法無天。事到如此，只有武裝鬥爭。

查緝私煙案只是導火線

二二八事變以前，我聽到一件事，當時蘇澳在懸崖上有一條公路，有一輛公共汽車開到一半，被國民黨士兵攔下，要乘客下車，讓他們上車。司機起先不肯，說人家買了票怎麼好趕人家下去，國民黨士兵賞了他耳光，司機只好讓乘客下車，待國民黨士兵上車後，司機便將汽車開落懸崖，與之同歸於盡。類似此事發生很多，查緝私煙之事只不過是導火線。事到如此，羣眾要求武裝鬥爭，是很自然的。

台北的青年、工人、農民、學生決定奪取武器庫攻打軍營和國民黨首腦機關，但因國民黨兵力集中在台北，並已做好對付我們的準備，我們攻打不進去，眼看台北起義一時沒有希望，我們聽說台中也已揭竿而起，公推謝雪紅為首領，佔領所有國民黨的黨政機關和飛機場，宣布成立台中人民政府，於是同學們說我們到台中去拿武器，再回台北鬥爭。我於三月三日晚來到台中。這時以林獻堂為首的士紳也組成「台中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掌握著一部份隊伍

的槍彈，由吳振武指揮。當時謝雪紅手下有台中師範、台中一中、台中工藝學校、台中商業學校等學生組成的隊伍，還有在嘉義攻打嘉義機場沒有成功的黃文輝也帶一個小隊來了，謝雪紅叫我指揮這批命名為「二七部隊」的隊伍。

三月八日國民黨廿一師登陸基隆，十一日台中市盛傳國民黨部隊即將攻佔台中。謝雪紅指命令我連夜把部隊撤到埔里。那時撤退只有兩百人，許多人沒有趕上。由於大家是自發性地參加，組織性不強，動搖離隊的有，繼續來參加的也有。他們當中有前日本軍台灣籍官兵、有大學生、有農藝師、有醫師、有前日本軍工廠工人、有遠自員林、北斗等地來的農民。

「二七部隊」撤至埔里

十一日下四點左右，謝雪紅和楊克煌帶領一小隊人先到埔里準備營地，隨後我帶領全體隊員，有秩序地分乘數輛卡車撤退。路經草屯時發現一個前日軍遺留下來的倉庫，裡頭堆滿軍用被服，我們就「順手牽羊」悉數搬走。發現這倉庫的叫何建人，是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的隊長（事變後他潛入左營海軍基地，以後又偷渡來大陸參加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隊伍，十年前病逝於上海）。

十二日拂曉全部抵達埔里，駐屯於謝雪紅事先安排好的埔里國民學校，台北查緝私煙事件發生於廿七日，為紀念它，原先謝雪紅命名我們這個隊為「二七部隊」，但到了埔里後就改名為「台灣民主聯軍」以示誓死為民主而鬥爭。安頓好住食後，謝雪紅對全隊人員演講，她申明，我們是掃除貪官污吏，打倒獨裁統治，建立民主自治的台灣而奮鬥，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為了避免影響國民學校正常上課，下午我們遷到了前日本警察局的「武德殿」。這天晚上，以區長為首的幾個地方士紳來和我們談判，要我們放下武器投

降。我們當然嚴詞拒絕，但我表示為了居民的生命安全，我們決不在鎮上打，要打就在遠離居民點的地方打，保證不損傷老百姓一錢一物。謝雪紅、楊克煌還對他們曉以大義，說明我們鬥爭的目的，並希望他們合作。可是這個區長執迷不悟，第二天清晨乘車逃往台中了。區長既然不與合作，我們就毫不客氣地佔領了區公所和警察署（警察署長以下，早已逃之夭夭），還繳獲了不少槍彈。當夜我叫醒了因連日疲勞正在熟睡的何健人及台中師範學生隊隊長呂某，叫他們連夜寫檄文（內容是曉明大義，號召人民奮起戰鬥）散發。

霧社青年加入陣營

十三日，謝雪紅、楊克煌前往霧社，說服鄉長（曾留學日本的山地同胞）與我們合作。這位鄉長儘管內心贊同我們，但有鑑於霧社事件的慘痛教訓，又畏於國民黨淫威，表示難色。但霧社青年卻不顧這些，第二天就有一批青年下山來加入我們的隊伍。他們在以後的戰鬥中表現很勇猛。我們的隊伍中也混進了軍統分子，早在台中時，我們就曾經抓住二十多名。到了埔里，何健人又發現一名軍統特務，兩名蔣軍二十一師某團的偵察兵，當場抓住投進警察禁閉室。

我們的隊伍紀律嚴明，不犯老百姓秋毫，偶爾稍有所犯，我們也不輕易放過。這天晚上有兩名當過日本兵的農民擅自離隊出去嫖妓女。第二天一早我們就成立臨時軍事法庭加以審判，我自任審判長，裁判結果是：准予戴罪立功。第二天攻打日月潭蔣軍時，這兩名隊員很勇敢，始終衝鋒在前。

蔣軍兩團·兩路追來

十四日，蔣軍二十一師兩個團分兩路追來，他們摸不透我們虛實，像烏龜爬行，遲遲不敢靠近。其中一個團有個自稱參謀的打電話來，聲稱要和「民主聯軍」司令對話。我叫何健人「熱情接待」：

「我是××團參謀，要和你們司令講話。」

「我也是參謀，兵對兵將對將，你就跟我講吧。」

「你們有多少人？」

「無可奉告。不，不計其數，草木皆兵。」

「我們兵力強大，勸你們投降，祇要放下武器，我們不咎既往，保證生命安全。要不然我們就要進攻了。」

「武器是不放下的，但熱烈歡迎你們進來，多多益善，保證熱情接待！」

我召集全體隊員，先是何健人報告敵情，接著我講了一些鼓舞的話：「……不鬥祇有死路，祇有鬥爭到底才有活路。」最後是謝雪紅演講。她一講頓時士氣昂揚，有些戰士還對空鳴槍，表示誓死戰鬥的決心。

敵軍的威脅反而堅定了我們的鬥志，而且還召來了更多的勇士，附近的農民、小販聽說蔣軍進犯，紛紛進來入伍，我指定一名有戰鬥經驗的戰士訓練他們用槍。來一批訓練一批，訓練好就立即開往前線。這樣來一批去一批，整日陸續不斷。我派黃文輝帶一個隊去龜仔頭狙擊打電話勸降的那個團。他們兩天兩夜沒法前進半步。當日傍晚我自己帶領一隊襲擊另一個龜縮在日月潭的團。我們沿路繳獲警察所的槍彈，打到日月潭北面（離魚池不遠）的一個橋頭和敵軍前哨相遇，不到五分鐘橋頭堡的敵軍就繳槍投降，跪在地上直發抖。過了一會，傳來了陣陣馬達聲，敵軍乘卡車逃命了，實

在不經打。我們邊追邊打來不及乘車逃的。前面講到的那兩位「戴罪立功」的戰士衝在最前面追打，為防埋伏我們沒有戀戰。凱旋回營時，那兩位戰士押著俘虜，抿著嘴對我說：「司令，你看我是不是孬種？」，這叫我怎麼說呢，我忙拍他肩膀說：「不是，不是，是好樣的！」

就在這天晚上，謝雪紅、楊克煌前往竹山的小梅，聯絡那裡的一支由馬來亞歸僑陳某（據傳已被捕犧牲）領導的起義隊伍，打算將來我們兩隊合流。

軍款糧食被盜

十五日，發現軍款和糧食被混進來的壞人盜走。這一天從龜仔頭進犯的敵軍終於爬行到離埔里鎮不遠的吊橋對面小山丘上。兩軍隔江對峙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我們已糧盡彈竭。退入霧社怕山地同胞不理解不合作，小梅的隊伍又還沒有聯繫上，在這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祇好分散隱蔽，待機重舉義旗。我叫大家把武器埋起來。那時候我還有點錢，就分給大家，叫大家趕快分散。大家走了以後，我一個人躲在教室，眼看著敵人進來，準備好的幾個手榴彈沒有爆炸。我化裝和躲在山上的老百姓一起走出埔里鎮。途中經過一座吊橋，有國民黨站崗，我就大搖大擺地走過去，崗哨叫住我，問我手上包袱裡有什麼東西，我說是衣服，於是慢慢吞吞地解開包袱，崗哨怕我包袱中有槍，趕忙說不要不要，就叫我過去了。可是當時國民黨已是驚弓之鳥，跟他們鬥爭，不是我們怕他們，而是他們怕我們、怕老百姓。

從埔里出來以後，我就到竹山找到謝雪紅。然後再到小梅找到那位從馬來亞回來的華僑陳某。我跟他約好，我要去找原來的隊員，再來增強他隊伍的力量。可是第二次我想再進去的時候，他們

已經打起來，所以我進不去。從此以後，我就掩護謝雪紅到處躲藏了。

保護謝雪紅

我永遠忘不了一件事，就是那時在竹山給我們做聯絡的T家。T家三代英雄，他的祖父在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台灣時，參加義勇軍犧牲了，他的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共產黨員，被捕在獄中給打死，他本人是廿歲左右的獨子，二二八時參加圍攻嘉義飛機場犧牲了，T家三代人都是為台灣人民而犧牲的。

謝雪紅要到竹山去時，跟我約好，只要到竹山找到T家就能找到她。我們聯絡暗號是，找到T家僅剩的寡母，燒三支香，向T家靈位三鞠躬。我去時照做，T母即為我帶路。這一家人的遭遇最能說明台灣人的命運。

當時我並不知道謝雪紅是否是中國共產黨員，只知道日據時代她是共產黨員。她當時能做為台中地區的領袖，是因為她在日據時代反對日本統治被關了幾年，就憑這一點，羣眾很尊敬她，認為她是抗日女英雄，所以擁護她。

二二八鬥爭失敗後，我想我們還要繼續鬥爭下去，要留革命的種子，謝雪紅是我尊敬的羣眾領袖，我們一定要保護她。由於我過去學過柔道、少林拳，有點自信，所以就主動保護她。這樣我們就到彰化，住在朋友家裡，這些人知道我們剛從埔里出來，嗓子都啞了，就買楊桃給我們吃，治嗓子。後來從彰化到××，那裡有過去參加農民運動的一些骨幹，帶我們去一位貧農家，僅說我們是他的朋友，要住在他家，這位貧農也不問我們是什麼人，其實大家心裡有數。他雖然很窮，可是每天都弄很好的東西給我們吃，甚至鄰居看到我們，拿一隻火雞來（當時火雞很少，比雞還貴），不好說送

給我們，很便宜地賣給我們。白天我們躲在甘蔗園裡頭，這位貧農就在旁邊除草警戒。當時局勢很緊張，到處都有謝雪紅、楊克煌的照片和通緝令，懸賞廿萬台幣（那時工資一般月薪一千塊以下）。

最後一次跟母親見面

從埔里出來後，有一次我回到家裡，家裡急壞了，說憲兵剛走半個小時，叫我趕快逃。這是最後一次我跟母親見面。我母親帶我到附近的一個農民家，火車快要來了，我兄弟趕快給我買了火車票，母親趕快在農民家燒飯，我說我不餓，不要燒飯了，可是我母親一定要燒飯，讓我吃飽飯才走。我匆匆忙忙吃了白飯，連菜也沒有，剛吃好，火車來了，我沿著鐵軌跑，跳上最後一節車廂，車上的人看到我這樣跑上車，曉得是怎麼一回事，馬上一羣人圍在我旁邊掩護。

這期間我們曾經計劃到新竹找游擊基地，準備東山再起。後來與台灣地下黨取得了聯繫，地下黨認為鬥爭不可能繼續下去，為了安全叫我們離開台灣。我跟謝雪紅一起想辦法，開始想在高雄坐走私船先到日本，那時主要是走私糖，日本缺糖，台灣又賣不出去，我們買了許多糖準備走，那條走私船聽說有女的，就不贊成。我們只好另想辦法。我找到左營海軍司令部我一位要好朋友，他在那當軍官，通過他的關係賄賂了巡邏艇兵。這些巡邏艇是專為緝私的，可是他們自己也走私，他們巡邏有一定的路線，就是從左營出來，到澎湖島，然後到廈門、福州，再轉回來，這些船經常載私人，只要給鈔票。大約四月十幾號我們隨艦離開左營，軍艦上很多是台灣人，除了最下層的水兵是福州人外，其他的下士、軍官都是台灣人，這些人過去在日據時代當日本海軍，國民黨來了還繼續工作，他們心裡有數，知道我們是什麼人，裝作不知道就是了。在艦上我

們謊稱去廈門訪親。

扮成逃難的印尼華僑

到了廈門，我裝成逃難的印尼華僑，住進廈門台灣同鄉會會館。管理員對我們耳語說：「你們是甚麼人，我猜得出，但不要怕。這裡有一個國民黨派來監視會館的特務，但你們儘可放心，連他自己也是恨國民黨的。」

幾天後我們來到了上海。從廈門到上海時，我們三個人一起，謝雪紅做我的母親，楊克煌做我的舅舅，船開前憲兵上來檢查，我們三人就在那演戲，謝雪紅罵我：「這個小子在上海復旦大學不好好唸書，我怕他出事，所以叫他回來，現在聽說上海學潮已經平息了，我帶他回去。」母親訓兒子要老實唸書，我只好說：「是！是！」

五月初到上海，找到了地下黨關係，那時聯絡人是李偉光醫生（日治時，二林蔗農事件領導人，現已去世），當時他是旅滬台灣同鄉會會長，自己開一家醫院，專門治療鴉片癮患者。我們就裝做病人住在他的醫院。剛到上海時，在同鄉會遇到一位丁姓同學，他與郭昭烈是一年級同學，我比他兩年級。我們在「台中商業專科學校」唸書時就一起參加過抗日活動，兩人很要好。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派一批台灣青年來大陸公費留學，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公費生，就讀暨南大學，正好暑假前要回台灣去，我趁走廊沒人時跟他說：「我參加二二八，現在脫險出來了。」要他帶個口信給我家人，說我已安全到達上海。爲了這件事情，他被國民黨害得好苦。

他結婚那天，請了一百桌席，國民黨就在那天抓他，四天四夜拷打，不讓他睡覺，同時特務又敲榨勒索，要他父親拿出幾百萬台幣，他父親一方面拿不出這麼多錢，又非常氣憤，就拒絕了，第二

天他家被燒光，這可以說明國民黨殘暴到什麼地步。

其實他很冤枉，只不過給我帶個口信，國民黨就給他戴帽子，說他是「暨南大學共產黨支部派來台灣與地下黨聯繫」。拷打下，腰也骨折，人也弄成精神病。關了幾年放出來，沒法在台灣待下去，後來考上日本東京大學，一方面讀博士課程，另一方面繼續療傷。現在他在日本，入了日本籍，吃了卅年的藥治精神分裂症，現在還有毛病，藥不能斷。他寫信很特別，明信片上寫得密密麻麻，藍的寫完，再用紅的，讀起來非常吃力。

改變計劃轉赴香港

我們照上海地下黨的安排，本來要去山東解放區的，可是到了吳淞港時，走私船（帆船）上的人忌諱女人，不讓謝雪紅上船。後來我們就改變計劃去香港了。六月四日到達香港。很巧，第二天蘇新（前台共黨員）也到了香港。剛到香港不久（大約是六月底），謝雪紅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此文先經莊希泉先生寄往新加坡發表於陳嘉庚先生主辦的「南僑日報」，然後轉載於香港「華商報」。此文內容大意是號召台灣同胞，繼續高舉二二八旗幟，爲推翻獨裁統治、實現民主自治而鬥爭。那時廖文毅也在香港。起初我們認爲廖也是反國民黨的，所以與他合作，創辦了「新台灣叢刊」，不久他公開主張「國際托管台灣」，而且有人（姓丁的台灣人）揭露他與某國情報機關有密切關係，從此我們就和他決裂。以後廖又搞了一個「台灣再解放同盟」，再以後就衆所周知，搞了個「台灣獨立國影子內閣」自封大總統了。

在香港期間，楊克煌以林木順筆名撰寫了「台灣二月革命」，蘇新寫了「憤怒的台灣」，我也寫了些文章。

籌備創建「台盟」

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我們開始籌備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我們認為二二八鬥爭就是台灣人民為擺脫國民黨獨裁統治，謀求民主自治的運動。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延安電台、同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也曾表示：中國共產黨支持台灣人民的民主自治運動。這就是取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由來。一九四八年中共發表「五一宣言」，台盟在香港「華商報」上發表聲明表示擁護。一九四九年謝雪紅等人為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陸續離開香港到了北京。我自己則早在這之前，即一九四八年八月離開香港前往石家莊。那有葉劍英（當時任中共軍委總參謀長）兼任校長的「華北軍事政治大學」，這大學有一個台灣隊，學員一百五十多名，都是台灣青年。我在那裡為供做教材，寫了「台灣史」。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七年三月。

二·二八事件親歷記

撰文／吳克泰

台灣「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北京、天津、上海及其他台灣胞聚居的祖國大陸各地都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我們在大陸的二·二八事件參加者，有機會出席紐約的紀念會，深感欣慰。「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反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一次大規模羣眾運動。它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席捲了全台灣，震撼了全中國，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封建法西斯統治，同時也遭到了國民黨的殘酷鎮壓，犧牲了幾萬人。我在此僅向犧牲的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

事件的社會背景

台灣人民在日帝統治下過了五十年痛苦的奴隸生活。為了擺脫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復歸祖國懷抱，當家作主人，我們的前輩同日帝整整鬥爭了五十年，犧牲了數十萬人的生命。正因為如此，當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國民黨去接收台灣時，台灣人民把國民黨當做台灣祖國的代表歡天喜地地歡迎它。台灣人民萬萬沒有想到，經過八年抗戰的國民黨政府竟是那樣的腐敗。它在政治上對台灣人民歧視壓迫，在經濟上強取豪奪。造成了生產停頓、物價飛漲、失業成羣、民不聊生的惡果。國民黨很快就喪失了台灣的民心。

國共內戰，大大加深了台灣人民的災難和痛苦。台灣的大米、糖、煤炭等物資大量地被調運出去，加速了台灣的經濟危機。到了

二·二八前夕，台灣的米價整整漲了 250 倍。號稱米倉的台灣竟然發生了人爲的米荒，搶米風潮起伏此起彼伏。這時，台灣的失業，半失業的人口已增加到一百萬。無米可炊而全家自殺的事件不斷發生。台灣人民義憤填膺，忍無可忍了。人人都預感到一場風暴的來臨已經不可避免。到了二月底，驚天動地的二·二八事件就爆發了。

事件的發端

二·二八事件，我是在台北參加的。這次事件規模很大，我只是參加其中的一些具體工作，知道得很不全面，只能談談個人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和看法。

衆所周知，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由一幫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對小烟販林江邁的暴行而點燃起來的。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在逃跑中又開槍打死了羣衆陳文溪。憤怒的羣衆蜂湧追捕凶手。凶手最後溜進了警察局。當時我是台大學生，又是中外日報記者。這天晚上大約九點鐘的時候，我在回報館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凶手的羣衆，就參加羣衆一起包圍了警察局，衝上警察局長陳松堅的辦公室，要求交出凶手，不許凶手溜掉。陳松堅此時在衆多的羣衆面前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威風，驚恐萬狀，支吾其詞。他最後說凶手已經移交給憲兵隊。於是，我和羣衆一起迅速包圍了新生報對面的憲兵隊，繼續要求交出凶手嚴辦。憲兵隊要羣衆派代表進去談判。我也被推爲代表進去交涉。但憲兵隊沒有一個負責人出來答覆，我們看到這樣消磨時間毫無用處，便退出來繼續包圍憲兵隊，不斷喊口號，要求交出凶手嚴辦。我在這裏遇上了中外日報同事周青，兩人決定合寫一篇報導，在截稿前趕發了出去。

發完稿子，我和周青及報社兩位同事一起回到憲兵隊的前面參

加羣衆的鬥爭。這天夜裏下著濛濛細雨，天氣相當冷。但羣衆心中的怒火始終未減，始終包圍著憲兵隊一起到天亮。我們中外日報的同仁也同羣衆一直堅持到天亮。

二月二十八日天剛剛朦朧發白，在細雨薄霧中我發現穿著黑色制服帶著長槍的警察大隊靜悄悄地從西面鐵路線上向羣衆反包圍過來。我告訴羣衆，情況危急，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散開。

公署屋頂上的鎗手

大約八點多鐘的時候，我正在朋友家休息，突然被一片吵雜聲所驚醒，走出大街一看，到處是憤怒的人羣，口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整個台北市沸騰起來了，形成了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市。醞釀已久的火山終於爆發了。這完全是被國民黨的惡政激發起來的。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在這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動員這麼多的羣衆。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和少數野心份子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爲了鎮壓製造藉口。

羣衆首先把憤怒集中到肇事的專賣機構，砸爛了專賣局所屬台北專賣（批發）公司。到新公園開羣衆大會，然後向長官公署請願。羣衆的隊伍尚未靠近長官公署，公署衛兵就從屋頂向手無寸鐵的人羣用機關槍掃射。當場就有幾個人被打死，許多人被打傷。這是對羣衆的憤怒火上加油。國民黨在台灣的最高行政機構長官公署的這一嚴重挑釁把事態進一步擴大了。被激怒的羣衆分成了幾路，一路湧向專賣局，一路又折回了新公園，衝進了廣播電台，向全台灣廣播了事件的真相，號召全省民衆起來同腐敗透頂的國民黨政府作鬥爭。各地人民聽到廣播後紛紛起來響應。

當天下午，國民黨宣佈戒嚴。我和許多羣衆一樣都不知道已經戒嚴了。繼續攻擊了市中心的新台公司。

一天剛黑下來，國民黨就利用戒嚴令在市內到處射殺過路行人。我路過新台公司前面就遇到一批便衣警察在瘋狂射殺羣衆的場面。我急忙躲進一家小醫院才得倖免。第二天下午，一隊憲兵乘幾輛卡車向向聚集在鐵路局前面的羣衆猛烈掃射，當場打死了數十人。當時我在延平北路看到死難烈士的遺體被裝在卡車上運走，慘不忍睹。

兩條戰線

三月一日起，台北的二·二八鬥爭在兩條戰線上進行。

一條戰線是以地方士紳如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參政員、省市參議員爲主，部份羣衆團體代表參加的「處理委員會」。其中許多人存在幻想、蒙受欺騙、有的妥協、有的投降，軍統、中統特務也混在裏面。他們整天在中山堂開會，會場很亂，顯然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只有王添灯等少數人代表民意，利用這個公開的論壇，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爭取作出有利於人民的決議。

另一條戰線是準備武裝鬥爭的羣衆。他們看到「處理委員會」的妥協性和複雜性，看到國民黨一再的挑釁和屠殺，認爲非用武裝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候，中共地下黨台北市委站在羣衆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我參加了其中的一部份工作。白天聯絡，組織羣衆，晚上收聽各地廣播，編印『廣播快報』報導各地人民鬥爭的消息。我從廣播中聽到台中、嘉義、高雄武裝鬥爭組織得比較好。其中嘉義最有組織，連家庭婦女、女學生都組織起來救護傷員、送水送飯等工作。嘉義的戰鬥也打得最激烈。後來，我在山裏的游擊據點裏，聽嘉義的起義參加者說這是嘉義朴子人，中共台灣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張志忠指揮的。這位台灣人民的優秀份子從日本人的監獄一出來就偷渡到大陸參加華南游擊戰爭，抗日戰爭爆發

後隨陳毅將軍到了蘇北，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八年的浴血奮戰。最後升到新四軍的團長（等於師長）。台灣光復第二年才回到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在嘉義一帶，就地參加了武裝起義，指揮了嘉義、台中等地的武裝鬥爭，多次遇到危險。這位台灣人民的英雄後來不幸被捕，在國民黨的屠刀下壯烈犧牲了。我曾經同張志忠朝夕相處，他的高大形象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武裝鎮壓

台北的武裝蜂起在三月五日午夜發動前被國民黨所發覺，工人、農民、學生的隊伍又極度缺乏武器彈藥，同烏來山地同胞的聯繫也出了問題，因此武裝鬥爭沒有成功。爲了發動第二次進攻，我們又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一直到國民黨軍開始大屠殺的第二天即三月九日早上，我們還召集學生代表開會，準備鬥爭到底，終因大批國民黨援軍開到，全台北實施戒嚴，一片白色恐怖，無法行動而告結束。

鬥爭的尾聲

在白色恐怖中，我在朋友家躲了四、五天，情勢稍微平靜下來，才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到處是蓋著席子的死難同胞的屍體，在其他地方，凡是「國軍」所到之處，都進行了大屠殺和大逮捕。特別是基隆和高雄兩地大屠殺的殘忍，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白色恐怖中，一大批參加二·二八起義的精英人才壯烈犧牲了，倖存下來的並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他們在二·二八事件中看到中共地下黨員的獻身和犧牲，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因此在白色

恐怖中，紛紛有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有一部份地下黨員轉入山區堅持游擊戰爭。可惜，他們在 1950 年前後的大屠殺和大逮捕中，有的光榮犧牲、有的被捕，在火燒島等地關了許多年。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被破壞後，在得不到外援的極其艱難條件下，仍堅持了五年之久。另外，在二·二八當中暴露的近百名起義參加者到了大陸。其中有不少是各地起義的重要領導人，包括謝雪紅、林良才、蘇新、潘欽信、蕭來福、王萬得、楊克煌、李喬松、王天強、李顧楷等人。在大陸上的二·二八起義參加者，大都參加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繼承二·二八蜂起的精神，為台灣的民主、自治、實現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而繼續奮鬥。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的暴政逼出來的，完全是官逼民反。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又連續用機槍掃射等手段屠殺羣衆迫使羣衆奪取武器進行武裝自救。另一方面，它又敷衍地方士紳及軍統、中統特務組成的處理委員會，表面上答應所有的要求，施展緩兵之計，暗地裏却向蔣介石乞求援兵，等到援兵一到就把台灣合理的要求全部推翻，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和大逮捕，在台灣人民的心靈上造成了極大的創傷。這應該由國民黨全部負責。但直到現在，國民黨仍在歪曲事實，誣蔑二·二八蜂起為「叛亂」。我深感我們有責任把被國民黨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恢復二·二八的光榮面貌。

人民要求民主自由

事過四十年後的今天，讓我們這冷靜一下分析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所追求的目標是什麼。我認為可以歸納為：反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和歧視台灣人民的政策，要求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和人民生活，而其核心是要求民主和自治，不論從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條來看，或從各縣市提出的口號和要求來看。

其基本要求都是一致的，這和一九四五年的國共雙十協定及一九四六年初國共兩黨及各民主黨派共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是相符的。雖然國民黨進行了新聞封鎖。據我所知，台灣的報刊曾幾次詳細介紹了雙十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中的和平建國綱領規定。實行政治民主化；確保人民基本自由權利；保障用人不分派別，以能力、資歷為標準；嚴懲貪污；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上而下之普選；各地得採取因地制宜之措施……等等。台灣人民對民主、自治的要求，與此吻合，後來國民黨利用特務強迫處理委員會追加的十條，是為了混淆視聽、故意栽贓，為鎮壓製造藉口，與台灣人民的合理要求無關。這一點必須講明。

二·二八起義得到大陸各界的聲援，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站在一條陣線上。台灣人民舉行二·二八蜂起，要求民主自治也得到中共中央的全盤肯定和全力支持。中共中央在三月八日通過延安電台指出，「台灣人民的武裝自救，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事變的本質

誠然，二·二八事件剛開始時，台北和其他一些地方發生了打外省人的事件。羣衆在憤怒之餘懲罰了貪官污吏，也誤打了一般的外省人。這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很快由台灣人民自己糾正了。實際上，外省籍的教員、知識份子、學生、商人、中下階級公務員許多人都受到了保護。不少外省同胞同情甚至冒著危險參加了二·二八鬥爭。正如各位所知道的，有一批外省籍人士，特別是新聞界、文化界的公正人士在白色恐怖被捕或被殺害。相反地，台灣人中也有極少數敗類對二·二八起義進行了各種破壞行動，幫助國民黨鎮壓

人民，並參與了大屠殺。根據我知道的大量事實，分析到問題的實質，二·二八所反應的並不是省籍矛盾，而是不分省內外的中國廣大人民同國民黨封建法西斯之間的階級矛盾。

本文發表於「二·二八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紐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二八事件和台北學生

——訪葉紀東先生

撰文／葉芸芸

前言

葉紀東先生是台灣高雄人。二·二八事件當中，曾參與組織領導台北學生隊伍，一九四九年出走大陸，長期定居北京，在廣播電台工作。現已退休，兼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顧問。

筆者曾分別於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美國華府，以及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兩度訪問了葉先生。本文是根據兩次談話中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部份整理而成。

問：葉先生您是台灣什麼地方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您在那家大學唸書？

答：我是高雄人，當時在台北延平學院唸書。

問：聽說延平學院是戰後民間創辦的大學，到底是那些人辦的？什麼時候成立的？

答：我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份聽說有這麼一所夜間大學的。成立的時間可能是春天吧！正式開學是九月。是由一些有識之士創辦的，主要有朱昭陽、朱昭華兩兄弟，以及劉明先生等人。朱昭華先生學世界語，很有點社會主義思想，教授也都比較開明進步。學生則經濟條件較差，白天多半要工作，來補貼自己的生活 and 學費。學校也提供很多工作機會給學生，校內的雜務像抄寫講義，油印等各種工作都由學生來做。我記得還舉行過義賣募款。可以說是為一些

經濟上比較困難，而想繼續升學的青年而設的夜間大學。

問：這所大學有沒有共產黨的學生組織？您是不是成員？

答：以前我在高雄，日本投降前夕就參加過抗日的活動。日本投降後，我立即參加歡迎國軍接收，以及肅清日本帝國主義教育影響的活動。進了延平學院以後，我就在學生中組織讀書會。地下黨的領導人很照顧我，開始我並不自覺，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後來才漸漸領悟到是怎麼一種關係，我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份自己要求入黨的，兩週之後，二·二八事件就爆發了。

問：您為什麼想要參加共產黨？那時候像您這樣想法的學生多嗎？

答：在我們那個時代，青年人普遍的有一種使命感，我想這也是很正常的，一個變動的時代。過去受日本人壓迫，好不容易盼來的祖國，卻是那麼腐敗的國民黨，大家都很困惑很苦悶，都在尋找出路。當時學生聽說大陸有共產黨，都很關心，都希望知道是怎麼回事。

問：那時候認識謝雪紅嗎？

答：認識的。凡是坐過日本監牢的政治犯，我們都很尊敬，認為他們是為台灣人的利益奮鬥而受迫害的，是有民族意識，政治上也有見解的人。我第一次見到謝雪紅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在台北唸書的時候，我只有十九歲，當時的心情很興奮，覺得很光榮。她介紹了好幾位年輕朋友給我，都是很熱情很有理想的。

問：二·二八事件中，台北的學生是怎麼組織起來的？

答：事情發生後，學生紛紛集會、遊行都自動的組織起來。我們就在學生自己發動起來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各學校的積極份子連繫在一起，成為一股較大的力量。事實上，台北學生經過澀谷事件和沈崇事件兩次示威遊行，尤其是四七年一月初的沈崇事件，有萬人的抗議遊行，基本上，各校間積極的進步學生均已有了連繫，像法

商學院的陳炳基，是澀谷事件就出來領導的，師範學院有位同學叫陳金木（原名叫陳水木）。後來在一九五〇年就犧牲了。另外師大學生會的主席，姓鄭的，名字一時想不起來了，台大也有幾位很活躍的同學。我們個人就是學生隊伍的骨幹，負責組織工作，後來台大醫學院的郭琇琮也參加了，他就是我們學生隊伍的總指揮。那時他已畢業，在擔任助教。我記得法商學院是第一大隊，第二大隊是師範學院，第三大隊是台灣大學，另外還有一個工人隊伍，領導人姓劉，目前也在美國。

問：事件當中，學生們有沒有比較具體的主張或訴求？對「外省人」的態度如何？

答：學生都很單純，滿腔熱血，多半是看不慣「祖國」接收官吏的行徑與他們對台灣人的歧視，要爭取民主平等。當時，確實有「打阿山」的口號，也真的發生大陸人挨打的事，但絕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贊成這麼做，我們對大陸籍的同學，老師都加以保護。不僅如此，也有大陸籍的同學，為正義感驅使，而奮不顧身地參加我們抗議示威的隊伍。

問：你們的學生組織隊伍，在二·二八事件當中，有沒有武裝？

答：台北沒有台中那麼順利啊！台北是國民黨統治中心，軍隊戒備森嚴。台中就比較鬆懈，因此羣衆很快就可以佔領警察局，把縣長都看管起來了。所以啊！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曾商量……武裝隊伍的問題，聽說謝雪紅那邊有一批武器，就派了林棵才（也是省工委之一）到台中去聯絡，希望台中能支援台北學生青年隊伍的武裝，結果遭到謝雪紅的拒絕。我還記得林棵才回到台北，向大家報告此事，非常憤慨，在那麼緊急的時候，她竟然做不顧全局的考慮。

問：當時謝雪紅與地下黨到底是怎麼一種關係？她有黨員的身

份嗎？

答：二·二八期間，謝雪紅並不是正式的共產黨員，國民黨說二·二八事件是什麼「奸黨叛亂」，好像全都是像謝雪紅這種共產黨員在領導煽動，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謝雪紅領導的只是台中地區一部份武裝力量，台中市民自己起來組織，也還有其他的組織隊伍。不過，謝雪紅戰後沒有入黨，據說是因為她一來就要求參加省工委的領導，蔡前（蔡孝乾）則要求她先辦好入黨手續，要交代清楚舊台共時代歷史，包括被日人逮捕監禁期間的情況，然後才能參加黨的工作，謝雪紅都拒絕了，所以沒有正式入黨。

問：二·二八事件後，延平學院就被迫封閉了？

答：是的，延平學院的壽命很短，就只有那麼半年。因為事件中，延平學院的學生幾乎都參加了學生隊伍，很活躍，國民黨認為學生所起的作用太壞。二·二八的局勢變化很快，三月十日前後，國民黨援軍到了以後，羣衆、學生的組織都散了，軍隊開過來當街殺人，一片腥風血雨，我也不得不離開台北，回高雄去隱避了一段時候。

問：傳說謝雪紅等人後來坐國民黨海軍艦艇逃出台灣？

答：是真的。她和克煌、周明、林棵才，事後都到高雄來躲避逮捕，我曾幫忙安頓他們。當時很危急，到處在抓他們，省工委要我安排他們離開，後來是一位在海軍的朋友（註1）幫忙，用錢買通，搭海軍艦艇出海，由左營走的，當時，海軍很腐敗，也走私或運載平民圖利。他們很順利經廈門到上海，蔡前為他們寫了給李偉光先生（註2）的介紹信，還是臨上船前我交給他們的，後來，他們轉到香港，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行「新台灣」，也曾送回台灣散發。

問：你自己是什麼時候離開台灣的？

答：事件後我回高雄，換過幾個工作，在一家私人公司幹過幾

個月的小職員。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台北有一位朋友被捕，特務在他家裡搜到一封我的信，就根據這封信追蹤到高雄。我是四九年四月六日從基隆搭船離開的，臨走前夕我還參加了台北學生的開會，第二天就爆發了四六事件。四月底到了北京，謝雪紅他們已經由香港轉來北京，這是一生最幸福、最痛快的一次重聚，在台灣共患難的戰友們，脫險來到解放的北京重逢，大家都忘了在台灣時的恩恩怨怨，沉浸在慶祝勝利的氣氛中。

問：事件後在香港的那段時間，楊克煌和蘇新合寫了「台灣二月革命」，以林木順的名字出版，蘇新又自己寫了「憤怒的台灣」，並請以這兩本書比較你所了解的，所經歷的二·二八事件。

答：大致上是忠于事實的。楊克煌另外還寫了一本「台灣人民解放運動史」（註3），不過，只要寫到二·二八事件，他就要吹捧謝雪紅，有些地方就比較誇張，與事實難免會有些出入之處。「二月革命」也一樣，台中地區和謝雪紅的部份，也是楊克煌執筆的。而蘇新自己寫的「憤怒的台灣」，二·二八那段，關於謝雪紅的部份，也是過頭了一點，我想，這是因為當時他們逃離台灣到香港，一起在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是當時氣氛之下的產物，不過，也還不致於像楊克煌那樣吹捧得露骨。人都有局限性，所以，現在回頭看歷史材料，一定要有批判的史觀才行。

【註解】

註1：蔡懋棠，鹿港人，左營海軍基地「技術員兵大隊」中尉。葉紀東先生因不知蔡氏日後遭遇，要求我隱去此段細節。唯根據鍾逸人先生回憶錄，蔡氏確因安排謝紅出走而繫獄十三年，蔡先生已因病去世。

註2：李偉光先生係農民運動領導人，後到上海行醫，任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並為上海台灣地下黨之連絡人。

註3：湖南人民出版社。

三位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回憶

——訪吳克泰·蔡子民·周青

撰文／葉芸芸

九八五年夏，我在大陸旅行期間，曾見到多位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同鄉前輩，其中有現居北京的吳克泰、蔡子民和周青三位是當時台北市的新聞記者和編輯。八月二十日下午，在北京飯店，應我的要求，三位前輩做了一次針對二·二八事件的回顧談話，本文係根據談話錄音整理而成，文後的註為筆者所加。

歷史迴聲中的生涯

葉：首先請您們介紹一下個人的經歷。

蔡子民：我的本名是蔡慶榮，彰化二林人，一九二〇年生。在台中一中唸到初三，正逢皇民化運動，我受不了乃跑到日本留學，這似乎很矛盾，逃避日本人的壓迫，卻又跑到日本去。但當時的台灣人並沒有其他出路，而且比較上，台灣人在日本本土還是比在台灣自由一點的。一九三九年，我進早稻田大學，是政治經濟系畢業的。日本投降後不久，有個華僑商人出資辦報，由我任總編輯，叫「中華日報」，但時間不長，主旨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為日本的台灣老鄉和華僑爭取權地位。光復第二年，我才回到台灣，透過謝南光的介紹，很快就接觸到蔣時欽、王白淵，王添灯、潘欽信、蕭友山等朋友，和他們一起活動、辦「自由報」。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待不下去，跑到上海任旅滬台灣同鄉會總幹事，做台灣同鄉難

民遣送和救濟的工作，那時候蘇新由上海逃到香港，其妻女經我安排與難民一起搭船由上海返台的。

思想上，我受二林前輩謝南光和李偉光影響很大。李偉光與家父（蔡淵騰）是結拜兄弟，二林蔗農事件兩人一起被關，二·二八後我到上海，也是因為有他可以投靠。也就是在上海時，我找到黨的關係。一九四八年夏，曾參加台灣同學返鄉團，回台一個月。

解放以後，轉任對台廣播工作，與宋非我（註1）一起工作了兩年。記得是五三、五四年吧！他寫了很多相聲、廣播稿，後來他轉到泉州對台廣播，文革當中吃過很多苦頭，後來到香港去了。宋是很值得懷念的一位文化界人物，光復初期，他在台北演出話劇「壁」，曾轟動一時。

一九六〇年調到「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後來再調到「文化部」，負責對亞洲——日本、朝鮮、越南之文化交流工作。一九八一年調到駐日使館，最近才回來，仍然在文化部工作。一九七五年當選全國人大台灣代表。

吳克泰：我的本名是詹世平，當記者時的筆名是詹致遠。宜蘭鄉下的人，一九二五年出生。中學時到台北唸台北高等學校文科，從日本老師對台灣學生的侮辱中，慢慢地覺悟到做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有的日本老師常罵我們「支那人，滾回支那去！」。我在中學時就決心要回大陸來的，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有機會。

在台灣很閉塞，只知道祖國有個國民黨，在大陸後方流浪了一段時候，一心一意要找蔣介石的國民黨，卻沒找到。後來到上海，不久日本投降了，自己盼望的國民黨也來了，卻沒有想到國民黨那麼糟糕，那時候真是苦悶。後來，我參加一個日本人辦的「改造日報」，看到一些進步的書籍、報刊、電訊。慢慢地才理解，中國除了國民黨外，還有一股強大的民主勢力，從斯諾的書，才知道共產黨、新四軍、八路軍等等歷史。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回台灣。一方面在台大復學，當時台大有一特別班，彭明敏、郭婉容都是這個班的，另一方面我在新聞界工作，先在「民報」一個月，在「人民導報」一直到四六年底，才轉到「中外日報」，「自由報」是從籌備時就參加了。二·二八以後，在台灣到處走，山上、海邊、碼頭都走遍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到北京，以台灣青年代表的身份參加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就在國際電台，做對日廣播的工作三十年。一九八五年才轉到信託投資公司的現職。

周青：我的本名是周傳枝，筆名周描。台北市東門外人，一九二二年生。一九三四年從朱庄崙公學校畢業後，先在日華紡織株式會社當工人，後來也當過店員、牙醫見習生和泥水匠。當紡織工人時，認識了一批「台灣民眾黨」時代「工友總聯盟」的進步工人，帶頭的是黃江連。我因為喜歡文學看了不少書，其中也有馬克思主義的書，受了啓蒙，就在工廠組織了「曙聲新劇研究俱樂部」，團結了一批工人，發動過一次失敗的罷工。一九三六年「曙聲」和萬華的「新劇研究會」合併成「台灣新劇研究會」，請張維賢和他的學生宋非我指導，演出過鄭正秋的「何必情死」和北川壽夫的「怪貨物船」。七七事變後，劇社受日本特高的注意而解散，原萬華「新劇研究會」的人到南部參加職業劇團。我因參加老台共外圍的一些活動，認識了朱點人、鄭德來、王中賢、周實等人，後來到高雄當泥水匠，朱點人介紹我認識了寫小說的林月風，從而有機會閱讀大批三十年代文學作品。

日本投降後，我和朱點人、林子溪三人成立「文學同志社」，九月份就出版「文學小刊」，其中有朱點人的「玷」和我的「葫蘆屯」兩篇中文小說。我們自己在「山水亭」門邊擺攤子，第一個來買的人就是王白淵。當時大家熱情很高，以為日本人走了，要好好發展台灣文學。

一九四六年，我在高雄文化書局遇到「人民導報」總主筆陳文彬，從而進入新聞界，擔任「人民導報」高雄特派員。後來因報導搶米事件，和引起王添灯筆禍事件的大港區灣仔內農民抗租事件，而受到地主和警察局長的威脅，被迫離開高雄。回台北以後，先在林子畏的大明晚報當記者，後來許乃昌找我轉到「民報」，四七年一月再到「中外日報」，同時在四六年十一月也參加「自由報」，王添灯每月還補貼生活費，生活比較過得去，那時經常和蔣時欽喝啤酒。

二·二八事件後（四月十三日），我和吳克泰坐「台南輪」離開台灣，輪上曾遇見在台灣文化圈子很活躍的黃榮燦，他胸前戴著警備總部的徽章。四月十五日到上海，投靠「旅滬台灣同鄉會」，解放前一直都在同鄉會當幹事。

解放後，我到華東局工作，一九五四年被調任華東局建築工程公司任秘書、宣教科長。六〇年到河北政策研究室工作，後來到河北作家協會，八四年才到北京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民主言論的工作

葉：請談談戰後初期的文化界，尤其是你們曾參與工作的「自由報」和「中外日報」。

吳：「自由報」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份開始籌備的，蘇新、王白淵、徐淵琛、蔣時欽、孫萬枝、周慶安、詹世平、蕭來福、潘欽信等人，就編輯方針、經費發行諸事多次開會討論，多半在王白淵和蘇新家中。籌備開始不久，老蔡回來也參加了。後來決定以「自由報」為名，經費由王添灯負擔，老蔡掛名總編，實際上是蕭來福。九月份出刊以後，很受到青年學生歡迎。但國民黨很不滿意，幾次申請登記，名字更換了好幾個——「自由報」、「台北自由報」、

「青年自由報」都不正式批准。

蔡：我還在日本時，已經聽說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的不滿，回到台北，王白淵、蘇新等正在醞釀一份同仁報，做為批評時政論壇，以容納當時已有幾份報刊不方便刊登的言論。

就內容主題而言，「自由報」一方面做為人民的喉舌，反應人民的痛苦與要求，另一方面報導大陸政局發展，並提出高度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張。蔣時欽離開「民報」以後，在「自由報」專門寫有關自治問題文章。「自由報」曾全文刊出「雙十協定」，並選刊孫中山、蔣介石有關地方自治的語錄，針對蔣管區高度地方自治，做了充分發揮。起初，民間對地方自治的要求並不明確，不過，到了二·二八事件前，報刊上自治問題的討論就愈來愈熱烈了。

同仁中地下黨員有吳克泰、徐淵琛、孫萬枝、潘欽信、蕭友山（來福），沒有組織關係，但有聯繫，潘是王添灯秘書，寫不少政論文章。經費除了王添灯負擔大部份外，因他是茶業公會理事長，拉了不少茶業界的廣告。基本上，「自由報」是同仁報的性質，編輯、記者支領車馬費，業務及對外聯絡由蕭友山負責。

葉：「中外日報」是何時創刊的？組成的背景？

吳：「中外日報」是一九四七年一月試辦了一個月，二月一日正式發刊。首先是省參議員林宗賢（板橋林本源家族）和台灣紙業公司經理鄭文蔚合資，後來王添灯也入股，並介紹徐淵琛、陳本江、周青和我幾個工作人員進去。「自由報」的朋友幫忙寫很多稿，但是，鄭文蔚很害怕，不肯登，報社常常吵架，言論也搖搖擺擺的，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事件發生後，報社裡大部份外省人都跑了，沒人管，我們就把蘇新請來當總編輯，蘇新自王添灯筆禍事件後，離開「人民導報」到文化協進會，和王白淵一起編「台灣文化」。

周：二·二八期間情勢很混亂，查禁又嚴，加上紙張缺乏，基

本上，大部份報刊全停了，「中外日報」堅持每日出刊。而第一篇關於事件的報導，就是老吳和我兩人徹夜在現場採訪寫成的，從傍晚在「天馬茶館」前，林江邁被毆打，到晚上羣衆包圍公賣局、警察局我們都在現場。報導寫好，鄭文蔚極力反對刊登，後來經排字、印刷工人以罷工要脅，堅持，才讓這篇報導見報。二·二八事件中，又以「中外日報」為中心，成立新的「記者公會」，把進步的報人記者組織起來，由地下黨領導。

葉：王添灯是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尤其在「台北市處理委員會」的表現，你們是不是他的幕僚？

蔡：事件中，朋友們分頭都參加了鬥爭，「自由報」也停了，剩下我們幾個人集中在「中外日報」，堅持每日出刊，同時也幫忙王添灯，準備每天在中山堂「處委會」的發言提案。

三月五日，王添灯回來說要擬一個具體的處理大綱，蘇新、潘欽信、我和另一位年輕的同事，一共五個人就留下來討論，而後由潘欽信起草，在六日寫成，這就是三月七日王添灯在「處委會」上提出的「卅二條處理大綱」。

周：當天，我們都守在會場上的，起初王添灯提出卅二條處理方案是很受歡迎的，但會場上毫無秩序，軍統，CC特務都混雜其中，到了下午，才在吵鬧喧嘩中，通過增加成四十二條的處理大綱。後面增加的十條，其中，有的是軍統、CC特務有意提出，使之成為陳儀進行鎮壓的藉口。比如「本省人的戰犯與漢奸無條件即即釋放」及「各地方法院院長及檢察官全部由本省人充任」這兩條。在會場上提案起哄的。有幾個特別要提出來，白成枝和呂伯雄是CC派的，白氏以前參加過「文化協會」，「忠義服務隊」的許德輝則是軍統的。會後，處委會代表去見陳儀，一批新聞記者跟去，我也是其中之一。陳儀的態度和先前完全不同，拍桌子大罵「處委會」的代表，說提這四十二條是搞叛亂。

蔡：那是傍晚的時候，我還記得當時的情景，我要陪王添灯去，他不肯讓我去，並且把口袋裡的東西掏出來交給我。那天晚上，他又到電台去做最後一次廣播。第二天傳說蔣介石的軍隊到了，大家勸他走，他不肯，他說要留下來，向國民黨表示台灣人是有骨氣的。

「處委會」

葉：你們對「處理委員會」的評價如何？

周：國民黨對「處委會」自有他的目的與重心，主要是要緩和和人民之間矛盾的尖銳化，並且拖延時間，為下一步進行鎮壓做準備。而一般羣衆，尤其是青年學生，對「處委會」帶有很大幻想，期待通過「處委會」達到改革的要求。黨派政客特務則利用「處委會」對羣衆力量進行分化，軍統、CC則是和政學系進行爭權的鬥爭。王添灯是進步力量的發言人，他的周圍都是進步人士，當時情勢發展成兩條戰線，一條是「處委會」，另一方面是做武裝起義的準備的。總而言之，「處委會」的組成非常複雜，有政府官方、人民團體、國民黨內派系、還有投機政客，是個各種力量較勁的場所。

美國準備供應武器！

葉：請再多介紹王添灯的事蹟。

蔡：重要的事蹟，蘇新所寫的文章（註2）都提到了。蘇新文中提到 GEORGE KERR 之事，我有一點補充的，美國方面是一直都想插手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當中，美國新聞處的人員很密切觀察事件發展，並也有活動。KERR 曾向人說，台灣人若需要武

器，美國可以提供，隨時只要說一聲，馬尼拉那邊馬上運過來。至於王添灯這個人，我自回台灣到二·二八這段時間都跟隨他，對他有相當的了解，覺得他對名利比較淡泊，也沒有什麼政治野心。事件當中，曾有人開玩笑，說起義成功以後他可以當省長，王添灯當場很嚴肅說「不行，我沒有行政能力與經驗，只能搞搞羣衆運動。」

吳：日據時代王添灯，參加過「文化協會」和「地方自治聯盟」。戰後初期，對國民黨可能並不很清楚，曾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後來，受徐淵琛的影響很多。當時他是省參議員，擔任「人民導報」發行人的期間，因報導高雄農民抗租事件而吃上官司，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周控告誹謗，兩次開庭，王的表現極有骨氣，法院擠滿了人，大多是大專學生和工會的人，「民報」的報導最詳盡，是周青寫的。王的辯護律師林瑞端後來也在二·二八事中被殺害了。

葉：是不是可以說共產黨利用了王添灯呢？

蔡：說他相信共產黨可能較為恰當，周圍的幾個朋友——徐淵琛、蕭友山、潘欽信——很受他信任，有事總要徵求這些人的意見，而這些人顯然與地下黨是有聯繫的。

周：我相信他本人也感覺到身邊有共產黨人，只將他評價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左派是不夠的。

葉：「台灣民衆協會」和「政治建設協會」這兩個組織到底有何關係？

周：「政治建設協會」的前身就是一九四五年十月成立的「台灣民衆協會」，是由日據時代「台灣民衆黨」以及「文化協會」的部份領導成員組成的，主要有王添灯、王萬得、楊元登、黃朝森、蔣渭川、張邦傑等人。該組織後來遭到取締，解散後再重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基本上受蔣渭川的控制。

蔣渭川這個人

葉：你們怎麼評價蔣渭川？特別是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爲？

吳：過去我和蔣渭水的兒子蔣時欽很熟，知道一些家族的事。蔣渭川是蔣渭水的親弟弟，日據時代參加過「文化協會」，在蔣渭水開的書店當伙計，蔣渭水去世後，他霸佔了書店，並將其兄的長子蔣松輝一家趕出去。二次大戰末期，在皇民奉公會極爲活躍，戰後則以蔣渭水繼承人姿態出現。一九四六年夏天，和白成枝、呂伯雄、李友三等人組成「政治建設協會」。秋天參加林獻堂組織的「台灣光復致敬團」到大陸訪問，返回台灣後就大罵起共產黨，當時台灣很少有人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的？聽說是致敬團在上海時，他和國民黨的CC搭上了線。這樣的推測，從他在事件中的表現得到印證，第一次廣播中，他就一再呼籲民衆冷靜，不要鬥爭。最後一次廣播，王添灯號召民衆堅持鬥爭到底，蔣渭川則說什麼雖然大家盡了力，但最壞的情況已經來了。三月八日蔣軍開進台北市，蔣渭川的女兒在家中被殺，他本人逃走，躲到國民黨省主委李翼中的家裡。

葉：如果他是國民黨的人，軍隊怎麼會到他家裡去殺人？

吳：當時一片混亂，軍隊怎麼搞得清楚呢？而且，可能還有派系的問題。

周：蔣渭川一向表現不好，二·二八當中，蔣時欽和一批進步學生組織「台灣青年自治聯盟」，他就混在其中搞分化，和CC的作法完全一樣的。在「台灣民衆協會」時期曾和他很接近的王萬得，也曾說蔣渭川是CC。

地下黨力量還小

葉：「台灣青年自治聯盟」在事件中做了些什麼事？

蔡：這是大專青年學生組織起來的一股力量，當時準備要武裝的，但因時間太倉促，計劃粗糙，沒有能發揮作用。

葉：事件中，台北地區有民間武裝力量嗎？

吳：武裝力量是中部地區組織的比較有規模，而且中部地區國民黨的防守兵力空虛，沒有辦法鎮壓。台北不同，國民黨的首腦地區，要塞多、軍事力量強。當時是首先把分散的羣衆組織起來，有青年學生隊伍，還有烏來的高山族青年聯繫好要下山來參加武裝起義的，但是，只有很少的武器。

周：曾經準備要奪取新店溪附近的武器庫，地圖都有了。還有空軍地勤部隊的台灣兵（其中有原義勇隊員）也準備起義，出動裝甲車隊和兩架飛機，可惜事洩，在行動前半天被解除了武裝。

葉：台北的武裝力量是地下黨領導的嗎？

吳：也不完全是，只能說是地下黨有一定的影響力。

周：二·二八起義的失敗，是客觀情勢。主要是國民黨的軍力強，民衆組織力量懸殊，其次是領導層的認識，對羣衆力量估計太低了。但是，當時民衆的氣氛是傾向洩憤，公賣局、銀行的錢被羣衆圍著放火燒掉，有的大陸籍進步人士在旁邊說，這種錢應該拿來做組織羣衆的經費，可是，當時沒有人拿的，拿的人一定挨打，因爲當時羣衆的情緒是不容許的，我們台灣人就是這麼清白，這麼天真。

蔡：與巴黎公社有經驗相似之處。不過，最主要的還是台灣人民沒有心理準備，誰也想不到光復才一年多就會爆發這種事？台灣的地下黨是四六年才建立的，到了年底的時候，各地工會才漸漸組織起來，四七年一月份，搶米事件發生，各方面的羣衆組織才萌

芽，學生則是沈崇事件後才組織起來，總之，在二·二八事件當中，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的組織尚未建立起來，力量還很小。

外省人受到本省人保護

葉：事件中，省籍衝突毆打大陸人的情況嚴重嗎？

吳：只有第一天有毆打外省人的情況，當時民衆氣憤，情緒激動。第二天以後，就很少再聽到打人的事，外省人大多受到保護。

周：據我了解，台北市毆打外省人的，主要還是一批地痞流氓。

蔡：事件當中，很多外省人都受到本地人的保護，像基隆的大陸籍老師、商人、學生一律受保護。淡水的淡江中學，首先是本地學生保護大陸籍的老師，後來國民黨軍隊來時是反過來老師保護學生。

周：大明報的記者編輯也是受本省同事的保護，然而，事件後發行人艾璐生被槍斃，主編馬銳籌也被逮捕。

葉：謝娥在事件中的作爲與遭遇，頗引人議論，你們的看法如何？

蔡：謝娥是個民族主義者，日據時代曾被日本人捉去關過，光復才出獄的。她是外科醫生，光復初期很活躍，當過「婦女會會長」和國大代表，她可能和當時一般人一樣，民族感情濃重，信仰三民主義，對國民黨沒有什麼了解。事件當中，極有可能是不明真相，被國民黨利用，到電台廣播，想要安撫民衆。然而，當時民憤冲天，她說謊當然就引起衆怒，才會招致羣衆燒毀她的醫院房子，基本上，她也算是國民黨的受害者吧！

葉：事件後，你們都跑到上海，是因為有組織關係？

周：旅滬台灣同鄉會（會長李偉光）是地下黨的秘密聯絡站，

這後來因蔡前（即蔡孝乾）叛變，國民黨也都知道了。我和吳克泰先到，後來蔡慶榮、蘇新、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陸續也都來了。蘇新、謝雪紅不久又轉到香港去，在那邊成立「台盟」，辦「新台灣」叢書。我們則在同鄉會辦一份手抄油印刊物叫「前進」，由蔡子民主編了四期。一直到上海解放前，我都在旅滬台灣同鄉會任幹事，蔡子民是總幹事。

台灣學生運動

葉：共產黨在大陸搞學生運動很厲害，在台灣建立地下黨之後，學生運動的發展如何？

吳：戰後不久，「台灣學生聯盟」就組織起來，主要的人物是士林人郭琇琮，他是原台北高等學校醫學部的學生。抗戰中曾到廈門，學會了普通話，回士林組織「協志社」，史明、潘淵靜、何冰等都參加了，表面上不帶有政治色彩，舉辦一些醫學、文化、攝影、鄉土的展覽會。二次大戰中曾被逮捕，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才出獄到台大醫學院工作。一九四六年三月，曾在台大醫院發動義診。二·二八事件中郭氏是學生領導人之一，事件後與愛人一起入黨，是地下黨台北市委。蔡前被捕後，郭在一九四九年底也被捕，次年台北火車站前被槍決。

二·二八之前有過幾次學生爲主的事件，第一次是基隆中學學生紀念五四，上街遊行，受警察特務的毆打逮捕，當地的省參議員顏欽賢透過陳逸松找我，我當時還在台大唸書，就組織發動學生到省參議會去抗議，要求查辦。第二次是澀谷事件，抗議日本流氓迫害僑民。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沈崇事件，台北的大陸籍學生先起來活動，但人少力量很很小，本省學生因不了解，開始時持觀望態度，後來經過我在中間溝通，雙方合起來，在一月八日（一九四七年）

組織了一萬多人的示威遊行。

二·二八以後，台大、師大的學生組織一個「麥浪歌詠隊」，三月廿九日（一九四八年）青年節晚上，在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辦過盛大的「篝火晚會」，其後曾到台中、台南巡迴演出，歌詠隊的隊員還有幾位現居大陸的。次年春天又發生「四·六事件」（註3），國民黨逮捕很多學生，其中有台電總經理劉晉鈺的三個兒子均被槍斃。那時候學生運動受到大陸解放前夕的氣氛影響，「麥浪歌詠隊」公開演唱解放區歌曲，和上海學生運動的方式都一樣。當時，大家都很樂觀，都認為很快就全國解放，國民黨是一定會垮的。

文藝工作

葉：二·二八前，聽說宋非我的話劇「壁」「羅漢赴會」很受歡迎，事件以後，宋非我逃離台灣，文藝活動方面還有些什麼嗎？

周：一九四七年底，我又回到台灣，和豐原人張邱同松組織了「鄉音藝術團」，「收酒斫」、「賣肉粽」、「賣豆漿」這三首民歌，就是張氏那時候的創作（大約是四八年初）。後來我受特務監視，夏天時再離開台灣到上海。「鄉音藝術團」由林秋興（即林知秋）接辦，改為「鄉土藝術團」，吳克泰、徐瓊二都曾參與。林秋興一度曾到上海台灣同鄉會來，是個有進步思想的人，後來回到台灣繼續藝術團的工作，一九五〇年被害。

葉：徐瓊二就是徐淵琛，「台灣の現實さ語る」一書的作者嗎？

吳：是的，徐瓊二是筆名，他是台北市人，徐慶鐘的姪子。原來是民報記者，也是自由報的同仁，王添灯很信任他，很聽他的意見。徐是地下黨員，一九四六年當選台北市參議員，五〇年，國民

黨在台灣第一次對共產黨大迫害被殺害。

葉：另一位省參議員林日高也是同時期被害的嗎？

周：不，林日高是一九五五年前後，以掩護共產黨罪名被害的。林氏是老台共創建人之一，日據時代也被關過。二·二八事件他也被捉去關過一陣子，出來以後還擔任過省政府委員。他是台北縣板橋人，為人處事極謹慎，二·二八當中他也在「處委會」，做了不少事情，但都沒有暴露。老台共在台灣能生存到一九五五年是非常不容易的。

宋斐如和呂赫若

葉：請你們介紹「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的事蹟。

吳：宋斐如的本名是宋文瑞，台北縣鶯歌人（註4），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到北京大學唸書，曾在泰山馮玉祥處講學。抗日戰爭中主編香港出版的「戰時日本」，曾任中蘇友好協會幹事。戰後返台任教育處副處長，創辦「人民導報」，因言論問題頗受國民黨壓力，自總編輯蘇新被迫離職後，換過幾個總編，有的是國民黨指派的特務，後來宋斐如辭去教育處副處長職，親任編輯直到二·二八發生報紙停刊。宋氏是國民黨軍開入台北市後的第一批被害者之一。我曾任「人民導報」的記者，還記得他常對同仁說「是存在決定意識，不是意識決定存在」，「新聞從業者的耳朵要靈一點，要多報導民間不受注意的反應和要求」。一九四六年，我訪問返台的李偉光，寫了一篇「莫忘二林事件」，很受他讚賞。宋是個思想進步的讀書人，但較缺乏組織能力，不擅於團結人。

其妻區嚴華是廣東人，共產黨員。生前在台灣省政府法制室工作。二·二八事件後曾到過廣州、香港，返台時攜帶「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出版物「新台灣」，在海關被查到。一九四九年五月，

曾幫助前「人民導報」主筆陳文彬一家逃離台灣，九月中區氏被捕，次年一月十一日以參加共產黨罪名被槍殺。其子宋亮時年僅四歲，由外公接回廣州。

葉：關於呂赫若的傳說很多，您們曾在「人民導報」共事過？

吳：是的，我和他是「人民導報」的同事，他在王添灯筆禍事件後離開報社工作，轉到建國中學任音樂教員。二·二八事件後，思想更爲開闊，與陳文彬一起有文化界的組織。

周：戰後呂赫若面臨一個創作上的大問題——文字轉換，在報界工作對他很有幫助，他爲人極爲勤奮而且熱情，思想上非常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二·二八事件後參加中共地下黨，主編「光明報」。

【註解】

註1：宋非我，台北市人。早年在基隆當礦工，自一九三〇年代即參加台灣新劇活動，一九四六年，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壁」和「羅漢赴會」，轟動一時，竟遭當局禁演。宋氏所主持的廣播節目「土地公遊台灣」，批評時政，很受民衆歡迎。一九四八年宋氏逃離台灣，經日本、香港到大陸。

註2：「王添灯先生事略」，「台灣與世界」#9，一九八四年三月。

註3：參見鄭洪溪「回憶台灣四·六事件」，「台聲雜誌」#3，一九八四年。

註4：根據宋斐如子宋亮的說法，宋氏係台南縣人。請參見「台灣「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台聲雜誌」#7，一九八六年。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七年三月號

「山水亭」舊事

——陳逸松談二·二八前後的蘇新、林日高、李友邦、林添丁和呂赫若

撰文／葉芸芸

前言

陳逸松先生是台灣羅東人。早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成回台北執業律師。在戰前及戰後初期的台灣政界與文化界都很活躍。他曾任第一屆台北市議會民選議員，當選國民參政員，也是二二八事件台北「處理委員會」組織章程的兩個起草人之一。

一九七三年他離開台灣，經由日本到美國而經巴黎到北京，旋受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一直到一九八二年。陳逸松在大陸停留的十年間，也正是北京對台政策由武力解放轉爲和平統一，台灣島內民主運動蓬勃發展，而海外對台灣前途問題激烈辯論的年代，因而陳氏之出走，以及他在大陸的言論都備受注目。筆者訪問陳逸松先生早在一九八二年的夏天，那時他方由北京抵達波士頓，當時沒有很快發表這篇訪問，純然考慮政治時事的爭議性對歷史事實客觀性的影響。以下是那次訪問比較重要的內容：

葉：您在二次大戰中，支持文化界的朋友主辦文學刊物「台灣文學」，戰後，又馬上主辦「政經報」，在兩個不同階段有什麼不同的想法，促使您做這些事情？

陳：「台灣文學」是由張文環君出面辦的，我始終沒有露面，只負擔財政上的開支。辦這份雜誌，主要是對抗西川滿那一派御用

文人和文學。我們這輩的人，都有民族主義的精神。那是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的時候，日本控制很嚴密，沒有人想得到日本的統治會有終了的一天。那時日本那麼強，中國又那麼弱，日本才佔領新加坡、婆羅洲，誰也想不到二次大戰短短幾年會打成那樣。戰爭末期，台灣人系的報刊全被合併，「台灣文學」也在一九四三年被「皇民奉公令」強迫合併。合併前三三期由王井泉兄找到賣高麗人參的出廣告料金充當印刷費用。那段日子，我們一羣「文化仙」常聚在井泉兄的「山水亭」，或成羣結黨到台南吳新榮兄處，總是喝酒聊天，發揮高論、無所事事，很快樂也很苦悶。

「政經報」是戰後台灣第一份刊物，當然還沒有發行新聞，我先召集一批年輕人組織「政治經濟研究會」，以此為基礎來討論寫稿，頭兩期是我和顏永賢（註1）主編的，後來才由蘇新主編。經費開始也是我個人負擔，我賣了一棟洋房來充當。寫稿的有王白淵、呂赫若、顏永賢、蔣時欽、蘇新、郭水潭、黃啓瑞。我為什麼要辦這份雜誌呢？道理也很簡單：日本人走了，咱們要建設台灣，必須由政治經濟著手。蔣時欽（註2）寫很多探討地方自治的文章。我和陳逢源有個關於經濟問題的對談，是針對米價談的。國民黨接收官員十月初到台灣，一個月之後米價就漲了，到了一九四六年二、三月份，漲了四、五倍。

葉：「政經報」的編輯委員有一位林金莖，就是現任台灣駐日本「亞東協會」副會長的那位林先生嗎？

陳：是的，林金莖和蘇新是同鄉，是蘇新帶他來「政經報」擔任編輯的。這個人的經歷很有意思。他的父親民族精神很強，不准他唸日本書，所以他不會日文，也沒有學歷文憑，從小跟父親唸漢學私塾，漢文底子非常好。就是他在「政經報」工作的時候，我們才向當時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先生推薦，經過特別考試，破例讓他進台大就讀，後來他考上公費生，派到上海唸復旦大學。

葉：聽蘇新說過，在東京留學的時代，您們有很不平常的交誼？

陳：蘇新和我在東京唸書時就認識的，那時候台灣學生運動組織讀書會，我負責東京帝大，他負責東京外語學校。後來日本仔要抓他，他也決定要回台灣從事革命。我介紹他去羅東找盧清潭君。盧君是當地文化協會和工友協會的負責人，是我的同學，思想很進步。當時正好太平山林場在開發，蘇新在他掩護下，到林場當伐木工，躲了兩年。蘇新離開東京後，我被日本警察捉去盤問了四十天，我都沒有透露他的去處。到了台共大逮捕，蘇新被捕，盧清潭也被捕，被日本仔打死在警察局裡，但他至死都沒有供出我的關係，否則我也會被抓，那就不只是關四十天了。我很感激他，這個人是非常難得。戰後，國民黨把他放進忠烈祠。蘇新被日本人關了十二年，大約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出獄的，一出來就來找我。像他這種有共產黨背景的，一般人都害怕不敢接觸，不過，我的地方是律師事務所，他來了有藉口，而且我也不怕。記得那時我介紹他到一家報紙當記者，幾個月後，他才回故鄉佳里，在吳新榮先生的幫助下定居、結婚。日本戰敗，他馬上又到台北來找我，四六年初，他就搬到台北來，主編「政經報」。

葉：光復後台灣一片祖國熱，上上下下都都在學習國語和三民主義，據說各地方的士紳爭先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情況是否真是如此？

陳：可以說當時搞活動的人，都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了。我和「青年團」的成立有很密切的關係。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台灣義勇隊」的副隊長張士德（大家都稱他張大佐），隨美軍登陸艇來台，住進台北的「梅屋敷」（後改成國父紀念館），雖然日本人已經投降，但台灣人仍然怕日本人，沒有人敢去找他這個「國軍」的。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張士德叫人來叫我去面談。我

從廚房小門溜進去，見了面，他就說國軍不久會來，我應該組織青年人，起來保護國家財產，以防止日本人在撤退中的破壞。就是這樣子，我出來呼籲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我任團長，黃啓瑞是青年股長，林日高組織部長，謝娥婦女股（謝娥曾被日本人關過，日本敗戰後，我去接她出獄的）。台中是張信義，楊貴，你的父親（葉榮鐘）也都有參加，台南是吳新榮、莊孟候，高雄是吳海水，新竹有陳旺成。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廿五日，在中山堂的受降典禮上，我們「青年團」的代表也列席了，那是我一生中，有非常深刻體會的一件事。我看到戰敗團的安藤大將，沒有配劍，低垂著頭，站在我們面前簽字投降，我們胸中有一股民族的自豪感。

到了一九四六年二或三月份，李友邦從大陸帶回來一批人，據說是什麼少年先鋒隊（台灣義勇隊），說是有中央任命，他才是台灣支團部主任。早先我們在組織時都是張士德一手寫的任命書，說是「日日命令」，還蓋個章。我們那時候對國內的規矩完全不懂，搞不清楚。張士德還打算由「青年團」接收台北市公共汽車來經營。我們說「青年團」是青年運動的組織，怎麼可以接管公營企業呢？他答說，「可以，在國內青年團主任，官比縣長還大，接收銀行的也有。」不久，我把台北支團部主任讓給洪石柱（屏東人），以後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沒有關係了。

葉：您和李友邦先生相交深嗎？關於他的死，我聽到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他跟陳炯一樣死得無辜，陳儀就是容不下像他們這樣有能力有基礎的台灣人。也有說李友邦確是共產黨人的，您的看法如何？

陳：李友邦是台北縣蘆洲望族李家出身的，關於他的生平傳說很多，不過，恐怕都不正確，不僅李友邦的事蹟，有關光復到二·二八這段時期文章，錯誤都很多。對李友邦印象較深的一件事，是他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講話。他說青年團的任務，就是要吸收

新血，改造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已經太腐化了。

我自昭和八年（1933）開始在台北開業當律師，到戰爭結束已經執業十二年了，可以說各方面都很熟。但是，李友邦在大陸的事情我不清楚，其他在大陸台灣人像劉啓光、黃朝琴的事我也都不清楚，光復後，他們回來被稱做「半山」，說起來「半山」的都有中央、有黨的關係。我們本地台灣人沒有這些關係可牽，就只好靠邊站了。所以他一回來，說是中央任命的——台灣支團部團長，大家就全都聽他的。二·二八時他被捕送到南京，回來後好像很消沉，其中一度出來當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那時我們都住北投，有一些往來，他看來很灰心失意。後來聽說他的夫人先被抓起來，然後才抓他，一九五一年就被槍決了，報紙上說是他在金華時期，國共和談中曾與中共有過接觸，這實在是不合理的說辭，國共和談在當時是國策，當然要和共產黨接觸的，我們國民參政會不也要打電報給毛澤東、周恩來，請他們來南京開會？

葉：你會當選擔任國民參政員，參政員是怎麼產生的？

陳：國民參政會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最高民意機關，每省選出八名，是間接選舉，由省參議員投票選出來的。林獻堂、楊肇嘉、蔡培火、林宗賢，林忠、謝娥、廖文毅、林茂生、羅萬俤和我等都候選人。我們這些人受日本法治思想的影響很重，日本的選舉法有所謂不准「面接」的規定，就是說候選人不可以與投票人直接見面的，故而大家都用書信，說明自己要競選，請對方支持，我記得曾寫信給林獻堂，也曾接到他的信。我想這可能是台灣歷史上最乾淨的一次選舉，沒有人用錢收買。但是主持選舉的國民黨民政廳長周一鶚卻動了手腳，讓廖文毅落選，這也就是咱台灣選舉舞弊的開端，這也導致當時任台北市工程局長的廖文毅後來組織台灣獨立運動。

葉：國民黨為什麼執意不讓廖文毅當選參政員？

陳：大陸自早就有「聯省自治」的主張，廖文毅因為來美國留學，看到美國的聯邦制度，光復後他主張台灣和其他各省都應維持半獨立狀態的自治，國民黨中央絕對是反對這種論點的，我看不讓他當選的理由就在這裡。

葉：當選的參政員會到南京參加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一九四七年五月），聽說還見到蔣介石，有沒有提起二二八事件？

陳：當選參政員的是林獻堂、羅萬俤、林忠、林茂生、林宗賢、杜聰明、吳鴻森和我八個人隨後林茂生表明辭退，我記得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出發去南京的，只有四個人。林宗賢因二二八事件被抓走了，林獻堂和杜聰明被任命為省政府委員，就沒去南京開參政會，他們比較聰明，知道中國政治是要在地方上抓實權才有用。

我們五月初到南京，蔣介石和宋美齡分別請各省參政員吃飯，也請台灣代表，席上蔣介石說二二八事變中還有十萬日軍在中央山脈，說我們台灣人無知都是受日軍煽動的。我就告訴他「不對」，二二八事變是政府的錯，當時我不太會說國語，邊說邊用手比，告訴他台灣的中央山脈地理情勢，一年半期間要從平地運輸十萬軍的補給上三千公尺以上高聳的中央山脈每日要開多少運糧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山嶺上是沒有可果腹的東西。我還帶了施江南醫師兩個女兒寫信給蔣委員長的信，陳請調查施先生的下落，吳鴻森也為他無故被殺害的弟弟吳鴻麒推事寫了陳請書，都在席上交給蔣介石，隨即命參軍長吳鼎昌快辦，後來江南嫂接到蔣介石的參軍吳鼎昌的回信，說是據查，二·二八事件中，並沒有逮捕施江南，不知此人下落。給你一大張紅字公文了事，這就是我們的中國官僚，現在回想，我在席上講的話毫無作用，不過有這麼回事罷了。

葉：二二八當中您會參加台北的事件處理委員會？

陳：依我看，事件完全是偶發的，廿七日晚上在台北發生的事

端，經過廿八日一天，到了三月初一已經全島都鬧起來了。接著一個星期是全島全民騷動，連軍隊的武器有部份都被民衆接管，台中、嘉義還有很多地方都有小型的戰鬥。

台北市的處理委員會一直都在中山堂開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組織章程是我和李萬居兩個人起草寫的。開會的第一天，蔣渭川帶了一批人在會場上喧嚷不休，光復後他組織了一個「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成員大部份是流氓一類的人物，我在台上說明組織章程，那批人就在下面大吵大鬧，對著我叫說：「大交椅你就搶著要坐上去了？」，我當時年輕氣盛，也回答說「大位置你們若想坐，你們就上來坐吧！」我就這樣子走下台回家去了。大約也是這樣，陳儀認為我沒有參加處委會，所以後來也沒抓我。我記得很清楚，一直到三月十七日白崇禧將軍抵台後都還在捉人。白將軍跟一些台灣人代表見面，表面上很同情台灣人。陳儀要防範中央派來調查的人，聽說還故意派軍隊向白氏的座車開槍，誣賴咱台灣人。

葉：「文山茶行」的老板王添灯先生，在戰後初期的政壇上很活躍，他和左翼人士的關係如何？

陳：王添灯是省參議員，對當時台灣的政治很用心，在省參議會很肯講話，相當受到民衆的尊敬。在他身邊是有一批左翼的青年，給他寫稿子準備質詢，我想也因為如此而刺激到陳儀。再加上事件中他在「處理委員會」的表現，所以他是最先被殺害的。到今天我對他最後的印象還很深刻，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不成會要回家，他住大稻埕，順路就送我到南京西路的律師事務所。記得我到了路口下車後，回頭看他時，有很奇怪的感覺。他面無生色就像是死人的面孔，當時我有一種很不好的預感。

葉：戰後初期到二·二八發生的時候，台灣的左翼勢力有多大？您能感覺到他們的影響力嗎？



陳：我認爲左翼的勢力不大，事實上我完全感覺不到，頂多是一些人聚在一起討論問題的程度而已，對大眾沒有影響力，在政治舞台上也沒有力量。不過，歷史總免不了會歪曲，事後能握筆寫文章的聲音就大，有的人很會自我宣傳，真正做事的人反而不講。像謝雪紅說組織什麼「人民協會」「農民協會」，我從沒聽說過，我在籌備「青年團」時，她來台北找過我幾次，她也想在台中組織「青年團」。二二八當中，她領導武裝部隊，後來撤入埔里，這段我聽張深切兄說過。

葉：很多左翼人士在事件以後出走大陸，我相信您在大陸這幾年，對他們到大陸以後的遭遇有所了解的吧？

陳：到大陸的左翼台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很受衝擊，不是被劃成日本間諜，就是被打成國民黨特務，這是歷史的教訓，左翼的朋友們一向只重理論，脫離現實很嚴重。他們組織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也是忙著內鬥，鬥得不可開交，我在那兒聽到很多各種爭執，覺得很氣餒，咱台灣人常常很小的事情看不開，總是要計較，統治者丟來一塊肉，就讓我們搶得頭破血流。

葉：左翼人士中還有一位呂赫若，在當時文化界很活躍的，「台灣文學」曾發表過他好幾篇小說，您和他相交深嗎？

陳：呂赫若的事我還比較知道。我辦「台灣文學」時他才由日本回來，是張文環介紹給大家的，他們在日本曾一起辦過「福爾摩沙」。呂赫若好像是台中潭子地方的人，在日本學聲樂，所以，第一次是在我的事務所開茶會，請他演唱，介紹文化界的朋友認識，那時王井泉兄主持一個「厚生演劇研究社」，呂赫若和王白淵、林博秋都有參加。呂赫若在「台灣文學」上至少發表過四、五篇作品，而且得到文學圈中很高的評價。我們時常來往，他也是「山水亭」的常客之一，但私人的事很少談起，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對台灣政治、文化發展有很高的熱情，他的日文非常道地優美，中文

不好，是光復後當記者時才鍛練的。後來左翼中有部份人在國民黨肅清恐怖中逃入新竹大母山內，躲在深山林裏沒有糧食，有時到山下農家乞食，聽說是夜宿在草堆，被毒蛇龜角花咬死的，死時大約只有三十出頭。

二二八之後，他在辦「光明報」（註3），後來知道國民黨要捉他，大概準備要走，來找過我一次，告訴我他要再去日本，要我幫他經營印刷廠，我因律師事務忙碌沒答應他。他才找辜顏碧霞，她應允了，這是爲什麼她也被捉去關了五年。

葉：印刷廠的案子好像還牽涉到劉明先生？

陳：印刷廠是呂赫若和蕭坤裕一起經營的。蕭氏跟劉明先生是像兄弟一樣的朋友互稱「親家」，平常就在劉明的金礦公司——振山實業當顧問，幫忙管理礦山。印刷廠開辦時，劉明曾給他們一筆錢，後來就因而被捕，本來都判死刑了，用的是「資匪」的罪名。劉明先生的哥哥劉傳來和我兩人才找游彌堅市長帶路，去求見保密局長毛人鳳，向他說明，劉明先生很受台灣人尊敬，若殺了他是會失民心的。毛人鳳才答應再考慮，後來才改判十二年。的確，劉明先生一直默默地支持文化界，出過很多錢，卻從來不出名，是個非常難得的一個企業家。

蕭坤裕是南投人，家裡開布店，學生時代我們都在東京，大家很熟，他是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的，那時候大學生愛談理論，卻都一知半解，只有他是真的馬克斯理論的權威。後來他到南京教書，一度被「藍衣社」當做日本間諜逮捕，因而他很失望，離開南京到大連，跟一位同鄉張宗田開醫院，光復後才回台灣。他的境遇實在悲慘，在獄中被刑求而死，特務捉了他以後，把他的房子和太太都強佔了。

我想二二八事件後，這段歷史的事實，很需要公開出來，咱台灣人才能對自己悲慘的歷史有比較具體的認識。至於說，台灣人

怎麼處理自己的命運問題，也只有詳細了解歷史以後，才有基礎去研究。

葉：最後請您談談對王白淵先生的印象。

陳：王白淵兄是彰化二水人，東京美術學校畢業。我們是一九二八年在東京認識的。他畢業後到岩手縣盛岡市女子學校教書，跟一位日本女學生談戀愛，受女方家庭反對，失意才回到台灣，後來與艋舺大戶之女結婚。白淵兄是個非常善良的人，藝術造詣很高，寫過很多藝術評論，也能畫。光復後他任職新生報編輯，回想起來，他是很有眼光的，當我們都一頭熱在搞「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時候，他就說這種有黨的關係的組織，他都不參加。不過，自從他的好朋友謝南光跟駐日代表團在東京換國旗，投誠中共以後，王白淵的日子就很不好過，每次謝南光從北京到東京開會，王白淵就被捉去關起來，謝在東京逗留十天，他就關十天，去四十天，他就關四十天，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年。

王白淵和王井泉都在一九六〇年前後相繼去世。井泉兄的追悼會最有趣了，老朋友們都來圍坐在他的棺材四周，喝酒聊天，「古井仔，起來喝一杯！」就好像往日「山水亭」的景況。

【註解】

註1：顏永賢是辜顯榮大媳婦顏碧霞的弟弟，二·二八事件後出走大陸，目前在巴西。

註2：蔣時欽是蔣渭水的二子，二·二八事件當中組織台北青年學生，事件後出走大陸，文革當中病故。

註3：「光明報」係二·二八事件後係中共台灣地下黨的刊物。

歷史的播弄

——訪台灣先行代體育家林朝權

■ 撰文／葉芸芸

前言

目 前住在上海，八十歲的林朝權先生，在一九〇六年出生於台灣台中縣的清水鎮。林老自稱遍歷過四個朝代的台灣人。自東京日本體育大學畢業後，他曾任教於台南市的長榮中學。二次大戰中，他任教日本佔領下的北京師範大學，戰後才回到台灣。一九四八年，當選國民政府台灣省國大代表。中共政府成立後不久，經香港到大陸定居至今。林老現任大陸的政協委員、上海市棒壘球協會副主席及上海市台胞聯誼會名譽會長。

林老是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在上海市筆者下榻的上海賓館接受訪問的，當時在場的還有旅居香港的台灣作家施叔青女士。

見過彭明敏和陳都

林：我本來任全國台灣同胞聯誼的副會長，林麗韞是會長。今年三月改選，再被推薦，但我辭退了。我已經八十歲了，應該讓年輕一點的來做，較能起作用。

再者，去年奧運會時，我和林麗韞到過美國洛杉磯，當時和美國台獨系的陳都、彭明敏都見過面。我是真心要和他們交換意見，他們卻誤會我和林麗韞是去搞統戰的，大家講話總是不對頭。其

實，我在國民黨的時代不曾入黨，在共產黨的地區，也不曾加入共產黨。因為我想，以黨外的身份做事比較自由，所以我要堅決辭退。以後，我要再去探親訪友，交換意見，都較自由。我愛我的祖國，同樣愛我的家鄉，我的心從未離開過台灣。落葉歸根，我父母親的墓地都在大度山上，我也希望能歸根到那兒，那是我永久的所在。我的家鄉觀念很強，我在那兒做過很多的事情，尤其是體育工作。

葉：你在什麼地方唸書的？

林：東京的日本體育大學。畢業後，回母校台南長榮中學任體育教員。抗戰期間，回到北京師範大學任體育系主任。

葉：抗戰中，你一直在北京嗎？

林：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都在北京。

葉：當時北京還有不少台灣人吧？

林：北京師範大學就有張深切、張我軍、洪炎秋、江文也——前幾年才死的，妳知道吧？以前被戴了一頂右派的帽子。張秋海——畫家，目前還在北京，已經八十五歲了。郭柏川——畫家。廖繼春——畫家，我的姐夫。我的弟弟林朝路是地質系主任。還有音樂界的前輩柯政和。我們自稱「北京八仙」，每個禮拜都見面，到了日本投降後，大家都散了。我軍、炎秋、深切、繼奉、弟弟和我回到台灣，江文也、張秋海和柯政和留下來，柯政和戰後一度被判了無期徒刑。

教書也算漢奸

葉：為什麼？

林：漢奸啊！教書怎麼是漢奸呢？！不過，後來放出來了。

葉：好像張我軍在北京師大教書這段歷史也曾被批評，你的看

法如何？

林：我的看法是這樣：當時咱台灣人是日本國籍啊！又會說日語，我也被人誤解是漢奸，我的弟弟也有同樣遭遇，這是沒法度的，是客觀現實的關係。所以後來有「台灣人無漢奸論」的說法。

葉：就是當時丘念台先生所極力主張的？

林：是的。我們又不是當警察局長或在軍隊裡。在台灣教書，還要有「皇民化」的精神，在北京並沒有，我是教體育的，就是教學生怎麼打球。當時，我們這些老朋友都很苦悶，我們既愛祖國，也愛咱台灣，這些都是不會改變的，但是日本人也並沒有強迫我們戴個漢奸的帽子，或要我們為他們工作。像江文也，只是個音樂家，誰又不知道我林朝權是體育家呢？直到今天，我仍希望能為中國的體育做出貢獻，我們常被人侮辱為「東亞病夫」，我很不甘心，我和日本人在體育運動競賽時，從來不輸他們的。

葉：一九三八年，是什麼原因？你要到大陸來？

林：當時是這樣的，年輕的十幾、二十歲的，都派到第一線當軍伕，有相當知識和技術的，則讓你就專長做貢獻，搞音樂、體育啊！像我弟弟是學地質的，就去搞考古。

葉：有沒有不願意為日本人效勞的想法？

林：日本人對台灣人總是歧視的。回到祖國，是比較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覺得較有意義。

施：同樣想法，不願意為日本人做事而回到大陸來的人多嗎？

林：但是要有專長才有辦法來的。像吳三連在天津做生意，也有人到重慶，像丘念台。當時已結婚，有三、四個小孩，就沒有條件去後方啊！

施：所以你這一輩，當時能到大陸來的還是很少的！？你能來，是有什麼背景？

林：能回來的確是少數。我是因為柯政和的關係。一九三八年

我自日本體育大學畢業，回台灣教書，正好日本人在抓壯丁、徵兵，有本事的人都要自己找出路啊！當時柯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當音樂系主任，台灣人來了都找他幫忙介紹工作，江文也也是他介紹來的。

林茂生被害受衝擊

葉：你是一九四六年才回台灣的？

林：一九四六年五月份，帶著太太和四個小孩回到台灣，國民黨就任命我當「台灣省體育協進會」總幹事，就是現在紀政的職位。游彌堅、黃啓瑞、謝東閔都是常務理事。一九四八年，謝東閔任團長，我是副團長，帶了一百多人的台灣代表團，回大陸參加國民黨主辦的第七屆全國運動大會。

葉：二·二八事變時你在台灣嗎？這個事變對你有何影響？

林：二·二八事變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林茂生先生的被害。茂生先生是我就讀長榮中學時的英文老師，後來我回長榮當老師時，他在台南高工教書。我每禮拜都到他家打麻雀（麻將）吃飯，茂生先生和先生娘就像我的家長，宗義、宗仁就像我的弟弟。現宗義每次來，下了飛機就要找我，很多海外的台灣人，來了都要找我，特別是體育方面的……。

葉：請你繼續談二·二八的事，好嗎？

林：二·二八的時候啊！我既不是共產黨員，對共產黨也沒有什麼認識。當時，台灣人都起來了，而且相當團結，但是大部份人都不是什麼左派或共產黨，像我的弟弟、張我軍、洪炎秋、張深切他們那裡是什麼左派或共產黨？台中市是以台中師範（洪炎秋是校長）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廣播電台、空軍機場都叫羣眾佔領了。謝雪紅的弟弟謝振男和我一直是打棒球的搭檔，他是投手，我是捕

手。但是，我到二·二八時才第一次見到謝雪紅這個女傑，配帶著兩把刀一枝小手槍。這以前，我只聽說她是到莫斯科留學的日本共產黨員。

今年（一九八五）是台灣光復四十週年，八月十五日，這裡的統戰部要我去講一些當年的情形，我也確實有一些感想要講的。咱台灣人不滿的是國民黨的貪污亂搞，才起來反抗，無論共產黨員或一般人，大家都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在做事的。

二·二八發生時，我由上海趕回去，大約三月四日或五日回到台中，住在親戚顏春福的家裡，奔走營救被捕的朋友和體育界的同事，像台中市體育協會的理事林連城兄弟（註1），還有林茂生（註2）和陳能通（註3）兩位先生，我都和他們的家人到處去找，也去向柯遠芬（註4）求情，高兩貴（註5）被憲兵隊逮捕，我把他藏在親友處。還有，吳振武（註6）的腳被手槍打傷，也是我送醫的，後來我把他介紹給海軍司令桂永清，救了他的性命。

葉：吳振武後來沒有坐牢嗎？

林：他在桂永清手下當少尉。

當選國大代表

葉：你在台中市競選國大代表，是二·二八以後的事？

林：首屆國大代表選舉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最初是我林湯盤兩人登記參選，但有人勸我們退出，讓丘念台先生出來（註7）。我說丘先生是我們的前輩，就一口答應了。但林湯盤執意不肯讓，他認為丘先生雖是台中市人，但抗戰中都不在台灣，台中人對丘先生沒有感情；而且林是樹仔腳（台中市南區）的大地主，很有錢。後來，我就跟丘先生說，他既堅決不退讓，我就要和他競選。

葉：結果是丘先生退出，而你當選？！

林：是的，當時台中市民對我相當有感情，農校、一中、二中和商業學校的運動員都來幫忙，我當時兩手空空，沒有一點錢，競選經費都是顏春福和林鶴年（註8）等朋友湊出來的。

葉：丘念台先生退出競選後，原來支持他的一些人，像莊遂性，葉榮鐘等是不是轉而支持你？

林：是的，因為先前我曾表示願意退出，擁丘先生出來啊，所以我得票數超過林湯盤很多。

葉：戰後初期，台中市還有個「人民自由保障會」的組織，你清楚嗎？

林：不知道。

葉：「政治建設協會」和「人民協會」你知道嗎？

林：我都不知道。老實說，當時我的興趣是在體育運動而不是政治，我只想繼續日本人打下的基礎，把台灣的體育運動搞起來。

葉：日後你再度離開台灣去香港，是為什麼？

揭露選舉總統弊政

林：主要是二·二八以後，我覺得台灣人民和國民黨之間的仇恨，是沒有辦法解消的。後來，又發生了兩件事，一是我想辦一所體育專科學校，林鶴年要捐土地，還有許多朋友願出資，我向陳誠提出申請，不准。另一件是，我到南京參加首屆第一次國民大會，回去在台中市後龍仔的戲台（樂舞台戲院）向選民報告國民大會選舉的情形（註9），我很不客氣揭露，國民政府在南京最後一次選舉的詳情，包括四十多人在會場絕食抗議，孫科和李宗仁的競選鬥爭，以及會場門口抬棺材的抗議隊伍等等。我是沒有政治觀念的，只知道實情是什麼就說什麼，那時候曝露這種問題，就等於是反國民黨的。後來台中的國民黨報民聲報，接連三天刊文章說林朝權是

得某方面的指使，意思說我是共產黨支持的人。

我反對國民黨，因為他對咱台灣人不好啊！我的心情很矛盾，又要去競選國大代表，又要反對國民黨。本來以為當國大代表能為台灣人講話，事實上卻不是如此，要做官也要會拍馬屁，我自己也很清楚，要是像謝東閔那樣向這方面發展，我也能升官發財，當時國民黨認為我對青年人有些影響力，陳立夫和陳果夫跟我提過，要以「台灣青年領袖」的名譽介紹我入黨當特別黨員。所以我那時候是很矛盾，台灣人的問題，常常想得我頭痛，台灣獨立卻是我從來不考慮的，直到今天，還是很矛盾。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統一是不可能的，至於，一個國家兩種制……你們怎麼看呢？我很想知道在美國和台灣台灣人對共產黨、對統一問題的看法？

去年在杉磯，彭明敏請我和林麗韞吃飯，但是沒有談什麼，他的父親彭清靠是我的老朋友。後來又見到陳都。他說，你們共產黨口口聲聲說什麼要為人民服務，要支持人民革命，都是假的，在洛杉磯和「美麗島週報」座談，他們就在報上寫什麼「中華全國台聯會會長林麗韞、副會長林朝權，有統戰任務來美做工作……」，我就想不通了。我根本不知道「美麗島」是什麼樣的報紙？我在這兒沒有什麼消息，不知道外邊的事情。我希望有機會到美國見見我的侄子廖述宗兄弟，聽聽他的意見。

因歷史罪過坐牢

葉：一九四八年你離開台灣到香港時，已經打算要回大陸嗎？

林：當時我有兩條路，到日本或回大陸。到日本可以投奔林獻堂，我父親是林烈堂的管家，我從小叫他「獻堂叔仔」，我競選國大代表時，他給我很大的贊助。回到大陸則可以脫離國民黨的關係，當時咱台灣人是痛恨國民黨的。我也常想不通，為什所尊敬的

前輩蔡培火、楊肇嘉要去當國民黨的官呢？想來想去，覺得日本過去對咱台灣人也不好，當時又戰敗，生活很困難。後來大陸解放了，新政府成立時，毛主席呼籲台灣人「棄暗投明」回到祖國。我也認為，要解決咱所愛的台灣的問題，還是只有祖國。所以最後我選擇了這條路。回來以後，雖然受過很多苦，走過曲折坎坷的路，但是，我還是認為回來是對的。人總要往前看，往後看事情就不對了（笑），我回來以後的事，你不知道吧？

葉：我知道一些，但不完全。你是一回來就被捕的嗎？

林：（笑著點頭）你怎麼知道的？

葉：關了幾年？

林：判了五年嘛！

葉：什麼罪名？

林：歷史罪名。

葉：因為你當國民黨的國大代表？

林：是的。當時我很天真。

葉：你不後悔嗎？當時你是怎樣的心情？

林：我沒有後悔，我安慰自己。如果我留在台灣反國民黨，說不定被蔣介石槍斃了啊。我聽說後來孫立人被軟禁了，我就做過孫的高參。

葉：當時是不是有人建議你在進入大陸前發表聲明，辭掉國大代表的頭銜？

林：有的。我長榮中學的同學林炳坦，當時在美國大使館工作，他就反對我回來，他說「你若到共產黨那邊，至少還判你個十年。」

坐牢未有心理準備

葉：那麼，你回來以前是有心理準備了？

林：沒有、沒有，我不相信。我說毛主席對俘虜都說優待了，怎麼會有這種野蠻的事？什麼「歷史罪行」？是我不曾想到的。既然號召台灣人棄暗投明，放棄反動的立場回到祖國來，這怎麼說得通呢？我後來才理解，這是「左」的思想的關係，並非共產黨的政策。

葉：在什麼地方被捕的？回來多久？

林：在上海，才回來十天。

葉：關滿了五年刑期嗎？

林：五年滿了，還留在農場兩年。七年後才回到上海，任體育代課教員，當棒球教練。到了文化大革命，過去有「歷史」的，人人都得吃虧，咱台灣人很多，老共產黨員也很多。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的政策，像我這種人都徹底平反了。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可以把事情很坦白的說個清楚，國民黨是寧可錯殺一千一萬，也不放過一個。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確實有錯就改。像我的問題，過去處理錯誤的，都平反恢復名譽了。

施：你擔心會有再一次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嗎？

林：很多海外的台灣人說「不可靠啊！變起來很快的」。我相信鄧小平在世，不會有變化的。以後呢？比較過去和現在的政策，那個好呢？四人幫的作法太無理性了，人民不會答應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的。

不應該當國大代表

葉：你一生經歷過三個政權，剛才你比較了國民黨和共產黨，

那麼日本人的統治呢？

林：我受的是日教育，感情上來說，我有很多日本人的好朋友，但政治上，他們發展軍國主義，我們受其侵略侮辱，從國家民族而言，當年的日本絕對是我們的敵人。光復的時候，我非常高興能回自己的祖家定居，對國民黨很感激，但二·二八事，那麼多台灣人被國民黨殺害，至少有兩萬人，從這來看，當時我不應該去當國民黨的國大代表，我也有後悔的。

但是，因為我是個運動員，事情要有競爭，就不肯認輸，競選的時候，我也是這種運動員的精神，並沒有深一層去考慮利害關係。

葉：年初「台聲雜誌」有一篇文章提出「台人治台」的說法，你認為如何？

林：這是違背共產黨的政策。

葉：不談黨的政策，談談你做為台灣人的個人見解。

林：我不能談這個問題。

葉：我們的雜誌轉載了這篇文章，也刊登了幾篇討論的文章……。

林：那麼，你們的看法呢？「以台治台」，若是以台灣人的立場來談，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但中央政策而言，若真如此，台灣就成獨立了。從前，謝雪紅提到「高度自治」，右派帽子就戴上了。

施：其他在大陸的台灣人，對這個問題的想法呢？

林：這不能發表，「台聲雜誌」已經是錯誤的啊！這和中央的政策是有抵觸的。

葉：一個黨的政策制定，也是需要聽聽老百姓的意見和願望的吧？從地方自治的觀念來談，這條路將來也是必然要走的。而且，「台聲雜誌」只是台灣同胞聯誼會的刊物，並不代表共產黨中央的刊物，這種討論應該容許吧？

林：你的想法太天真了。若是這麼說，台灣的黨外雜誌怎麼會停刊呢？上回，鄧穎超跟一位美國來的鄉親說，下棋是要一步一步走，不能起手就把對方將死，要跟台灣和談，當然是跟國民黨對話，軍權都在他手上。所以說「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道理就在這裡。我願意和你談這個問題，因為你我能把這問題談得徹底，但我也必要堅守的原則。

葉：這個我能理解。

林：對台灣將來的問題我很關心，我是經歷過四個朝代的老人，無論是日本人統治下，是抗戰中的北京淪陷區，是一九四五年到台灣接收的國民黨，亦或是解放後共產黨統治的大陸，我這個台灣人都經驗了，也曾在政治上起過一點點小作用。

在日本人統治下，我只能以體育競爭和日本人對抗。但是，你看美國的黑人，在體育上表現那麼傑出，他們都很驕傲，這就是民族的榮譽，所以，日據時代我要組織台灣人的棒球隊，台灣人應該努力由各種方面表現我們的榮譽和優越。我已經八十歲了，頂多再活十年，能夠做的事情很有限，把我一生經驗的感想留給後代，也是我的責任。

葉：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註解】

註1：台中市消防隊長，二·二八事變中，用消防車噴汽油燒台中縣長劉存志的住宅。

註2：一九三〇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四六年任台大文學院院長、「民報」社長及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後被害失蹤。

註3：日本京都大學畢業，長老教會淡水中學校長，二·二八事變後被捕遇害。

註4：時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

註5：台中人，日據時代社會運動積極參與者。

註6：曾任日本海軍陸戰隊少佐，二·二八時任台中武裝部隊總指揮。也有一說，吳氏係國民黨特務。

註7：參照丘念台回憶錄：嶺海微飆。中華日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初版。

註8：林獻堂兄林烈堂之子，後曾當選台中縣長，任內涉貪污瀆職官司。

註9：首屆國民代表大會係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間在南京舉行。順利選出蔣介石為總統，但副總統共有六人競選，極為激烈。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六年 七、八月號

參加台灣旅京滬七團體記略

——赴台調查「二·二八」事變經過

撰文／陳碧笙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發生後，我曾於三月十一日，以閩台建設協進會代表的身份參加「台灣旅京滬七團體赴台調查團」，由南京飛往台北，僅住一晚，次日即折回，蒐集到不少資料。

一九四六年底，「閩台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在上海成立，由希泉介紹張錫祺、張錫鈞、張維賢、李天成等三、四十人參加。當時，陳儀統治台灣已一年多，在「劫收」政策的影響下，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商店倒閉，工廠停工，八十萬工人失業，三百餘萬農民陷入絕境，人民憤恨已極。我們同台灣旅滬同鄉會、台灣旅京同鄉會、上海台灣同學會、台灣革新協會等座談了幾次，把得來的情况不斷在報紙上公佈，以冀引起社會的注意。

五項要求

「二·二八」事變爆發後，因消息被封鎖，京滬所知不多，直至三月四日始得知較多情况，我們立即在老靶子路台灣同鄉會召開台灣旅六團體聯席會議，決議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後援會」。三月五日，在大西洋餐廳招待記者，我因會說普通話，被推就「二·二八」慘案的責任問題發言，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九日，我偕楊肇嘉等赴京請願，提出五項要求：一、立即允許台灣自

治，省長縣長一律民選；二、廢除特殊化的行政長官制度及其一切法令措施；三、懲辦陳儀及軍政實際負責人；四、取消台灣的專賣制度及官營貿易；五、撫卹傷亡，立即釋放被扣押民衆。十日下午二時，在泰利酒家招待新聞記者，由我報告慘案發生經過，各代表亦多發言，聲淚俱下。

是日，南京政府派國防部部長白崇禧赴台宣慰，國防部史料局長吳石（閩台建設協進會會員）建議先派台灣各團體代表赴台了解情況，白表示同意，遂於下午六時由吳陪我往國防部見白。白對我所提意見作出如下答復：一、改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台灣省政府並準備著手實施；二、專賣制度可以取消；三、台灣省內外人一律平等；四、派軍赴台僅係駐防性質，並非對付人民。十一日，吳石打電話謂，已由空運大隊派出專機一架，載各團體代表及軍法司司長何孝元等赴台，白本人亦準備於十二日前往。是日上午十時，白還在國防部大門口接見各代表一次，重申派軍並無對付人民之意，希望大家放心，半小時即散。

我們被監視了

正午十二時專機出發，午後一時抵上海，先後登機者有楊肇嘉、張邦傑、陳碧笙、張錫鈞、張維賢、李天成、王麗明、林松模、林有泉、陳重光、黃木吧共十一人（李偉光匆忙趕到，因飛機已發動，故未及），加上記者二人和國防部人員三人，共十六人。四時許抵達台北松山機場。一下機就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原來是我妹夫林為霖。我問情況若何，他只簡單地回答說：前幾天很緊張，現在稍微平靜一點。我們登上汽車，開往市內，沿途所見盡是軍隊憲兵乘卡車手持武器嚴密巡邏，店門緊閉，行人絕跡，偶然還可聽到一些零落的槍聲。汽車駛到大公司，空無一人，折到新生

活賓館居住。這是一座官方的招待所，就在行政長官公署的對面。何孝元司長持國防部文件及代表名單前往聯繫。在等待間，賓館周圍高地均已佈滿崗哨，交通斷絕，禁止代表外出並不得與任何人接觸。我到廁所小便，背後即有手持槍支的士兵跟隨，緊盯不捨，後才知道每人都受到監視。我同楊肇嘉、張邦傑三人在房內談話，張神情頗為緊張，說陳儀殺人不眨眼，在福建連軍統頭子張超都被殺掉，何況乎我們？楊肇嘉比較沈著一點，說台灣問題有國際背景，不必過慮云云。就在軍憲的嚴密監視下，有幾位代表的親友化裝成大師傅或服務員，混進賓館，與代表們見面，把基隆、台北、台中、嘉義、高雄各地大屠殺的情況詳細告訴我們，使我們知道了一些事的真相，這是我們到台後的最大收穫。

陳儀的殘酷鎮壓

十二日晨，戒嚴更加嚴重，內外交通全被隔斷，旅客離開必須檢查行李，門外通往車站的空地也有憲兵站崗，早飯後空氣才略為緩和一些。八時，台灣警備司令部總參謀長柯遠芬親來巡視，並與大家見面。九時半，何孝元由長官公署回來說：陳長官要大家乘原機回去，大家如脫虎口。聽說這是因為白崇禧部長曾口頭保證代表們的身體安全，否則我們這些到處痛罵陳儀的人是不能倖免的。飛機於十一時起飛，下午二時抵達南京，住在中央飯店。代表立即集合，將所聽到關於大屠殺的情況如實寫出，由我連夜整理成篇。十二日下午四時，在泰利酒家招待中外記者，到者好幾十人，因為大家都非常關心台灣的消息，我所報告的國民黨在台灣大肆屠殺的真相，如殺人之多，各地估計死者在萬人以上，連重輕傷計入，至少有三萬餘人；如手段之殘酷，在基隆他們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五人一組拋入海中；在高雄則對千餘集會羣衆用機槍掃射，全部

死亡；在台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從三層樓窗口推下，跌成肉餅，高雄許多人被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嘉義、台南人民聽到一律免究的廣播後向當局自首，亦被捕殺等等，其中有許多在國內或國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聽者極為動容。很多人要求我簽名留念，散會後仍有幾位記者跑到中央飯店來找我。

五點意見

十四日，全世界各報普遍登載台灣大屠殺的消息。十五日下午二時，我們又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招待記者，重新報告一次，內容見《台灣旅京滬七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其最後聲明五點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參考價值，特摘錄要點如次：一、關於台灣大屠殺之真相，應由各機關各團體組織調查團赴台詳細調查，對主持屠殺之軍政長官應依法起訴，處以極刑。二、關於台變善後，應特別注意停止清鄉、釋放被捕士紳、勸諭青年回學、調防肆行殺戮與台胞結深仇之部隊，扣留貪官污吏予以究辦。三、陳儀等協迫國大代表、參政員等十七人聯名通電挽留陳儀，並保留行政長官制度與專賣局、貿易局，此種盜竊民意之伎倆，不值識者一笑。四、紐約《華盛頓郵報》主張將台灣交與聯合國託管或脫離中國，此種幸災樂禍、意欲分裂中華民族團結之言論，我們堅決反對。五、政府當局一再稱台胞深受日本奴化教育為此次事變主因，我們絕對不能承認。台灣雖淪亡於日本五十一年，但台胞思想絕未奴化，且光復當時傾向祖國、熱烈歡迎國軍與官吏之程度，實超過國內任何一省之人民。政府如真欲收復人心、確保台灣，應虛心檢討一年半來台省行政設施及人事失敗之所在，坦白承認，實行改革，切勿斤斤於表面之尊嚴，或一二官僚之面子，巧為掩蓋，轉而辱誣台灣人民，排

斥台胞於國族之外，終至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本文發表于「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紐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二八的前前後後與丘念台

林憲·戴國輝對談錄

按 照中國人的習慣，給林先生拜個晚些的舊曆新年。前幾天，紐約「台灣與世界」的發行人葉芸芸女士給鄙舍掛來長途電話，她係我們所敬重的前輩葉榮鐘先生的二小姐。說是在紐約於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兩天召開台灣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與研討會，希望我和林先生能參加並作有關報告。但我正逢學期結束考試之際，校務纏身，林先生亦是事業繁忙，不能前往與會。為彌補此遺憾，今天特邀林先生作一次晤談。請林先生以丘念台先生的秘書之立場，對二·二八事的前因後果以及丘先生在此期間的表現作一簡單的歷史回顧，以給此問題的研究留下寶貴的歷史性資料。現在，請林先生先略述以下您自己的經歷。

林憲：長話短說，我是在台灣南部出生長大的，日據台灣時代的中學畢業後，由朋友鼎力相助，得以東渡日本，進入大學學習法律。在日本，我不但和台灣同學相聚，也和大陸來的同學常常聚會暢談。當時正逢國難當頭，談論的話題自然離不開中日戰爭。我和台灣的同胞青年，本來就對日本統治台灣深懷不滿，現在又看到日寇侵犯自己的祖國，家恨國仇更激起一腔青春熱血，我深深感到，只有祖國強大、同胞團結，才能將台灣從日本桎梏解放出來。因此，我便毅然決定返祖國大陸直接投身抗戰。這樣，經過一番苦心周折後，我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到祖國，以後其他同學也陸續回去，而大家集在上海一起尋找到後方去的機會。同時在此期間我們辦了一份小雜誌，名叫「河山」以鼓吹愛國思想。但是，因為正逢

戰爭進入末期，到處混亂不堪，因此我們未能進入後方，故而一直滯留在上海。

丘念台樸素誠懇

戴：林先生是在上海與丘念台先生相識的嗎？能否談談這中間來龍去脈？

林：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來上海接收，這段時間極為混亂。當時，由於日本侵略者的離間政策，利用一部份流氓等惡劣台胞到大陸各地來欺壓大陸同胞。更於戰爭後期施行徵兵、徵用強迫台胞當兵當軍屬直接投入大陸戰場充當炮灰去打自己同胞。其實，除了少部份良心變質的台灣人以外，大部份台胞都是傾愛祖國，希望祖國強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救台灣的。但是，戰爭結束後，當時有一部份大陸人士就以有部份台灣同胞曾協助日本為理由，反過來壓迫無辜的一般台灣同胞，並且還有部份壞人乘機敲詐搶劫。為此，我們在上海組織的青年同志會，就起來進行澄清事實的宣傳，幫助受迫害的無辜台胞。同時，我們幫助被日軍拋棄後從內地各地流落到上海而無人管顧的、前被徵調的士兵軍屬及一般平民，解決食宿問題。又給他們開補習班教祖國國語、歷史、地理、音樂等。最後協助他們乘船回台。

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和丘念台先生在上海首次見面了。當時，丘先生從廣東到重慶，然後在去台灣的途中路經上海。和丘先生初次見面，我便覺得他樸素、誠懇、毫無名人的故作姿態，對我們青年人尤其客氣、熱情。他向我們娓娓講述各種各樣的問題，充滿了對祖國熱愛，對台灣的關懷，使我深受感動。同時，不知何種原因，丘先生對我也產生了良好的印象。他要我返台後，再與他聯繫，希望我為光復後的台灣做些事情、盡些責任。這樣，我在丘先

生去台灣一個月後，也回到了使我夢魂牽繞的故鄉，並立即與丘先生取得聯繫，開始給他做秘書的工作。

台灣人反感的主因

戴：丘先生這時主要做了那些工作，產生了什麼影響？

林：剛才已談到，戰爭勝利後，很有些人對台灣同胞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以戰犯漢奸的罪名加以迫害。而丘先生在廣東、重慶時，就對國民黨軍政方面加以解釋和遊說，要他們正確地對待台灣同胞。同樣，丘先生到台後的第一件事，也就是繼續向長官公署陳情。因為當時長官公署已開始抓人，甚至連在日本統治期間組織文化協會進行反日鬥爭，愛國且久負盛名的林獻堂也有被捕入獄的可能。因此，丘先生竭力向陳儀說明這樣兩個情況。第一是關於台灣獨立運動。確實，日本投降後，日帝最末代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曾策劃過這個陰謀，但事實上也只有幾個人被迫參與，而他們只予敷衍拖拉時間以等待國軍前來接收而已。其次，對於台胞中極少數真正喪失良心直接加害同胞的戰犯和漢奸證據充足者應抓之外，大部份的士紳仍然是無辜的，他們有被迫參加皇民化運動的背景，內心也是極為痛苦的，故而也是受害者。丘先生認為，台灣剛光復，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捕和打擊士紳台胞，對於局面的安定及台胞的情緒上是很不利的。

我回台後，因為丘先生當時是國民政府委派的監察委員，需要到台各地察看調查，我就跟隨他。當時我們就切實感到，台灣社會是情勢不安定的，人們對黨政軍當局及接收人員的態度作法是不滿的。造成不安定和不滿的原因有這樣幾個：(1)當時尚有幾十萬日本軍民沒有被遣送回去；(2)國內接收官吏良莠不齊，接收人員驕傲橫行，多欺壓民衆。大陸的軍人和商人來台後，除一部份克守本職，

與人為善之外，很大一部份人以勝利者自居，飛揚拔扈。(3)當然也存在著風俗習慣不同的問題，台胞長期同祖國分離，且又受日本殖民統治達半世紀之久，對問題的思考方法、社會行動方式與大陸同胞有些差異，這種思考方法與生活方式上的差距也帶來了矛盾。(4)戰爭結束後，原來去祖國內地和南洋海外的台胞紛紛回台；他們本來在外就受歧視與委屈，回來後大部份又失業，因而本能上對當局帶有反感。

促國民黨正確對待台灣同胞

除了上述幾個原因外，還有兩個最大和最根本的原因。這就是政治上對長官公署制度的不滿和經濟上對大陸接收人員獨霸日本殖民產業的憤慨。就前者而言，台灣同胞認為，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高踞在人民頭上，現在光復了，仍然不像大陸一樣實行省政府制度，而是用類似總督府一類的長官公署的特別制度；此外，台胞不能擔任高層官吏，只能做打雜聽差的下級官僚的工作，這不就是歧視台胞嗎？這和日據時代又有什麼不同呢？儘管當時當局設置長官公署有出發點好的一面，但客觀上卻是引起台胞的極大反感。就後者而言，光復後，台灣人期待著日本人在台的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能回歸到台灣民間來，好好藉而發展起來。但恰恰相反，接收大員將其全部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國營，黨營和官僚資本管轄之企業。這樣，失業和生活困難的情況極為突出，我認為經濟上的混亂比政治因素還要重大。因此，台灣民衆和士紳紛紛要求爭取政治上的民權和經濟上的生存權。這就是說，他們本來的目的並非是一律反對大陸來台人士，而是要反對剝削和壓迫台灣民衆的官僚尤其是貪官污吏。然而，抓住經濟實權和政治實權的清一色都是大陸人，亦即所謂的外省人，這樣表面上就變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對立和抗爭

了。其實，台胞並非真正完全排外，對大陸來的好官吏、好老師是尊重的，私人關係也是很好的。

提議組團赴中央溝通

再回到丘先生的話題，他當時就感覺到，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遲早會出事。丘先生一直認為，要挽救台灣的困境，必須和祖國的强大聯繫在一起。要是讓重大不幸事件發生，丘先生擔心會導致有野心的第二國插手台灣，再次使台灣脫離祖國。他認為，台灣同胞對祖國不太了解，國民黨有關人士也缺少對台灣的認識，而醉心於恐懼台灣脫離祖國或親日漢奸論，強調特殊化而實施行政措施（其實反對在台灣實施自治也是違背三民主義的）。光復一年，台灣民衆不能直接同南京、中央政府聯絡，上下不達，內外隔膜。因此，丘先生提議應由台灣民間發起組織一個團體到南京中央政府溝通去，直接向中央表示對光復的感謝，對蔣主席領導抗戰表示致敬。開始想給這個團體取名「謝恩團」，但又覺得太封建保守，故改名為「光復致敬團」。這一提議得到台籍紳民普遍贊同，各地士紳和民衆都積極支持。但長官公署卻不太贊成，怕代表團到南京去告狀。所幸的是，以李翼中為黨部主任委員的台灣國民黨省黨部相當支持。丘先生本人也是省黨部的執行委員，這樣，就以省黨部為中心來籌劃並組織各地士紳參加「光復致敬團」。說得俏皮些，這是鑽了台灣黨政分歧不睦的空隙。

戴：「光復致敬團」的組織結構是怎麼回事？

林：我是這個團的隨行秘書。但是關於團長的人選卻有一番周折。本來應該是抗日資深、德高望重的林獻堂先生擔任，但長官公署卻不同意，因為林獻堂是不會受人操縱而又有名望，怕越有名望的人，在南京的講話就越有份量，對那些官僚不利。還有陳炳，他

是數一數二的台籍留美的經濟專家，又於光復後號召全台資本公司創辦了大公企業公司，對振興台灣經濟有一番抱負，但大公企業公司受到種種限制未能展開鴻圖外，他本人此次竟不能被承認為正式團員，只能掛財務委員的牌子參加。「光復致敬團」於四六年八月底從台灣出發，經上海到南京。當時正逢蔣主席去廬山，沒有能夠立刻見到。我們到陝西去祭黃帝陵，向祖先報告台灣的光復，以此表示我們台籍人民也是炎黃子孫。但是，當地國民黨軍政方面說那一帶有共產黨活動，不安全，不讓去，結果只能在鄰近的一個縣城遙拜。有的團員不滿地說，共產黨也是炎黃子孫，難道我們從遙遠的新光復的台灣來祭黃帝陵他們會來阻礙我們，會來打我們嗎？

國共內戰如兄弟鬩牆

戴：當時，「光復致敬團」的活動各大報都報導了嗎？

林：有很大規模的報導。記者多人始終跟隨團的活動，全國民衆都會知道。再說致敬團見到蔣主席後，除了感謝和致敬外，直接要求早日設法安定經濟解除民困。又對有關部會要求中央能下令釋放被抓錯的「戰犯」「漢奸」。團員中李建興（台籍礦業巨子）於本團會見內政部長並當時擔任國共和談代表的張厲生時，甚至流眼淚說：國共內戰猶如兄弟鬩牆，台灣經過五十年異族統治而始回到自己祖國，看到同胞兄弟流血相煎，台灣同胞感到非常傷心，希望能夠和平解決，早日共同建立民主富裕强大的新中國。

戴：剛才林先生談到當時台灣黨政分歧，這是個重大的問題，能否更詳細地說明一下。

林：可以說，這是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在台灣延伸。因為陳儀是政學系，李翼中是 CC 派。可以說，掌握長官公署的都是以政學系為核心的人。但黨卻在 CC 派控制之下。

陳儀任用親信獨斷獨行

戴：光復後，竭力想嚐嚐自由甜頭的一般知識分子和士紳特別討厭差別待遇，因為日帝統治了五十年，已嚐上足夠的歧視，所以反對以台灣總督府為模型之長官公署的體制。剛才談到大公企業，我認為當時台灣中產以上階級力量已相當雄厚（比起大陸一般情形），要想自主地發展台灣式資本主義經濟。比如留美的陳焯，在日據時代就想組織公司，但日本人利用法令阻止他。現在光復了，也不能盡量發展辦公司業務，他們當然不滿，轉而反對長官公署及公賣局的存續。話說回來，政學系在國民黨還算是比較開明的。當時沈仲九是陳儀的智囊，一說是陳的母舅，亦一說係妻舅。他留日時編過「浙江潮」，因而與魯迅、許燾裳們有過交往。陳儀與魯迅及許燾裳們有親密關係亦是出於同一緣份。沈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思想，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一直是一個自遠於蔣介石的「怪癖」人物。他要借日本殖民地的模式來建設台灣為模範省，他們整理了日本人留下的五十年間之經濟統計。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搞他的計劃經濟，為了實現他的理想，他想把台灣特殊化，把台灣與大陸的混亂局面割斷，最好是把日本人留下的所有企業、產農當為他計劃經濟之不可或缺的「基礎」，但局勢不饒他，時間亦不與他，終於挫折。他們的這個企圖或許沒被台灣同胞所理解或見容的吧！我想。

林：對陳儀具有要把台灣搞好的誠意是可以肯定的。但他作為一個軍人，習慣用強制的方法來推行其政策，他任用親信，根本排斥當地的民衆士紳，採用不民主且包辦的獨斷專行，比如用惡霸的包可永（時任長官公署工礦處長），就是其中一個。這樣，少數人把持了台灣的命運，根本無視民衆的自治要求，和發展自主性企業之願望。比如，台灣選出第一屆國大代表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也提

出了台灣的自治要求，但報紙不予報導。直到後來台灣民報得到消息資料後才以首頁全面予以披露了。其實，地方自治不是企圖獨立和分離，為什麼要壓？這個界線並不是劃不清的。

台灣中上層人士勾心鬥角

戴：站在當今的觀點來看，有兩個問題很值得注意的：（一）台灣人踴躍參與政治的大多是舊時的文化協會的有關士紳，在日據時代他們就提出建立台灣議會制度，但光復後提出反而被壓制。（二）政學系的開明只是一小部份人，但大部份官僚仍然是跳不出裙帶關係以及貪官污吏的既封建又醜陋的泥沼。

林：陳儀帶來的大部份人並不開明，他們還包圍著陳儀，不讓其明瞭事實真相和局勢的急劇惡化，而導致他判斷的失誤。

戴：台灣的知識份子和士紳大約有如下幾種人，一部份人骨氣不夠，在日據時代向日本人獻媚投機；一部份人被迫參加皇民化運動，心有內疚；一部份人從大陸回來，強調自己的抗日功勞；最後一部份是抗日坐過日本人的牢的良心份子。這四部份人之間分歧內鬥相當厲害。林先生對台灣知識份子和士紳的中上層份子們的分歧有何意見？有這樣一種說法，他們爭著當有關當局的「第一姨太太」，這種情況導致了陳儀和有關權力當局對他們的不齒與不信任。

林：台灣中上層人士互相排斥，勾心鬥角，公署有些幹部就利用這點搞以台制台，結果也成為導致台灣政局不安定及混亂的原因之一。如他們都能像丘念台先生和林獻堂先生們那樣，不為爭官，不為爭錢，不為名和利，一心為台灣民衆效力，陳儀對台灣中上層人士看法大概會有所改變。

戴：現在能否請林先生回憶和介紹一下二·二八事件前後的丘

念台先生？

林：四七年一月初，丘先生由南京去廣東，我自上海直接返台，已發覺到社會情況緊張變異的跡象。關於事變的真正原因，我認爲並非是本省人和外省人鬧對立。問題之爭端，在經濟混亂，就業漸趨困難，接收人員之亂來，橫行霸道。小惡積大形成民怨而終於闖禍。事變當天（廿八日）我住在信義路朋友家，從報紙上看到消息緊張，下午外出到長官公署附近的博愛路的親戚家。在路上看到一個流氓在毆打一個穿卡其布裝軍人模樣的人，旁邊有台籍同胞上前加以制止其暴行，並勸軍裝外省人士趕忙避開。在事變期間，我就聽到許多本省人士保護了外省人士的例子，好比林獻堂保護了嚴家淦（時任長官公署財政處長）就是個典型例子。事變主要是中上層台民士紳要爭民權，爭取政經雙方面的參與權及要求民主自治，而下層人士要爭生存權。

丘念台於事變後趕回台灣

戴：丘先生是何時從廣東回台灣的？

林：事變發生一星期後，國民政府從大陸調大批軍隊到台灣開始鎮壓。其二三日後白崇禧奉命到台灣宣撫，行前致電丘先生，要借重其聲望，協助白解決事變。白崇禧到台第二、三天，丘先生就趕回台灣。丘和白以前沒見過面，直到「光復致敬團」到南京後才見到面的。白很尊敬丘先生。丘到台後就要求白崇禧下令停止殺人和釋放被捕者。丘先生還認爲自己講話不如事變目擊者講話有力量，就要林獻堂和李建興去向白陳情，李甚至還帶老母親去見白，因他老母姓白，一方面可以藉而認親，另一方面亦可藉老太太的身份和面子來爲台民請命，向他陳述台灣人並沒有想脫離祖國獨立的意念，請中央寬待，即日解除戒嚴停止捕殺。數日後丘先生即隨同

白部長前赴南京，直接向南京政府提出種種建議。

戴：丘先生直接解救了多少人？

林：丘先生將王添灯、宋斐如、林連宗等人的名單向陳儀提出，要求查明這些人的下落並加以釋放。

戴：丘先生救出的最有名的人是誰？

林：丘先生間接幫助了林日高、蔣渭川，爲他們作保。其中林日高後來在吳國楨任省主席時期被任用爲省政府委員，但終於似乎因與共產黨的關係問題沒有交代清楚而被槍斃掉。

戴：能否把蔣渭川看成是台籍在台CC派的頭子？

林：有關係，但份量不足當爲頭子的吧。但蔣渭川愛出鋒頭，脾氣有一點暴躁，亂罵人，他利用他老哥蔣渭水的聲望與國民黨拉上線，而組織了「政治建設協會」準備一顯身手。但後來其女被來逮捕他的特工槍殺掉，真是可憐憾事。

陳儀很敬重丘念台

戴：林先生是否直接見到過陳儀？對他的印象如何？

林：我見過陳儀二、三次，都是陪丘先生去見的。我總覺得他有軍人的霸氣派頭。但他對丘先生的態度倒是蠻客氣，很敬重丘先生。

戴：丘先生逝世前，我在東京見到他。我曾經要他老人家給我們留見證，如錄音帶等等，將來可以發表時發表。因爲他告訴過我，以他名義在中華日報出版的「嶺海微颿」，書中很多話不是他說的，或者不是他願意說的，當前不便公開點出來加以匡正。但雖然答應我。但過不多久，他就在日本東京青山謝世，真可惜。不知丘先生有沒有跟你談過，他對二·二八事變之總結一類的話？

林：他對事變的發生及發生後的處理都很痛心。因爲事變終於

演變成本省人反外省人的一種相貌，而解決事變時則變成大陸派來的外省人的軍隊鎮壓台灣籍人士的一種悲劇。丘先生向白崇禧提出，行政上一定要多重用本省人，經濟上要多開放一點，讓台灣中產以上階級積極參與台灣的經濟活動。我還聽說，中央開始沒有立即要撤換陳儀的意思，丘先生則要求白崇禧無論如何要撤換陳長官，改變長官公署制度，實行與大陸同樣的省政府制度。可見，丘先生是真正從台灣同胞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的。至於談到我個人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我認為這次事變(1)是反抗貪官污吏；(2)是反抗經濟壓迫，爭取生存的民衆要求運動的一般表現。

丘自稱台灣派或愛國派

戴：當時，國民黨中流傳著所謂二·二八是共產黨策劃之說，丘先生認為如何？

林：丘先生不認為是共產黨參與策劃的。當時台共的實力還不至於有全面領導或煽動這次事變的力量。謝雪紅插手的台中的局部情況是個例外，當然有個別共產黨員或親共份子參加了事變。至於斯時謝雪紅是否已歸隊共產黨組織，我們都得存疑。就我親眼所見，從當時在台北中山堂的處理委員會的開會情形也可佐證。開會時，只有王添灯講話，大家都是亂哄哄的。要是有意圖之行動，怎會容忍如此散漫或亂七八糟的脫序狀況持續存在。可見，處理委員會主要在企圖代公署來臨時維持治安而已，並要求進行政治體制和經濟情況的改革和改善。他們從來沒有採取行動要直接替代政府，或接管行政權的。

戴：丘先生晚年期待著台灣將向何處去？如何解決省籍矛盾諸問題？

林：丘先生晚年時，我雖已離開秘書職，不過時常會到他家探

望的。但丘先生並沒有詳說。我覺得他內心有矛盾的。仔細看「嶺海微颿」上的文章，許多也並非是他之本意。他一方面有為台灣一般老百姓講話和請命的責任感以及使命感。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說些「官話」。一方面有時又挺固執甚至於頑固，看到什麼講什麼，別人不願或不敢講的，他又會向上面直訴。因此，他所做的事情，得不到多方面人的諒解。他討好不了任何派系。借他自己的話說「我不屬於任何派系，勉強一點說，我係屬於台灣派或是愛國派！」，這話是對他為台灣同胞嘔心瀝血的光彩寫照。

左右派都不諒解他

戴：東京的僑界都是很看重丘先生的，林以德、林以文昆仲和李合珠都一樣對他的為人和作事都是尊敬的。因我也是客家人，當我在林以德或李合珠家看望他時，他用客家話對我說，小鄉弟，你應該好好地為台灣的未來奮鬥，但台灣要搞獨立是註定要失敗的。我有一次非常俏皮地問他，為何台灣不能獨立？他把雙手一攤，你可多看史書就可以明白。我曾要求他與我的談話錄下音，以存留見證。他雖作過允諾，說下一次再來，但終於沒有讓我錄音下來，這是十分遺憾的。他自己也認為，那本出版的傳記「嶺海微颿」並不十分全面。

林：丘先生是一位直爽，說話開門見山的長者，講話從不顧忌。因而也有人說他是共產黨。可見，左右派對他都不諒解。他也孤獨和苦悶。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相信他自己對自己下的評語「我原本是台灣民衆派的代表」係一種衷心所說的真話！

戴：今天承蒙林先生在百忙中為我們談及二·二八事件的往事和丘念台先生的一些軼事，這將是一份很好的歷史資料，再次表示

我衷心的感謝！

一九八七、二、六下午於日本東京立教大學東洋史研究室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七年四月

懷念竹中辛志平校長

——紀念台灣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

撰文／曾重郎

去年，旅居巴西的新竹中學校友羅美鳳先生來武漢參觀旅遊，我以湖北省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和老校友的身份設宴招待了他。羅美鳳校友在新竹中學就讀時比我低年級，他的堂兄羅美孝先生與我同年級。鄉親和校友相聚，話題自然集中於故鄉風物的變遷。當談及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始末、我和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之間的一段生死交情時，羅美鳳校友對每個細節都很知情，這使我很驚訝！詢問其原因，原來羅美鳳校友與辛志平校長有過一段較深的交情，他們常在一起打橋牌，也說些知心話，因此我的這段經歷就成了他的親聞親見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陳儀被委任為台灣行政長官。當時，我是新竹中學四年級（日本制中學的畢業班）的學生，被選為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不久，台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成立，我又被新竹中學、新竹師範、新竹商校、新竹農校、新竹高等女學校（即以後的女中）、新竹家政女學校（以後改名新竹市立中學）等校的代表推為台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總負責人，出席過在台北公會堂（編者按：即現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台灣學生聯盟代表大會，並代表新竹支部發了言。我們積極舉辦國語講習班（當時我們不會講祖國的語言）和祖國歷史展覽，喚起同學的民族自豪感。在日本統治時代，新竹中學的教員大多為日本人，只有一、二位台灣籍教師。新竹中學的英語

教師張棟蘭係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在新竹地區有一定的名望。因此，我和畢業班的另一負責人劉文治同學組織同學簽名請願，要求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委任張棟蘭先生為新竹中學校長，但未被接納。張棟蘭先生旋即被委任為新竹市政府教育科長，後改任新竹市立中學（原家政女學校）校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廳則委派廣東省籍的辛志平先生來擔任新竹中學校長，這是我和辛志平先生的初次結識。他來到新竹中學後，不僅對校內教育很認真，連對學生聯盟召開的演講會也積極參加。他給我的印象是夫子風度，舉止近乎呆板，是一位典型的教育家。

大約在一九四六年初召開的一次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的大會上，各校代表紛紛登台發言抨擊國民黨派來的接收官員腐敗無能，譏諷國民黨官員來台灣名曰接收實為「劫收」，形容貪官污吏為一羣「豬官」。對國民黨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造成的工廠停工、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極為不滿，個別代表甚至慨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比日本的殖民統治還糟糕。看到大家的激憤情緒，我在大會上發了言，贊同大家對貪官污吏的抨擊和對國民黨的失望，但強調對我們貧窮落後的祖國需要我們去改造和建設，我把祖國比作母親，說我們好比是被遺棄多年的孤兒，突然回到母親的身邊，發現自己的母親是一個缺胳膊缺腿的殘廢，我說我們的母親雖然是個殘廢，但畢竟是我們的母親，我們不能因此而嫌棄她。我的發言博得衆多掌聲。辛志平校長參加了這個大會，他聽了我的發言後立即步上講台作了如下的補充。他說，我們的母親並不是殘廢，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偉大祖國，需要用我們的智慧和力量去建設。他的這番話給予我很大的震動和啓發，進一步激發了我的愛國主義覺悟，誘導我跳出狹小的台灣島，擴大視野，更深地去了解自己的祖國。我和辛志平校長沒有建立起私下的交往，但從此以後我們之間的師生關係那種無需用言語表達的互敬互愛的感情建立起來了，平常見

面我都以禮相迎，他則親切地向我點頭微笑。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從新竹中學（四年制）畢業，隨即考入台北高等學校。不久，學制改為初中和高中，我於同年九月返回新竹中學唸高中二年級，仍被推為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當時，國民黨正忙於策動內戰，在台灣的貪官污吏乘機大肆搜刮以飽私囊，導致民怨沸騰，台灣民衆和台灣當局的矛盾一觸即發。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台灣煙酒專賣局緝私警槍殺煙販為導火線暴發的台灣二·二八事件，我是在新竹市參加的。三月一日，當台灣民衆暴動的消息傳來時，新竹市的廣大民衆自清晨起即自發的湧向新竹市政府，但以郭市長為首的貪官污吏早已聞訊逃跑，分別躲進警察局、憲兵隊和郊區兵營。我們青年學生也積極參加了清算貪官污吏的民衆行列。參加暴動的民衆，掃蕩貪官污吏的住宅區（原日本殖民官員住宅區），把清查出來的整箱鈔票和衣物當眾焚燒，羣情激憤，場面壯觀。我們新竹中學的幾位同學來到辛志平校長的宿舍，他的隔壁一棟住者教務主任羅富生（我的新竹中學先輩，客家人），後面一棟住著訓導主任鄭某（名字忘了，大陸籍，是個基督教徒）。當我們走進辛志平校長的會客室時，看到他臉色蒼白，一個人呆坐在那裡，他一改常態，脫掉中山裝，改穿西服，領帶帶向一邊歪斜著，他那驚恐狼狽的模樣，令我同情。我告訴他，我們是清算貪官污吏，你是教育家不必害怕，我們學生可以保護你。他知悉我們的來意，頓時感到放心，隨即叫躲在天篷上面的夫人和七歲的兒子下來。當時他的夫人在新竹女中執教。就在我們和辛志平校長談話的時候，突然槍聲大作，我們都迅速趴在宿舍院內的牆腳下。槍聲過後，從門縫往外看，看到一輛車上的憲兵隊員用機槍掃射暴動的民衆，釀成了新竹市的第一筆血債。這樣一來，暴動的民衆更加被激怒了。因辛志平校長是大陸籍人，激怒的民衆很難分清誰是貪官污吏誰是無辜的教育家。因此，我和幾位同

學商量，決定把辛志平校長一家三口轉至位於新竹中學校園內的學生寮（即學生宿舍）由學生保護。辛志平校長的七歲兒子由我們幾個同學輪流背著，於當天傍晚步行至新竹中學的學生宿舍，住在學校附近住宅區的不少大陸籍教師已先來到學生宿舍避難。我把住在宿舍的學生集中起來，向他們作了交代。我說，辛志平校長和教師是從事教育的，平時並未發現他們有貪污行爲，我們這次暴動是清算國民黨的貪官污吏，他們是教育家，大家要保護他們。隨即我們幾位同學即告別辛志平校長離開了學生宿舍。在暴動中，學生是一支比較有組織的力量，我組織學生進駐市內的各警察派出所維持社會秩序。

二·二八暴動後，台灣各界人士組成了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理委員會，協商草擬與國民黨談判的條件。新竹市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市議會議長張式谷。我以學生代表身份參加委員會爲委員，並參加新竹市的五人代表團出席三月五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委員會，會場秩序混亂，許多人圍在會議桌周圍，有些人甚至站在室內的桌子上大喊亂叫，王添灯先生聲嘶力竭地叫喊著維持秩序，並在此困難情況下草擬與國民黨談判的條件。條件的核心要求是懲治貪官污吏，實現民主自治。我們新竹市的五人代表一行，一是看到會場秩序混亂，二是沒有看見其他市、縣的代表到會（因新竹市離台北市較近，所以我們得以趕去赴會）。因此，第二天我們即返回新竹。我們返回新竹後，立即同新竹中學的老校友商量，擬著手籌組新竹市市長的民選。不料，三月八日風雲突變，國民黨自大陸調來軍隊鎮壓台灣人民的二·二八蜂起。但，我還蒙在鼓裡，對形勢的變化毫無準備。正在此時，林安雄同學急急忙忙來通知我，說國民黨軍隊已在基隆登陸開始鎮壓，辛志平校長顧及我的安全囑我到他家躲藏。當夜，我即去到辛志平校長家，他說，這次暴動你救了我全家，我很感謝你，你現在有危險我應該相助。我

把你看成我的兄弟，你可在此處暫避一個時期。他把我安置在後面一棟鄭主任家裡，鄭主任告訴我，暴動期間牧師的兒子把他全家接至新竹長老教會的教堂保護起來，所以安全地渡過了這次暴動。在國民黨軍隊對台灣人民施行大屠殺的黑暗日子裡，我就在辛志平校長和鄭主任的保護下躲過了殺身之禍。大屠殺過後，我仍被通緝，因此在辛志平校長和鄭主任的幫助下，扮成小商販，藉著新竹中學復課的那一天清晨離開了新竹。鄭主任親自把我送至車站，南來北上的火車進站，許多來上學的校友從列車尾部的車廂下車，我則踏上靠近車頭的車廂，當火車徐徐開動時我目送著鄭主任和同學的背影離開了故鄉。我在台北二哥家住了個把月。在此期間，國民黨暫時放下屠刀改取懷柔政策。台灣形勢重新趨於穩定。據此，辛志平校長特地派鄭主任來台北叫我回校讀書，鄭主任爲找到我二哥家連腳都磨起了泡，實在令我感動。在他的催促下，我自台北回到新竹中學繼續我的學業。當我出現在班上時，同學們都用驚奇的目光望著我，同學們既驚又喜，他們給我開玩笑說，我們以爲你已經不在人世了。但好景不常，國民黨駐新竹市的憲兵隊即傳訊扣押我，傳訊中我堅持說，我只參加了清算貪官污吏的活動，並未殃及無辜。辛志平校長出面力保，因此憲兵隊即把我釋放了。

由於新竹市已成了我是非之地，加之我的父母和大哥二哥均已移居台北，因此我於一九四七年八月經插班考試，轉入台北師範學院附中高三學習，是該校的第一屆高中畢業生。一九四八年八月，我同時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和台灣大學經濟系。當時，祖國的解放戰爭正進入決定性階段，我爲了尋求光明和真理，爲了探尋我尚未完全認識的地大物博的祖國，我沒有聽從家人的勸阻毅然來到北京清華大學學習。

今年，在湖北省副省長梁淑芬宴請海外專家學者的宴會上，我與新竹中學校友段世堯（福州人，陳若曦女士的丈夫）、張世嘉及

台北師大附中校友花俊雄等先生同桌，席間又談及辛志平校長的爲人大爲讚許，他們說辛志平校長謝絕一切高官厚祿，擔任新竹中學校長直至退休，培養了衆多的人才。去年，羅美鳳校友告訴我，辛志平校長的夫人已去世，但辛校長還健在，兒子在美國，當時，我曾托羅美鳳校友轉達我對辛志平校長的問候。但是，今年我又從段世堯、張世嘉校友處聽說，辛志平校長爲了勸止在美國從事台獨活動的某些新竹中學校友，長途跋涉親赴美國，因勞累過度患了腦溢血症，不治身亡。我聽了之後，深感悵然，因此特別遵照諸位校友的囑咐，草此短文，一方面略述二·二八事件中我親身的經歷，一方面聊表悼念，並永誌我與辛校長終生難忘的情誼。

草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夜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七年三月號

L 氏的回憶： 二月事件中的台中市

撰文／葉芸芸

我的父親是台中縣霧峯萬斗六人。

父親青年的時代就參加〈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曾被日本人逮捕過三、四次，關了好幾年。本來父親也是個有五、六甲田的小地主，種稻子和香蕉，參加農民運動花掉不少錢，主要卻還是受日本的打擊，家境愈來愈困難，後來破產了，只好到一家肥料公司當小職員。日本人都是先拉攏肯妥協的，就給你一點小甜頭，堅持的，就對付你。到了 30 年代初期，我們家裡生活很苦，所以我小學畢業，也沒有辦法繼續唸中學，到台中青果組合，也就是香蕉收購站去當臨時工人，後來換到小學當辦事員，又去唸師範學校的培訓班，才當上小學的教員。

父親和鬥士們

父親是很有民族氣節的人，我從小就知道日本警察特務叫“臭狗仔”。記得我 7~8 歲時，有一次晚上警察和特務來抄家，我害怕抱著母親哭，父親對我大喝：「不驚臭狗仔，不哭。」到現在我印象還非常深刻。家裡客人很多，很熱鬧，出入的都是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的同志，我還記得簡吉、溫勝萬。最常來吃飯、過夜，人

們都稱呼他們“鬥士”。有時候父親到台中開會，也帶我一起去。日據時代，父親這種人都屬於思想犯，家裡常常有日本特務監視，小孩子常在門口玩，看到警察特務來，就大聲叫“警察來了”或“臭狗仔來了”。

經過 30 年代的大鎮壓，到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人發動侵華戰爭，父親一直堅持著與日本人抗爭，二次大戰的幾年間，日本人大搞皇民化運動，在殖民地徵兵，募捐支援大東亞戰爭，父親每次都發動抵制運動。1944~45 年時，他又參加反戰的“蕉土會”，與楊貴、謝雪紅、葉陶等前輩常在一起來往比較密切。

我的生母很早就去世，記得是我十歲的時候。父親再婚的繼母也在 1946 年病故。

我在 1943 年時，就開始偷偷學北京話，是跟一位叫曹一波的東北人。我的思想進步，除了父親的影響，還有謝雪紅和楊貴的影響也很深。戰後那段時間，我常在謝雪紅那裡出入，認識很多年輕進步的朋友，我們年輕一輩的都稱她“奧巴桑”。她常提及自己的身世，怎麼參加革命，為勞動人民做事情，怎麼到莫斯科大學留學，後來回台灣參加組織台灣共產黨，與日本人抗爭的經歷。我非常感動，總是想，一個婦女能夠那麼堅強和日本人抗爭，真了不起。

1946 年的秋天，得到父親和楊貴、謝雪紅、楊克煌幾位前輩的支持，我一個人跑到大陸來，想要到解放區參加革命。我到上海來，住在同鄉會長李偉光先生這兒，他是二林事件（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和父親是老同志了。當時，國民黨打開內戰，向蘇北重點進攻，我在上海等了一個多月，因交通中斷，去不了蘇北解放區，才再回台灣。

在上海的時候，李偉光和謝雪堂（台南人）兩位先生不僅在生活上幫助我，啟發我的思想。我還記得，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日，

謝雪堂先生帶我到萬國公墓的魯迅墓上，還有一次，他帶我去參加陶行之先生的追悼會，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是在震旦大學。我還記得我們坐在右邊第三排，首先是學生代表的悼辭，非常令人感動。第二個講話的是國民黨的代表，再來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我聽了嚇一大跳，那是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看到共產黨代表，非常激動，當時坐都坐不住了，謝先生按著我說“沉著一點”。

謝雪紅和「人民協會」

戰後，謝雪紅和楊克煌籌組織「人民協會」，1945 年 10 月 5 日在台中大華酒家正式成立。楊貴原先也參加了籌備，因為和謝雪紅不合而未參加成立。謝雪紅是實際上掌權的人，林兌出面任委員長，中央委員有謝雪紅、楊克煌、李喬松和謝富等人。

那段時候，謝雪紅在台中市很活躍，戰後她接收了一家日本人的「日出酒家」，她的弟弟謝振南經營「大華酒家」。楊克煌辦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報叫『台灣人民報』。

「人民協會」在 1946 年 1 月份，就被陳儀下令解散了，此後謝雪紅就在尋找共產黨的組織連繫。1946 年的春天，蔡孝乾回到台灣來建立地下黨組織，在此之前，1945 年 10 月上海地下黨就派過『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去過一趟台灣，和老台共應該都有過接觸，詳細情形我不太清楚。不過據我所知，老台共沒有在那時候入黨的，謝雪紅也是 1948 年在香港才正式入黨的。雪紅和孝乾從前在老台共時代就有分歧，這兩個人很難合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從「市民大會」開始的

1946 年 11 月，我從上海回台灣，那時候台灣人民已經對國民

黨非常不滿，一年前才熱烈歡迎來的祖國政府，竟然是那麼的腐敗，大家的失望簡直到了極點。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天，我正好出差到清水，事件鬧起來，交通中斷了回不來。後來才聽父親說台中市的情況，台北發生事情以後，台中市民憤慨起來，但羣龍無首，只會在街頭表示不滿，謝雪紅、克煌、謝富和父親商量要開「市民大會」，羣衆一聽開大會，台中座（即台中戲院）馬上就擠滿了人。大會上由雪紅、克煌等人先報告台北槍殺案件，討論怎麼去響應、聲援台北，結果呢？會開到一半，羣衆已經不耐煩了，有人喊著「不必再說了，大家走，行動吧！」就是這樣，羣衆分了兩路人馬去包圍縣政府和警察局，台中市就是這麼開始的。

當時，亂糟糟的，羣衆自發性地，一幫人一幫人就組織成戰鬥隊伍，大部份是曾被日本人徵召去當兵的，回來後大半都失業的青年和學生。二七部隊戰鬥的情況，要問周明才清楚，他是二七部隊的副隊長，但他也不是從開始就參加的，他是後來晚幾天才由台北回台中來加入的。隊長是鍾逸人，台中一中畢業的，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人。周明和何集准（到大陸後改名何建人）則是台中商業的同學。

台中師範學生的武裝部隊最先受吳振武掌握，他是師範學校的體育教官，台中市的人迷信他，因為他當過日本海軍，會打槍，日本戰敗了，才由海南島回來，退伍時日本人把他升為海軍大佐（即中尉），台灣人當日本兵，還沒有這麼高的軍階，所以大家都以為他了不得。

我從清水回到台中，趕到「指揮部」去找謝雪紅，「指揮部」是設在日據時代的「工商會議所」，看到雪紅和克煌忙得不得了，講話聲音都沙啞的，我一見面就向他們要求參加二七部隊。雪紅對我說「自己去組織」，所以我就去找平常有連繫影響的青年學生，

組織起來。

以後各界人士組織「處理委員會」，雪紅也參加了，武裝部隊受吳振武控制，謝雪紅也指揮不了。開始時，攻下兵營還拿到一些武器放在「指揮本部」。「處委會」成立以後，不一樣的意見就多了，而且，台中地方上的人都認為謝雪紅是「赤色份子」，她就更是捉不到指揮權了。她能夠控制的大概只有二七部隊。但是，當時這種民衆自發組織的戰鬥部隊，都很鬆散，沒有什麼紀律和約束，本來是羣衆自己找來的，後來人不來了，也沒有辦法啊！

地下黨是想要組織起來，但要領導這些自發的羣衆，只有透過像雪紅、楊貴或我父親這些平常就有羣衆基礎的人物才有可能。畢竟當時地下黨的力量還不夠，而且那時候一片混亂，我看是誰也指揮不了誰的局面。我並不知道蔡孝乾來找謝雪紅要求支援台北武裝的事情。

埔里戰役

三月八日，國民黨援軍上岸的消息傳來，台中市就人心惶惶，大部份組織都散了，大家逃亡，躲起來，只有二七部隊撤退到埔里，決心要繼續戰鬥。二七部隊轉移後，我接到地下黨的命令，要我通知所有可能動員的人，到埔里加入二七部隊。我通知完了，自己才連夜走走跑跑趕去，台中到埔里有 60 公里，那時交通已斷沒有車子。到了埔里沒有見到雪紅，只見到克煌，他叫我馬上回頭，回台中去籌軍用資金，於是我沒有停留就趕回台中，只走到草屯就碰到國民黨的軍隊了，以後埔里打起來就進不去了。所以，自己並沒有參加二七部隊的戰鬥。但是，我通知動員去的那些青年學生，在埔里鎮外烏牛蘭的戰鬥中都很勇敢，後來抵抗不住國民黨的大軍，又找不到領導，很多人就從霧社北山路跑到東勢角轉到豐原退

出來。

我不知謝雪紅和楊克煌是怎麼離開埔里的？聽說，後來大家就找不到他們兩個，沒有人看到他們。本來，二七部隊撤到埔里以後，台中地區就謠言四起，都說這個部隊是「紅的」，所以地方上的人都很害怕，到了埔里後，據說謝雪紅也曾到霧社高山族去宣傳發動，但成效不大。

「自新」和「清鄉」

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號召台灣人去「自新」，公佈了一套「自新」辦法，連日據時代有政治犯前科的全要去登記，也不管有沒有參加二二八事件。我趕緊去找那些到過埔里的青年學生，勸說他們千萬不要去自新，一去就被卡住，關起來了，國民黨全是騙人的。也是這樣，我才從他們那兒瞭解到二七部隊在埔里戰鬥的情況。

接著，國民黨開始「清鄉」，到處在逮捕人，跟二·二八無關的，也有被捉的。父親和我，很多朋友都是跑到鄉下親戚朋友處去躲起來。事件當中，父親和雪紅他們都是枱面上的人，目標很大，要捉他們的風聲很緊，本來父親準備和雪紅他們一起走的，但時間來不及，他趕到左營的時候，他們所搭的軍艦已經開走了，周明和他們一起走的。

五月中，我送父親到基隆，當時仍然查的很緊，還是沒走成，到了七月，我才把父親送到上海，到他的老同志李偉光先生那兒，我自己又回台灣去。

父親在上海住了一段時候，又想回台灣，大家都勸他說「你是黑名單上的人，被捉到的話，一定被槍斃的」。他卻堅持說是要想為革命為大眾做一點有益的事情，就不能考慮太多自己。父親在

1947年的12月回到台灣，我接到通知要去基隆接人，到了碼頭一看，竟然是父親回來了。這以後，我有我的工作，父親也做他的工作，都是到處跑來跑去，偶然才會碰在一起。

1948年我終於必需離開台灣。先到香港待了四個月，就和雪紅、克煌、蘇新住在一個地方，蘇老我是那時候才認識的。那時，我等待著安排去解放區，沒有參與雪紅他們在香港的工作，全然不知道潘欽信、蕭來福和廖文毅合作的事情。1949年初的時候，我去了山東煙台，後來南下再到上海，才和父親重聚，父親是1949年5月份由妹婿送他出來的。從此，我們一家分隔兩地，四十年無法團聚，尤其是在台灣的妹妹和弟弟，因為父親和我的牽連，他們長期吃了很多苦。妹妹無端被關了八年，三個年幼的外甥沒有人扶養，逼得走頭無路的慘境，一個弟弟因受不了那種恐怖折磨而精神失常。妹妹出獄後在極端困苦中，把離散的子女領回扶養成人。

後記：

L氏是現年68歲，目前住在上海市的一位台灣同鄉。我是1988年11月4日訪問他的，本文係根據當天訪問錄音整理成。因台灣親人長期受到政治迫害，L氏十分憂慮本文的發表，會使家鄉親人再遭遇麻煩，本文尊重他苦衷與心情，乃隱去姓名。

二·二八在台南

撰文／陳開元

各位鄉親、各位朋友：

我叫陳開元，台南縣人，今年六十多歲了。從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起我就一直住在台南市內，是一介普通的台南市民。我們這一代人飽受了日本統治者的欺負、壓榨，知道當亡國奴是什麼滋味。因此台灣光復，國民黨軍隊來接管，台南市民欣喜若狂，指望從此可以昂起頭來當中國人，過上太平日子。誰曾想到祖國「唐山」來的黨政軍官員，把台灣當作戰利品，把台灣人當作「二等國民」，國民黨來接收的大小官員，貪污「歪膏」，把台灣南部的文化古城台南市也搞得烏煙瘴氣，物價一日三漲。加上國民黨不顧台灣人民的死活，把大批大米調去打內戰，造成米價暴漲，民不聊生。二·二八前夕，民衆對國民黨暴政的憤怒，已達到忍無可忍的程度。台南市如全島各地一樣，人心思變到一觸即發的地步。

和平遊行

二月下旬我正在台北，因此親眼看到二月廿八日台北市民罷市、罷課、請願以至暴發那場風暴的情景。三月一日我即趕回台南，當時火車已經不能全線通車。我二日下午才回到台南，馬上去找一位朋友，正碰上幾個人在他家商量第二天（三日）參加市民大會之事。他們已經從報紙的號外和廣播中知道台北發生事件的大體情況，但對具體情況並不了解。我把二十七日晚上以及二十八日台

162 ·

北所發生的情形向他們作了介紹，最後決定在三日的市民大會上提出兩項建議：一是支持台北市民，要求懲辦凶手、改革省政；二是組織一次集會遊行。這兩項建議在會上都被採納了。

根據當時市民大會的決定，三月四日早上起各區市民、各校學生三三、五五開始向西門市場前集中，到十時左右已達二、三千人，先後有幾位學生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接著民衆自行排隊，青年、學生乘卡車在前頭，秩序井然地從西門町、錦町至銀座進行示威遊行。遊行隊伍沿途喊口號：「要求生活的保障」、「反對內戰」、「打倒貪官污吏」、「要求台灣自治」，隊伍所經過的馬路兩邊人山人海，招手歡呼。憲兵和警察照樣地在街上巡邏，並不干涉。這是一次和平的遊行示威。爲了防止國民黨警察鎮壓羣衆，下午參加遊行的青年學生分爲幾個小分隊，分別到各警察派出所、警察隊繳了他們的槍隻彈藥。我跟一位陳兄到小西門城外去組織郊區農民。陳兄是過去的農民組成員。在郊區農民中很有威望，當天就組織了五十多位農村青年待命進城。

學生與「處委會」

在這次二·二八事件中有兩方面的力量影響著台南市民的行動。一方面是以在校學生爲主力包括台南二中畢業生和南方歸來的青年。他們有組織，行動有計劃，有戰鬥力。他們帶頭張貼標語，組織遊行、收繳槍械、支持外地鬥爭……另一方面是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裏面有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社會名流和各界代表（學生也有代表參加但不能起主導作用）。主要是那些士紳在處理委員會中起著主導作用。他們主要是聽從台北處理委員會和當局廣播講話行事。

如：台北處理委員會三月四日發出通知要求各縣市緊急成立

「處理委員會縣市分會」，台南市的處理委員會是接到通知後才在五日晚上開會成立的。

台南市從三月三日參加議會邀集各界代表舉行市民大會起，至十一日中午起從高雄開來大批軍隊實行鎮壓爲止，在這九天中，除三日上午在運河邊一隻福建開來的武裝走私帆船向羣衆開槍，憤怒的羣衆把船燒掉外，沒有發生過戰鬥。不僅沒有出現亂打外省人的情況，而且他們都受到保護。如專賣司台南分局局長是清廉，的局裏的台籍職員主動很好地保護了他的眷屬。台南鹽業局局長也同樣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國民黨的市長照常辦公，也沒有人去防礙他。台南市秩序井然，可以說基本上是和平的、合法的鬥爭。就是這樣，大批的國民黨軍還是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湯德章之死

三月十一日由高雄開來的國民黨軍一到台南，就立即下令戒嚴，展開瘋狂的捕殺。首先被槍殺的是經由各界人士選舉出來的市長候選人之一的湯德章。三月十二日中午湯德章被五花大綁押上卡車遊街示衆。從本町向大正公園開來。正從我家門前經過，我就跟著後面去看了，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敢出去看的人並不多。湯德章雖然被五花大綁，背上插著牌子，但他面不改色昂首怒視著劊子手下下車之後劊子手要他跪下，但他不但不屈服還破口大罵蔣賊軍。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種公開槍殺人的，印象特別深刻。

湯德章是在日本統治時期靠自學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因爲他是台灣人，所以不能當行政官員或法官，只有當律師。因爲他是窮苦人出身，當律師後肯幫平民老百姓打官司，所以受到國民黨官員及御用士紳的注意。他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中只當了一個治安組長，雖然被推選爲市長候選人，他只有 105 票，是三個候選

人中最少的一個，但他却在台南市第一個被槍殺了。

接著莊孟侯也被捕了。莊孟侯是台南市三青團的主任，被推選爲台南市處理委員會的副主任，莊孟侯是個醫生，青年時代就參加反日進步運動，曾是文化協會台南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台南市頗有名望。據說他的被捕是韓石泉等人告的狀，說台南這次事件是他煽動的。莊孟侯被捕後，他的五弟庄孟倫不服，曾跑到南京控告韓石泉等人的誣告罪，但無結果，後經多方營救，莊孟侯被關五個多月總算放出來了，但由於押解期間被折磨的很厲害，出來後不久即去世。

台南市自從實施戒嚴後，以搜捕「暴徒」收繳武器爲名，進行清鄉，到處搜捕，瘋狂射殺。連續幾天槍聲不斷，多少無辜死於槍口之下，在這一片恐怖聲中，有一批志士被迫轉入山中繼續鬥爭。聽說後來大部分志士也都犧牲了。國民黨就是用這樣的殘暴行動使台灣人民進一步認識它那種虛偽、好殺、獨裁的本性的。

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四十年了，但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治的二·二八精神永遠活在台灣人民心中，它將繼續激勵台灣人民爭取祖國統一和台灣高度自治而奮鬥。願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台灣同胞的英靈能早日得到安慰！

本文發表於「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紐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部

見證篇



二·二八事變見聞記

撰文／周夢江

一、永世難忘的台北暴動

四 十多年過去了，一九四七年的台灣「二·二八」暴動場面，是我永世難忘的。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外日報》的一些編輯、校對聚在編輯部裡談論昨天傍晚緝私人員毆打紙煙小販、開槍打死羣眾的事。有的說：「昨夜羣眾包圍警察局、專賣局，要求懲辦兇手」。有的說：「情況會惡化，一些學校、工廠、商店已經開始罷課、罷工、罷市了」。這時遠處大街上傳來陣陣的吶喊聲。忽然，排字房中的工人打著旗子，叫著「罷工、罷工」，向大門蜂湧而去。隨後社長鄭文蔚趕來了，他處理了一些事務後，對我說：「陳陣（採訪主任，福州人）病了，沒有適當的人，請你代勞一下，到市參議會採訪些新聞」。

我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到台灣，先在台中《和平日報》任編輯主任。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因《新知識》（註1）月刊被查禁，我受台中市政府注意，被迫辭職離開，由友人陳本江介紹認識《中外日報》（註2）董事長林宗賢。林宗賢當面聘我為採訪主任，社長鄭文蔚不同意，改任編輯，開始編國內新聞。過了幾天，負責本地新聞。因在新聞的選用上與鄭文蔚、陳陣意見不一致，這幾天剛調編副刊社會版。雖只短短一個月，卻調了三次工作。這時鄭文蔚要我去，不知是何用意，而我自己也想去看看，便答應下來。

吃過午飯，我匆匆趕到市參議會。整個會場熱氣騰騰情緒激昂，議員們有的面紅耳赤，大聲的斥責台灣當局的腐敗；有的則顯得疲倦。聽說自上午開會到今，午飯也未吃。我找到一個座位剛剛坐下，聽到一個議員提議「我們應該集體向陳儀長官請願！」話也未說完，滿場就響起掌聲，提案通過了，議員們紛紛湧向門口，我也快步跟隨，搭上一部汽車，向長官公署疾馳而去。

台灣行政長官（即省長，大陸上稱省主席）公署，原是日據時代的總督府，是座堡壘式的府邸，裡面自有專用水電設備，即使被包圍，也可以支持一、二個月。公署門前是個廣場，平時經過這裡，覺得它空空蕩蕩，這時密密麻麻的擠滿了人，真是水洩不通。羣衆看到議員的汽車，讓出一條路，使汽車開到公署裡去，可是公署大鐵門卻緊緊關閉著。當我在車內還未下來，一陣密集的槍聲響了，子彈從天空呼嘯而下，嚇得我在車內不敢抬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槍聲停了，滿地都是羣衆逃命時留下的自行車。事後知道長官公署屋頂上架著的重機槍向羣衆掃射，當場打死三人，傷數十人。

我恍恍惚惚回到大街上，心也還未定下，便被一羣台北市市民扭住了。由於陳儀帶來的一些公務人員，平日作威作福，欺壓羣衆，所以當時台灣同胞對大陸來的人有誤會，稱之爲「阿山」（其意大約和外國人稱華僑爲唐山人相似）。而大陸人員的服裝與本地人服裝有區別，所以這批人一眼就認出我是從大陸來的。幸喜我這時外衣掛著報社證章，口袋帶有名片，便向他們解釋：我是記者，爲了採訪新聞，剛才也險些送了命。他們相信了，還有一位台灣同胞自願護送我回報社。最近聽說當時《中外日報》記者詹致遠（現名吳克泰）、周傳枝（周青）寫了緝私人員打傷煙販的新聞，只有《中外日報》在印刷工人的壓力下獨家刊載，因此該報在台北人民心中有好印象。可能因此使我能夠回到報社。

路上的情況是相當恐怖的：一批批憤怒的羣衆搗毀了商店（都是官僚資本開設的大商店），將裏面財物搬出來，放在街心當場焚燒；也有一些人毆打、追趕大陸來的公務人員。大概是護送我的人怕走大街不安全，我們兩人轉入小巷，可能這裡正是機關人員住宅，我也同樣看到許多財物放在路中焚燒，滿巷都是哭聲。於是兩人又回到大街。街邊的廣播喇叭高叫著：羣衆在台北中山公園召開市民大會，作出決議，號召全省人民起來，爲死難同胞復仇！

我回到編輯部，向同事們敘述了自己的遭遇見聞。稍後，鄭文蔚也來了，他家也遭到搗毀。這時同事們都恐慌起來，因爲我們都是大陸來的，台灣同胞對大陸人既有誤會，對我們也會仇視。於是大家向鄭文蔚提出意見，設法保護人身安全。當即吃了晚飯，在總編輯唐元豫帶領下，我們二十多人住到新聞處去。我又隨著同事再到長官公署旁邊一座房子裡，和大家一起躲了兩天兩夜。因爲都未帶被子，穿的又是單衣，晚上相當冷，無法之中，只好將新聞處裡的舊報紙充當被褥，睡在公事桌上，幸喜大家都是二、三十歲的人，沒有人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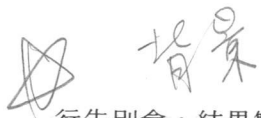
二、暴動的社會經濟背景

從一九四六年三月到台灣算起，這時整整一年，台灣同胞的態度起了一個 180 度的轉變。那時距離日本投降，台灣歸還祖國的日子還近，我在台中聽到許多愛國的事：

台中市許多知識份子，打開祖先的神廚，焚香禮拜，真是陸游的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火車上，台胞不約而不同的不講日語，如果有人偶然說了一句，便會受到周圍羣衆的批評。

據說：駐台日軍某部在投降後，企圖與台籍軍官聯絡感情，舉



行告別會，結果雙方軍官拔槍相對，不歡而散。

台胞從整整五十年的異族統治下回到祖國懷抱，其愛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以陳儀為首的各級官員卻辜負了台胞的期望。這些官員包括他們的子女，大多數熱中於“五子登科”（註3），卻不正經的去管理工廠礦山，資金飽入私囊，器材盜賣，工廠關門，礦山停產，廣大工人紛紛失業。農村中捐稅繁重，日本人離開了，而日人時代的一切苛捐雜稅都仍保留，而且還增加了新捐稅。台灣是一年三季出產大米的地方，這時有些地方竟鬧米荒。最近我搜集到幾篇自己當時寄給上海“文匯報”發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以“鳳炎”筆名刊於該報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第五版，題為《台灣最近物價的漲風》。文章說：「首先領導物價上漲的物品是食米。台灣本是一個餘糧的區域，可是在軍糧無限制的輸出和田賦徵實下，來源枯竭了。於是食米的價格便一路高升，從一月份每斤台幣十三元五角，漲到二十六元，最近（二月份）更飛漲到三十六元左右。這種破天荒的米價，當然會引起社會的不安……實行「米價最高辦法」後，各地均發生無市無價的現象。居住在此間（台北）的人，竟亦有三、四天買不到米了。米貴的原因……主要是一些投機家的播弄，如果將這個罪名加在米商頭上，那未免是太冤枉了。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土地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加之在田賦徵實以來，大部分的米糧是歸於政府，如果政府能夠大量的拋售平價米，那麼米價是不難抑平的。……因此，我們也可猜測到這次米價波動的幕後操縱者，到底是那些人物」。

文章還談到，台灣一九四七年二月的物價，據官方統計，比較去年11月的物價，平均漲了一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法幣無限制出籠，陳儀在台灣搞了一個獨立的台幣金融系統，規定台幣一元兌換法幣三十五元，企圖避開法幣的通貨膨脹。可是由於陳儀部下的無能、腐敗，工業蕭條，財政赤字全靠台幣發行來彌補，因此台灣

的通貨膨脹比大陸上還厲害。台幣對法幣的黑市匯率，從一比三十五，降到一比二十八，有一度竟跌至一比十八。官方規定的兌換率亦只好降為一比二十四。

我這篇文章是二月中旬寫的，這也可以看作二·二八事變的社會經濟背景。

隨著台北人民的暴動，基隆、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花蓮港等地人民都先後起來了。台北是省會，又是這次暴動的首先發難的地方。台灣省、台北市參議會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下簡稱「處委會」），成為領導人民起義的機構。

寫到這裡，讀者一定會問：為甚麼1945年8月台灣人民歡迎國民黨政府，而1947年2月卻反對國民黨政府？這實際是一事的两面：一、當時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主權的政府，作為代表中華民族的政府，淪陷五十年的台灣同胞自然會歡迎他的。二、國民黨政府包括台灣當局是反人民利益的政府，他對人民的壓迫剝削最終必然會招致台灣人民的反對。這情況不僅台灣如此，東北、華北淪陷區也是如此。開始，東北、華北淪陷區人民歡迎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不久就起來反對。他們說：「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竟遭殃」。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不到五個年頭，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就被人民推翻了。這裡，有兩個問題必須分清：前一個問題是主權問題和民族問題。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台灣人民是中國人民的骨肉同胞。後一個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一個反人民利益的政府必會遭到本國人民的反對，這是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的。如果當時的陳儀政府能夠照顧到台灣人民的利益，那麼，二·二八事變是不會發生的。今天，有少數人將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認為台灣可以離開中國，這是錯誤的。他們忘了自己祖先，是福建廣東一帶沿海人民的後人，是鄭成功及其部屬的子孫。同時應

該補充講一句，台北處委會和台中謝雪紅之反對陳儀，實際上是反對貪官污吏，而謝雪紅則和中國共產黨早有聯繫。

三、別了！台灣。

我在新聞處住了兩天，白天也到附近去看看。長官公署已成兵營，屋頂牆邊架著機槍，但軍警都不敢出來。街上很平靜，只有一些學生模樣的青年在維持秩序（以後聽說這些青年被國民黨成批屠殺了）。因為局面稍為穩定，我們又回到編輯部，林宗賢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僱了十幾個人坐在大門口，鄭文蔚也偶有露面。一天下午，大約是三月二、三日的下午，鄭召開編輯會議，聲稱要恢復出報，要大力支持陳儀。鄭文蔚是浙江台州人，曾一度任設在杭州的《東南日報》採訪主任。陳儀是浙江紹興人，不知憑甚麼關係，鄭這時是長官公署參議。過了幾年，陳儀任浙江省主席時，鄭文蔚任江山縣長。這是後話。因為編輯部人員除了幾個台籍記者外，都是鄭文蔚邀來的（有的是間接邀來），只有我雖是浙江溫州人，卻直接受聘於林宗賢。鄭文蔚認為編輯部都是他的人馬，他的意圖的實現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會議一開始，他的提議沒有人附議，也沒有人反對。因為這些編輯思想上大多傾向進步，其中有幾人，在解放後知道他們是地下中共黨員和民盟盟員。他們知道支持陳儀就是反對人民，特別是台灣人民會馬上來搗毀報社，人身安全無法保障。因此不敢附議。可是反對呢？礙著鄭文蔚的情面，也不想講。這樣，大家沉默著。這時，我究竟年輕忍耐不住，我說：「如果台灣人來打報社，怎麼辦？」這問題是和尙頭上的蟲子，明擺著的。我一挑明，大家紛紛附議。鄭文蔚的確無法保障大家的安全。他見達不到目的，便憤然作色說：「我以後不管報社了」。以後就未見他露面。

大約在當天或第二天晚上，我接到陳本江的電話。陳本江是台北人，當時約莫三十多歲，為人嚴肅，聽說曾在北京某大學教過書，但不知專業是什麼？當時住在台北，並無家眷，我曾在其寓所住過一夜，其住處極其簡陋。我是在謝雪紅家中認識的，這時任《中外日報》參事。前年聽說早已在台灣犧牲了。他在電話中告訴我：「林宗賢已參加台北處委會，他派蘇新於明日到編輯部，希望你協助他出報」。蘇新和我本來認識，但不熟。他來後，兩人合編一張八開的《中外日報》臨時版。報上登載的大多是台北處委會消息，如《處理二·二八事件大綱三十條》，處委會公告，宣傳部長王添灯的講話等。這時，陳儀因為台灣國民黨兵力有限，正使用緩兵之計，等待大陸的國民黨軍隊到達，所以口頭上對處委會讓步。而處委會成員卻誤信為真，反而要求羣眾靜候處理。局勢似乎更穩定了。蘇新與我商量，打算恢復對開報，想請原編輯部人員合作，他們也同意。《中外日報》編輯人員雖全部是鄭文蔚聘用的，但具體來路不詳，其中也有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當時接觸中，彼此也意見相投，因而他們都積極幫忙，後來還通知我們離開。

三月九日，這天整個台北到處聽到槍聲，南京國民黨軍隊到達，開始鎮壓羣眾了。我和蘇新剛起床在吃午飯（編報是夜裡工作的），總校對李岩楓（聽說他當時是民盟盟員，現在北京）匆匆跑來對我說：「鄭文蔚帶軍隊要來捉你們了」。我慌忙收拾幾件衣服，便和蘇新離開編輯部。因為蘇新這時還不會講普通話，平時兩人是筆談的，他寫字告訴我將去香港，我則告訴他回上海。兩人緊握一握手，就分開了。一直到1950年才在上海見面。

當我走到大街上，走幾步，就看到一個一個青年的屍體倒在路邊。我先躲在友人樓憲（尹庚）的家中，以後又到法商學院宿舍住了兩天。這時特務四處捉人，我覺得應該早點離開台灣，便到了基隆，住在一位女同鄉家中。

我數次到基隆港口查問回溫州的船隻。這裡回鄉人很多，平時是有商船直達的，可是詢問的結果是：台灣當局這幾天不准船隻出港。基隆港口平日人煙稠密，船隻衆多，可是這時海邊卻少有人行走，渾濁的海水時時泛出屍體，聽說國民黨軍隊登陸時，這裡曾發生一場血戰，看來這情況是確實的。

一天，我在碼頭看到台灣輪船公司的公告，一艘海字號輪船首航上海。但規定要先登記，每人交相片兩張，然後才可買票。我如果拿自己相片去登記，無異是自投羅網。在朋友的幫忙下，兩位泉州籍的老同學替我設法買到一張票；《中外日報》同事、少年同學李士俊本要離開台灣，因樓憲留他在基隆工作，暫時不走，也將船票送給我。總算還幸運，上船時，碼頭軍警林立，檢查旅客很嚴格，到底還給我過了關，坐船回到上海。這樣，我離開了台灣。

時間沖淡了記憶，但是台北二·二八事變的情景，使我永世難忘。

【註解】

註1：〈新知識〉月刊，台中市中央書局發行，8/15/46 創刊。王思翔、周夢江、樓憲主編。

註2：〈中外日報〉係參政員林宗賢創辦，社長鄭文蔚。2/1/47 創刊，二·二八事件期間由蘇新接辦，一星期間每日出報。事件後受查封，林宗賢被逮捕，與〈和平日報〉社長李上根同囚一室，根據李上根言，林家花了一大筆錢，才將他保釋出來。

註3：指國民黨官員接受金子、票子、女子、房子、條子，當時稱爲“五子登科”

【作者簡介】

周夢江本名周大川，一九二二年生，浙江平陽人，溫州師範學校畢業，後再到福建讀書，一九四三～四五年間，在福建南平、福安〈南方日報〉任記者、編輯。一九四六年三月到台灣，任台中〈和平日報〉編輯主任，兼台中高級商業學校教師。一九四七年二月任台北〈中外日報〉編輯，同年三月回到上海，任杭州〈當代日報〉記者，一九四八年任溫州〈中國民報〉副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九月後長期在溫州任中學歷史教師。一九七六年任教溫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參加〈漢語大詞典〉編輯，一九八二年退休。目前承擔浙江省社會科學重點課題〈葉適與永嘉學派研究〉，近年發表〈簡論南宋時期永嘉學派〉〈宋代兩浙海外貿易〉等五十多篇論文，並校註宋人陳傅良〈止齋文集〉。

二·二八縱橫談

——一個外省人的反思

撰文／王思翔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已過去四十多年了。近年來又漸漸成了熱門話題，在台灣島內外都出現了一些回憶和批評「二·二八」的文章或著作，至於在其他著述中涉及這一事件的就更多了。這是形勢所致，決非偶然。因為台灣海峽兩岸以至於全世界的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轉折關頭已迎面而至；人們為了理解現在，把握未來，便自然地要認真反思過去。而在現在台灣歷史上，「二·二八」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且不說它迄今仍保持著深刻印象）。因此，它成了人們反思的熱點，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迄今為止，從史學的角度來說，「二·二八」仍是一片榛棘叢生的處女地。今日反思者，不免會遇到許多問號，難於急切間予以解答。而對於認真嚴肅的人說來，倘不弄清歷史真相，就難以作出合乎實際的判斷；那麼，反思也就無所依據，沒有意義了。因此，目前出現的反思潮流，必將推動人們努力去發掘、整理、研究和討論「二·二八」的歷史。這是可以預期的。但這工作又不是少數人在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為開墾這一片台灣史上的「處女地」，得讓各種各樣的有志者從各方面進行各自的工作。換句話說，要有充份民主的討論。

鄙人「有幸」親歷了「二·二八」，與台灣各界人士有過一些接觸。今雖事過境遷，昔日友人凋逝殆盡，鄙人亦由少壯轉入老

境，仍願追隨後塵，略陳鄙見，以供反思者參考。

一、1945—1947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距離台灣光復只有一年多時間。可以說，數百萬台灣民衆歡呼光復的餘音在耳，轉眼間化作一陣「打阿山！」的怒吼。事情是這樣突兀，以致許多人難以理解前後兩事接踵而至的因由和關係。於是，便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判斷：一種是，既然台灣民衆熱忱地歡迎了來接收台灣的政府，忽然間又奮起反抗它，就是不應該發生也不可理解的事，一定是少數「共產黨份子」或「叛國者」製造出來的事端。這是台灣當局一貫的說法。按照這個說法，「二·二八」就沒有什麼歷史的和現實的根源，無甚意義可言。另一種是既然台灣人在「二·二八」如此強烈地反對國民黨，那麼，政府的統治，一年前的歡慶豈非一場惡夢！「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更有進者，則把光復視為虛幻、為騙局。——兩種判斷，各執一端，相互矛盾；但都是表面地孤立地觀察歷史現象，並用形式邏輯的「非此即彼」簡單公式來推理，因此作出了同樣錯誤的判斷。

歷史是一條長河。它時而逕直向前，時而迂迴曲折；或平和舒暢，或拘怒馳突；既有深潭於泊，也可以「奔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其變化多姿，似不受拘束，實則有其內部規律，與外部環境相迎據而交織成一體，在無序中體現有序性，以偶然的形式載荷著必然的內涵。在台灣歷史上，一九四五年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舊的歷史時期（「日據時期」）於此結束，新的歷史時期（不妨姑稱之為「後日據時期」）剛才開始。在這重大轉折中，舊的秩序瓦解了，新的秩序尚須建立鞏固；而這牽涉到社會全體民衆和各方面的切身利益，勢必引起各種力量的矛盾、磨擦、抗爭、較

量和重新組合，須經一段時間方能得到新的（或暫時的）均衡。因此，我們可以把四十年代後期看成一個特定的過渡階段，或者是「後日據時期」的誕生階段。它的特點就在於動盪不安、複雜多變；但它又是歷史上常見的，不可避免的。明乎此，我們就不會因為光復不久就發生「二·二八」事件而迷惑，反可以由此而把握這個歷史階段的特點。

在這個歷史階段中，第一件也是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台灣光復。它打開了台灣歷史的新篇章，並且對以後的過程給予深刻影響。這是任何尊重事實的人無法否認的。我們研討「二·二八」，也只能由此開始。從一定的意義說，光復是因，「二·二八」是果。何以見得？略知台灣歷史的人都知道，至遲從第一次世界以來，儘管台灣人民並不甘心日本殖民者的統治，却一次也沒有發生過全島規模的武裝起義。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因為那時候在台灣沒有這樣幹的條件。如果不是光復改變了整個情況，很難想像在一九四七年春天這一幕宏偉悲壯的戲劇有演出的機會。當然，以陳儀為首的台灣當局，在促成「二·二八」方面也盡了一份力量。對此，我們亦不能忽視。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光復本身就包含著矛盾。第一，自一八九五年日本侵佔台灣之日起，台灣人民便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展開了堅決而持久的鬥爭，付出了幾十萬人的犧牲，奮鬥的目標就是回歸祖國。台灣人民的這一崇高願望受到了世界公正輿論和許多國家政府的尊重，二次大戰期間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簽署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申明了這一事實。但是，台灣人民本應作為勝利者（至少在台灣的範圍內）獲得的地位和權益受到了粗暴無理的侵犯，他們不但被剝奪了參與受降的權利，而且被視同戰敗國日本交還的俘虜——有時甚至被看做戰敗國臣民。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非常荒謬的。第二，從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開

始，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從事工業和交通等建設已初具規模，到三十年代，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儘管這一切都是服從於殖民者加強對台灣的掠奪的目的，帶著嚴重的不合理弊病，但畢竟沖擊了台灣原有的封建社會結構，引進了若干比較先進的設施、技術和文化。適應於這種新情況，台灣人民的民主運動就越來越加重民主要求的成份，二十年來蓬勃發展的工農運動便是它的新形式，但不久被日本殖民政府鎮壓而陷於停滯。「光復」一詞，本義即是恢復或收復。將台灣從日本佔領下收回，這是沒有可爭議的，事實上也很迅速而且圓滿地完成了。但是「恢復」什麼呢？不用說恢復日據前的舊貌已經不可能，連三十年代初日據下的「穩定」「繁榮」狀態也早已被歷史所唾棄；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場上來說，亟待恢復也理應恢復的是以前被異族統治所剝奪的、在自己國土上自由生活當家作主的權利，和先輩們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的傳統。而如上文所指出，恰恰在這裏，光復本身是殘缺的，尚有待於努力爭取方能完成。

這些矛盾在光復當時被強烈的民族感情所掩蓋，但不久就漸漸暴露了出來。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台灣各界的活動家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實行地方自治，獲得參政的權利，希望用這種民主的方式來抵制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獨裁，反對它的貪污敗腐，改變它的某些政策和措施。這種要求，從性質上說是十分溫和的，帶有濃厚的西方的民主氣氛。（同當時大陸各省內戰方酣的情況相比較，更顯得特出。這反應台灣脫離祖國五十年之久，形成了地方的特色。）但連這樣溫和的民主要求，都得不到滿足，因而「二·二八」就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九四五年冬台灣民眾如此大規模的歡慶光復活動，在全中國也是非常獨特的。排開其他因素不說，這獨特性表明台灣民眾已擺脫自然經濟下農民所固有的冷漠和封閉愚昧狀態，具有了現代市民的自主意識。從這個角度來看，自

發的大規模慶祝活動也是一場羣衆示威運動，向新的執政者表示民衆不可能接受封建專制，也不會對他們的基本權益持漠不關心的態度。那麼，在這第一次示威運動未達目的之後，又爆發第二次更猛烈的沖擊——「二·二八」，就是不足爲奇的了。當然，第二次就不是第一次的簡單重複，猶如戲劇第二幕的劇情已有了發展，人物的言行也隨之開展；但主題仍舊，一直到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最後通過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還在民主自治範圍以內；而且保持了一貫的風格，自發的廣泛的羣衆運動在受到血腥鎮壓之後才部份地轉入武裝戰鬥。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來龍去脈，和周圍的許多事物發生著各種關係，只有基本上弄清這些情況，才能夠得到比較正確的認識。對於「二·二八」，我們也應採取這個辦法，把它放在四十年代後期台灣的歷史背景上加以考察，並且把它和當時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光復聯繫起來。這樣，我們就可以澄清各種誤會和妄斷，透過各種詭異的表象，得出一個可能是比較合乎客觀實際的認識：「二·二八」是台灣廣大民衆在推翻異族的殖民統治、回歸祖國之後，爲維護自己應該享受的基本民主權利而進行的鬥爭受到阻撓，才激發爲羣衆性行動；這種行動是正義的，並且是合理的。這次運動雖以失敗而告終，但它在台灣歷史上是留下了不減的光輝；它所提出的實行地方民主自治的要求，將成爲後人繼續奮鬥的一個目標，並將最終在台灣實現。

二、從台灣到大陸

我們還應該把台灣問題放置在全中國之下進行研究探討。因爲從光復之日起，台灣便成了中國的一省，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所以，任何企圖阻撓或防止海峽兩岸的聯繫都是不現實的。關係台灣

的命運最爲嚴重者，莫過於由中國大陸來接管的以陳儀爲首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了（它就是「二·二八」時廣大羣衆鬥爭的對象）。它在台灣推行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政策，而這個政府因其獨裁腐朽受全國人民反對，早已病入膏肓，行將就木。本來在四十年代後期的台灣，存在著不少複雜的問題，如改造日據時代的不合理經濟結構，醫治戰爭的破壞創傷，重建民主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都需要付出艱辛的勞動；而國民黨當局除受降外，不可能做出什麼好事來，反而以其一貫的專制、腐敗、顛預給台灣製造許多新的麻煩和災難。這就是當代中國歷史形成的大勢所趨，倒不能完全歸罪於來台的官吏們存心作惡；如果說台灣當局採取某些類似於日本殖民政府的特殊政策、政令，招致台灣民衆的反對，這也不能算是根本性的癥結所在，因爲這些特殊東西原是它不斷變換的手段而已，如其不然，何以它在大陸各省早就被人民所痛恨呢？台灣各界民衆因爲幾十年來離開祖國，所以在光復的時候對國內狀況知之甚少，錯把國民黨政府當作中國人民的真正代表來歡迎；到了「二·二八」時，終於基本上看清了它的真面目，因此才奮起參與了全國人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行列。這絲毫沒有什麼奇怪，如果說國民黨一到台灣就能脫胎換骨、立地成佛，或者說台灣民衆竟會長期容忍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倒真不可思議了。國民黨當局責罵台灣民衆在「二·二八」時「排外」、「叛國」，按它那個「朕即國家」的邏輯也許說得通；但在人民的立場上來看則完全相反：台灣民衆離開國民黨愈遠，就愈接近大陸各省同胞並與之融成了一體。祖國只有一個，而政府是可以選擇和罷免的。怎麼能容許人污蔑台灣人民熱愛祖國的赤誠呢？

國民黨當局又把「二·二八」的起因推到共產黨身上，這也是它的慣技。很久以來，它總把一切反對它的人、一切它不歡喜的人，都一律加上「共產黨」的罪名。如果照它的特殊詞典來理解。

以四十年代後期的情形來說，它在大陸各省的統治已四面楚歌、朝不保夕。這種「楚歌」當漸會傳過海峽來，使台灣民心為之鼓動，也使許多原來跟著國民黨跑的人重新考慮自己應走的路。台灣當局曾用盡心機打擊和防範「共產黨」，封鎖大陸多省的訊息和自由言論；但是愈來愈多主張民主要求進步的人，正直明理的人，以至於國民黨內部有識者，起來反對它的反民主措施，而寄同情於台灣民衆。現在我們可以說，「二·二八」的直接參加者雖限於台籍民衆，但在省內外以各種方式給予支持、援助的「共產黨」却不限於本省人，至於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調」走了駐在台灣國民黨軍所起的作用，更不待說了。由此可見，到「二·二八」時，儘管當局在挑撥和製造省籍之間的矛盾，這界限已被冲破，起不了多大作用。

固然，事變初起時在台北發生過「打阿山」的事情，但這只是少數羣衆偶發之舉，很快就得到了制止。以鄙人親歷與見聞所及來說，許多外省人包括文化人和職員，都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凡是起義組織控制的地區，秩序井然。只有到了國民黨大軍入境之後，才迫使大批外省人倉皇而逃；還有不少被誣為「共產黨」或別的罪名，和那些著名的台灣民主戰士們、「二·二八」各地活動份子，一同遭殺害，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連德高望重的許壽裳老教授也死於非命。有朝一日為台灣「二·二八」烈士建立紀念館，我相信台灣同胞絕不會忘記這些外省人。那麼，今天的反思，更不應忽略這些事了。

5/89 於安徽合肥

【作者簡介】

王思翔現在的名字是張禹，住在安徽省合肥市，已經退休。1946～47年間，王思翔任職台中市「和平日報」的主筆，認識不少當時台中地區的文化界人士，交往比較密切的有主辦「文化交流」的楊逵夫婦，經營「大華酒家」的謝雪紅、圖書館長莊垂勝以及張深切、鍾天啓（鍾逸人）、楊選堂（現台大教授）等人。

二·二八事件後，「和平日報」受當局查封，王思翔逃離台灣，寫成「台灣二月革命記」，是為最早出版的有關著作之一，一直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歷史資料，提及這本舊作，王思翔表示「那是四十年前倉促寫成的一篇報導，不免有許多缺陷，故絕版已久，我亦無意再使其流傳。但不管怎麼樣，那也表示了當時的一種觀念。」

四十年前的台灣零憶

撰文／錢歌川

「台灣與世界」雜誌社，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台灣思潮」雜誌社聯合主辦了一個台灣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於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三月一日，假紐約哥大師範學院大禮堂舉行。由大陸及台灣，都有歷史的見證人前來參加，要以冷靜的心情來回顧這個歷史上的不幸事件。我也應邀出席這個大會，並要我在會上說幾句話。但我本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不在台灣，實在沒有什麼可向會眾報告的，既然被指定要說話，只好講點二·二八前後的零星回憶。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發表的開羅會議宣言，已經宣佈台灣歸還中國。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到八月二日，在柏林附近舉行波茨坦會議時，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已經指日可待了。國民政府業已指定陳儀去台灣受降並留下主持台政，所以他在勝利前夕，已在重慶開始招兵買馬。我當時也曾被邀請赴台，他們還要給我安家費。不過我們原在京滬一帶工作的人，還是想復員到過去工作的地方，不願遠赴邊疆或海外，我辭謝了陳儀的邀請，沒有參加他那接收台灣的班子。

我雖沒有去台灣做官，但還是去了台灣辦學。在二·二八事件的前半年，我已接受了台灣大學陸志鴻校長的聘約，他誠懇地請我去幫他創立台大文學院。我原先工作的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已經解散，恢復無期。由重慶遷回的少數幾個人臨時組織的編輯部，我雖可以參加工作，但我在上海找不到住的地方，只好放棄回滬工作的

意圖，決定接受台灣大學的聘請。加上國內時局不穩，國民黨的軍隊節節失利，國民政府已經不能安坐江山，戰爭很快就會迫近京滬，我自然也不必坐守危城了。

台大只剩空架子

新光復的台灣，教育當然是最重要的，這使我決定離開大陸前往台灣，雖有台灣人敵視大陸人的謠言，也不暇顧及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政府罷免了陳儀，他在四月十一日便離台回返大陸去了。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魏道明在四月十六日來台就任第一屆的省長。

我初到台大時，文學院什麼也沒有，原有教師都遣送回日了，留下文學院一個空架子。大陸來的教師，寥寥可數，只有馬宗融、魏建功、台靜農少數幾個人而已。魏道明到任後，大事改組台灣政府，原任教育處長的范壽康下台了，我便馬上聘他來台大，主持文學院哲學系。台灣省立編譯館撤銷了，館長許壽裳賦閒了，我便馬上聘請他來主持文學院的中文系。又聘涂序宣為歷史系主任，饒餘威為英文系主任，再聘請一些各科的教師，勉強招生開課。台北帝大留下的文科學生不過兩人，都到快畢業的時候了。不久就從我手裡發給了他們國立台灣大學的畢業證書。當時國內一片混亂，各名大學如北大、清華、燕京、南開、中央等三年修了的學生，都渡海來台，到台大借讀，一年後以台大學生名義畢業。大多數取得大學畢業資格後，都到美國進修高級學位，現在也都成了華裔美人，在美成家立業了。

台灣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光復，我在差不多一年之後才去台灣。住的是前台北帝大文科部長矢野峯人花了二十年經營造就的一幢相當大的私宅。那不是台大的校產，當然更不是政府的

公產。我在重慶認識的一個閩南的朋友，他是跟陳儀一道來台灣的，現任一個什麼局的局長，他對人地生疏初去台灣的我，特別照顧，自動建議要代我去到有關機關登記，說登記以後現住的這座大房子，就可成為我的私產了。我是一個素不貪財的人，尤其對這種不義之財是決不貪圖的。所以我謝謝了他的好意，同時就去催促台大總務長蘇薌雨趕快去登記為台大的校產。可見光復一年了，接收的情形依然存在。當時上海虹口一帶，也有接受日本人的產業，佔為已有的情形，我曾親自見到的。

台北連麵包都沒有

光復初期的台灣，一切還是相當落後的，我哥哥從漢口水電公司寫信給我，要我為他買某種電器零件，我打聽一下才知台灣只有粗製品，要送到日本去加工才好用。我初去時想買一架電扇，找盡了台北市，只找到一架破舊的小電扇。當時台北連麵包都沒有。我還是在魏道明省長的宴會上才吃到麵包的，一般老百姓，都沒有足夠的食物，產米的地方沒有米吃，據說是運去作軍糧了。老百姓相當窮苦，到了寒冷的冬天也不過多加一兩件單衣而已。

當時台北除高大的人力車外，少有交通工具。我從上海運去一輛三輪車，是台灣第一部，陸校長想要我轉讓給學校，我未同意。市上見到的少數幾部人力車，高大堂皇，非一般人所能乘坐，普通人都是安步當車。這情形到一九五〇年國府遷台後才有所改變。

日本人的所謂皇民化運動，鼓勵台灣人改用日本姓氏，全家人都能說日本話的，稱為國語家庭，可以多領配給，不會說日語的只能給配給的一半，但一般年紀大點的台灣人，並不願改名換姓，或做國語家庭的成員，還是要繼續說他的台灣話。入學讀書的青少年就全日本化了，甚至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如新近得到諾貝爾獎的李

遠哲就說，台灣光復後，他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才開始學台灣話，學北京話，而受到各種新思潮的衝擊。

光復後大家熱衷學北京話

老一輩的台灣人還是繼續在用漢文寫作，如連雅堂著的「台灣通史」就是用中文寫的。台灣還有許多詩社。談到詩真是源遠流長，還是在明朝末年，有位沈光文（斯庵）流寓到了台灣，組織了一個福台詩社，成為台灣詩社會嚆矢。從那以後，改朝換代，幾百年來，台灣的詩社延綿不絕。所有詩社的社員，都用律詩、絕句等舊詩的形式在寫詩，以抒發他們的故國之思。丘念台的父親丘逢甲倉海先生的詩中有「宰相有權能割地，英雄無力可回天」；「二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等傳誦至今的名句。我在一九四九年夏有次參加了薇閣詩社的聚會，在會上聽到林獻堂老先生居然用北京話演講，因為當時與會的許多大陸去的人都聽不懂台灣話。林老的北京話，聽說是從收音機上學來的。年輕人在光復以後學說北京話更為一股熱潮。那既是一次詩人的聚會，我濫芋其間，也只好獻醜了。

台灣雖受日本殖民統治達五十一年之久，台灣同胞對祖國的向心力，還是很強烈的。可惜台灣未能好好地正常地接收祖國的溫暖親情，在光復後不久，國民黨的政府就丟掉了大陸，而渡海到了台灣，形成偏安之局，維持他們的法統，人為地把台灣和大陸割裂開來，使得台灣至今四十年，還未能真正地回到祖國的懷抱。如果五十年代初期，不發生韓戰，不受到美國的干預，那台灣應早已和大陸統一了。

我記得在台灣光復初期，所有的精神糧食全由上海供應，上海中華商務兩大出版公司，把過去賣不掉的舊書，連同新書一道運到

台灣都一下子銷售一空。我在當時二十多年前出的一本音樂書，初版一直滯銷，現在運到台灣，不但舊書銷完，又還重印了幾版。其他的書就更可想見了。

這情形一直繼續到五十年代初期，即是到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以後，台灣的情形就完全改觀了。美國人不許大陸攻打台灣，也不許台灣攻打大陸，雙方都不許動手，要台灣與大陸完全隔絕，於是台灣就變成一個孤島了。一切精神糧食和文化設施，既不能再依賴大陸，只好點點滴滴自己新搞起來。從大眾的努力，逐漸造成今日的繁榮。這種自力更生，可以說是和大陸割裂而造成的結果，要是當初一直什麼都依賴大陸可能就和日據時代依賴日本的情形一樣，什麼都留在半開發狀態中。

台灣爲什麼怕三通？

大陸共產黨取得政權，不斷革命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社會上舊的全打倒了，新的還百廢待舉。舊中國對知識份子尊重的，雖則送灶神上天時，要他稟告玉皇大帝的一句話，就是「只有文章不值錢」，但比起今天國內的行情那時的文章又是何等的值錢呀。我靠賣文所得，而得赴英國留學，今日我在國內的書銷售了四五十萬部才會到幾千元人民幣的稿費。物質方面的減低還不打緊，最使人難堪的，就是編輯老爺完全不把作者放在眼裡，絕對不尊重文章的作者。巴金說國內的出版社全是衙門，這是在台灣、在香港決不會發生的事。我有一本書原在台灣出版，因書中用了解放的字樣而被查禁，後交北京出版，但兩個版本完全不能比，台灣印的雖也是平裝，但漂亮了多少倍。台灣出的一部「大辭典」，比大陸出的「辭源」、「辭海」等裝幀印刷都精美多了。我不懂台灣爲什麼這樣怕三通，大約是患了恐共病吧。其實互相交通之後，一切有個比較，

更容易促成進步。海峽兩岸的政府，都怕人民有民主自由，比較一下，就知道誰的器量大一點，誰管得少點。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還是資產階級的優越性，人民在哪裡有多一點的自由。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決不偏袒那一邊，只有一顆愛國心，無論國家搞到什麼樣子，總還是愛它的。大陸是我的出生地，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合作呢？爲國家民族著想，就應該捐棄前嫌和私心了。

凡是中國人都希望台灣問題能早日獲得和平解決，不要由政治上的理由長期分割。我們只要研究一下台灣的歷史，便可發覺台灣與大陸之間是有分不開、斬不斷的血緣關係的。也不難發現台灣的歷史進展，處處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民族意識，而且台胞的鄉土觀念和民族意識並未因日本殖民統治和中國政局變化而告消失。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台灣人民對國內政治的腐敗缺少了解，期望過高，失望之餘，挺而走險。現在回顧一下，不失爲一個可資反省的龜鑑。了解它的成因，就可促進人民間的團結，堅強地把關別八九十年的同胞，恢復應有的親情，共同合作，建立富強的新中國。

本文發表于「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紐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二八事件親歷、見聞雜記

——兼及陳儀的評價

■ 撰文／丁名楠

(一)

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接受波茲坦公告，放棄原屬中國的台灣等地。中國人民聞此喜訊，奔走相告，一片歡騰。九月七日，陳儀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負責接管台灣。當時我是清華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剛看了蘇聯電影，其中有幾個鏡頭描寫一羣男女青年在集體農場勞動後的歡快情景，使我深受感動，認為我也應該為建設自己的國家出力，尤其應該為重新回到祖國懷抱的台灣同胞服務，於是決定休學，從昆明趕到重慶，向陳儀表示願去台灣基層工作的決心。陳儀最初不甚贊成我去台灣，後來還是同意了，要我去同沈仲九商談。

沈是陳儀前妻的堂弟，深受他的信任，實際是委託沈安排我的工作。不久我同接管台灣人員一起乘美國運輸機由重慶到上海，立即轉到停靠在黃浦江邊的美國登陸艇上待命出發。離重慶前，每人領到一份安家費（或治裝費）。當時重慶物價高，我用這筆錢置備了一些衣服和日用品。由於國民黨政府故意人為地把收復區的幣值壓得很低，法幣到上海轉眼身價大增，有很高的購買力。北方的平、津和南方廣州的幣值也同上海一樣被貶得很低，這是對淪陷區人民的又一次無恥掠奪。當地流行的民謠：「盼中央，念中央，中央來了民遭殃」是廣大羣衆強烈失望和怨憤情緒的反映。我們在上

海的美國登陸艇上過了兩三天鼓輪南行。到達台灣基隆後，受到當地的殷勤接待。在去台北的路上，我看到鐵路兩旁的人羣自動歡呼和熱情鼓掌，情況十分感人。

抵台北後幾天裡，還沒有正式辦公，我到基隆並在台北閒逛。這兩地在戰爭期間遭到美機的狂轟濫炸，到處頹垣斷壁，觸目驚心。而基隆的殘破程度又超過台北。我首先得到的印象是恢復工作將是十分艱巨。其次是覺得日本是殘暴的殖民者，胸襟狹窄，令人生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頗有可取之處。就台北市政建設來說，它的整個格局楚楚有致，主要街道寬闊整潔，公共建築物高大、美觀、結實。台灣總督府已被美機夷為平地，而已經建成尚未利用的台北市政廳（即後來的長官公署）仍然完好無損。這是一座由鋼筋水泥建成的三層樓房，占地頗廣，外觀雅致、大方，內部堅固實用；又如台北公會堂（後改稱中山堂）也是一所高大、壯觀的建築物。類似這樣的建築，當時內地各省都還沒有。這些現代化建築雖然透露了日本企圖永久占領台灣的野心，但也顯示了日本的氣魄和實幹精神，不可小視。

十月二十四日，陳儀從重慶飛抵台北，在機場發表談話，說他來台灣是為做事，不是為做官，要激發榮譽心、愛國心、責任心，做到不偷懶、不說謊、不揩油（貪污），願與部屬共勉，並希望台灣同胞協助，共同建設新台灣。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行莊嚴隆重的受降典禮，接受日本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後，陳儀即席發表廣播演說：「台灣及澎湖列島自本日起重歸中國版圖，所有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同胞及全世界周知。」我當時未能參加受降典禮，但覺得能夠湔雪過去失地的恥辱，親自見到台灣重歸祖國懷抱是一生極大幸事。這是台灣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天。

(二)

受降典禮後長官公署正式辦公。我的工作為剪貼國內（主要是上海）報紙中關於台灣的報導供陳儀瀏覽。我看到有的報紙對台灣接管工作橫加非議，惡意指責，便問陳儀為什麼會這樣。陳儀說不久前有一位報社負責人來台，要求他給予大量經濟資助就轉變態度。陳儀對此極為憤慨，嚴辭拒絕。當時台灣對外界交通極不方便，上海報紙由水路運來，輪船來台很不準時，剪報工作時停時續，我利用空閒時間為沈仲九支持的《現代周刊》寫稿，發表了兩篇時事述評和一篇人物評論的文章。一九四六年一月初，我隨袁國欽去台南。袁深受沈仲九器重。大概由於沈介紹陳儀與我的關係以及我來台志願和學歷，袁到台南了解當地大致情況後，派我為曾文區區長。曾文區在台南是各區中面積較小，是農業區，不象北部虎尾、斗六、嘉義等區商工業也較發展，經濟較為活躍，情況複雜。而我初出校門，缺乏行政經驗，不勝繁劇，區署所在地麻豆又與縣政府所在地新營因此相連，袁國欽派我到曾文工作，看來是經過鄭重考慮的。台南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地區，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後，也曾在現在的曾文區一帶駐兵，並派人教當地高山族人牛耕和使用鋤鎌等農具。一六九七年郁永河來台採集硫黃，著有《裨海紀遊》一書，說麻豆高山族人「勤稼穡，多蓄積，比戶殷富」，那裡「嘉木陰森，屋宇完結，不減內地村落。」曾文區一鎮四鄉，麻豆鎮人口最多，土地肥沃，又以產文旦（柚子）著名，它被列為日本天皇貢品，下營鄉次之，六甲、大內兩鄉多山，但鄉公所附近土地亦頗膏腴，官田鄉因修建嘉南大圳（現改稱曾文水庫）時表土破壞嚴重，在全區中最為貧瘠。曾文區因境內的曾文溪得名。夏秋季節，雨暴風狂，山水奔騰下注，咆哮入海，曾文溪頓成巨川。冬春旱季它又變為一泓細流，淺處可涉水到達彼岸。日治時代依地形修

成水庫蓄水，供冬春灌溉台南縣南部大部分農田之用，因其工程較大，容水量當時號稱東亞第一，聞名遐邇。

區署為縣政府派出機關，負責督導鄉鎮工作，頭緒多，較為繁瑣。我在曾文區一年多，乏善可陳，十分慚愧。勉強值得一提的是利用日本人遣返後，原先專供日籍兒童學習的小學校舍，籌設曾文初級中學，聘請當地熱心教育的胡丙申老先生為校長，主持其事，於當年秋季招收一年級新生入學，部分免除曾文區（主要麻豆）兒童早出晚歸，遠赴台南市求學往返之勞。當時除校舍現成外，師資及其他設備都還未解決。但這所初中總算辦起來了，畢竟差強人意。

最令人懊喪的是秋季颱風過境，造成災難。光復後農民生產積極性很高，他們克服肥料缺乏等嚴重困難，努力耕耘，當年水稻長勢喜人眼看秋收在望，將是一個豐產年。不料9月中遭颱風襲擊，莊稼倒伏，拔樹毀屋，損失嚴重。看到災後景象，心痛不已。但我在曾文區工作期間，台灣發生最大事情當然要算二二八事件。

(三)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專賣局人員因查緝私販香煙滋事，導致羣眾占領電台，號召各地自動起來反抗，全台灣震動。我平日一向不收聽廣播，事發後數日對此仍一無所知，只是台北出版的報紙連續幾天不來，疑心那裡可能出事，但總以為很快就會過去。3月3日深夜，接到不知何人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縣長袁國欽帶同外省籍科局級人員數十人離開新營，到高山族居地避難，我才認識到事態嚴重，而對縣長出走前不打招呼，感到不快。第二天了解情況，得知台北因查緝私煙出事，波及台中、高雄等地，又傳聞在嘉義市羣眾與機場守軍發生衝突，且聽說外省人統統被稱為「阿

山」，在路上行走時，會被人用閩南話或日本話盤問，應對不上的就會遭到毆打甚或被處死。我很不理解本地人與外省人關係何以變得如此敵對，但決定自己不離開麻豆，首先是作為區長，在沒有被免職前應該不計個人安危，繼續留在當地對本區人民負責。其次，留在麻豆比較安全，相信當地人不至與我為難，而一離開麻豆，人地生疏，有可能遭到凌辱甚至加害。我是主動要求來台灣工作的，應該由自己承擔風險，不能怨天尤人，而我雙親早亡，無兄弟姊妹，又未結婚，沒有牽掛。這樣一想心情反倒平靜一些。

三月四日以後，麻豆學生和青年成立自衛隊，奪取警察所槍支，釋放拘留犯，由他們維持秩序，隨後戰時破日本征募往東南亞服役光復後回來的當地失業青年，也參加進去。這兩部分人合在一起，麻豆空氣顯得驟然緊張起來。自衛隊將在總爺糖廠等處工作的外省籍成年男性集中到區署左側的一間房子裡（嘉南大圳曾文支部）實行監管。他們對我比較客氣，仍允許在區署和宿舍之間自由行動，不加干涉，只不准離開麻豆。此後一段時間裡，我雖然仍按時上下班，其實無公可辦，也無心看書，日子很不好過，真可謂度日如年。當時苦思冥想如何擺脫困境，設法知道縣裡和台北的情況。由於內外隔絕，只偶而得到一鱗半爪的消息，如各區自衛隊和其他代表在新營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要求罷免縣長，因為他率眾出走，擅離職守，但曾文區代表卻替我說好話，等等。他們印發的當地小報上把這些內容刊登出來，但台北情況仍不清楚，使我十分焦急。

三月中旬起，我注意可能軍隊已到台灣鎮壓。麻豆不是重點地點，但遲早也會派兵前來清查，自衛隊員多，是些不知利害的不懂事青年，單憑他們從警察所裡取來的步槍，無論如何對付不了正規軍，雙方如果交火，他們不但很快遭到傷亡，而且家屬，鄰居和鎮上居民也會連帶受害。一想到這些可能會發生的後果使我坐立不

安，不知如何辦才好。我很想勸他們盡快交出武器，自動解散自衛隊，但顧慮這些年青年人感情衝動，在極度憤急的情況下，不但聽不進勸告，反會激起反感，導致不測。經過反復考慮後，最後還是轉告他們交出槍支，自動回家，保證我一定向上級請求，說明曾文區全區安謐，沒有發生事故，毋需派軍隊到區裡來，本人盡量擔保他們及家屬安全等等。不料自衛隊沒有了解我的苦衷，以為軍隊調到台灣後，各處查辦得手，而我卻在這時要剝奪他們手裡的一點武器，致使他們束手就擒，顯然不懷好心。他們火冒三丈，怒氣沖沖地跑來找我算賬。在區署走廊裡我碰到五六名青年，手持步槍，見到我後立即舉起槍支，拉開扳機，準備向我射擊，彼此相距僅兩三米遠。我面對這突然出現的局面，站著不動，只好聽天由命。緊跟在他們後面的家屬以及區署職員見狀大為驚慌，極力勸阻。雙方相持不長的時間，他們的勸說終於生效，在千鈞一髮之際，自衛隊員把舉起的步槍放下，關上扳機，退出區署。隨著軍隊在各地展開鎮壓，武器逐漸交回，縣長又回到新營，區裡的秩序也恢復了，但別處被打散的自衛隊有的四處流竄，企圖找機會洩憤。一天下午我接到電話，說北門區佳里鎮有一伙人將來麻豆，聲稱曾文區長是陳儀外甥，要跟我算賬。我不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也無法弄清消息真假，但認為來意不善，不可不防。我掛了一個電話給麻豆總爺糖廠廠長吳卓（清華大學早年留美學生），請他留神以後，獨自一人溜出區署，到一位外省來台教書的老師那裡暫避，當地林姓的小學教員還主動為我晝夜守護。幾天後，我去新營匯報曾文區情況，請縣長轉告部隊曾文區沒有發生騷動，不需要軍隊前來查究。後來一名排長同幾個士兵到麻豆核實情況，我在區署樓上接待他們，向他們懇切說明本區沒有發生事故，請求不要派軍隊前來。他聽後匆匆離去。事後六甲鄉長陳麟網跑來，說他兄弟和幾名青年，曾到高雄鬧事，現已回家，請求不予追究。我以為向上級匯報，反會惹起麻

煩，這些青年既已平安回家，只要不再外出惹事，如果上級來人查辦，我一定替他們竭力開脫。直到五月初我離開曾文區時，沒有部隊前來查問。

五月六日，我收到陳儀4日寫的親筆信，內附言說警備司令已由彭孟緝調升，「魏主席一星期內可到台，余離去之日，當在十日以內。」又說「余素不做詩，近以百感攢胸，作小詩兩首，錄請留作紀念。」另紙寫「近作七言絕句二首，錄贈名楠甥」下面簽名蓋章。

無題

事業平生悲劇多 循環歷史究如何
痴心愛國渾忘老 愛到痴心即是魔

又

治生敢曰太無方 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 一朝罷去便飢荒

我收到信後，十分激動。他說「百感攢胸」，我是能夠體會的，本想寫詩回他，但我平仄不分，對詩一竅不通，無法安慰他。第二天，我趕往新營，向袁國欽提出口頭辭呈，告訴收到陳儀的信，他即將離台，我打算一起同他回去。袁國欽馬上照准，答應立即派人接替我。回麻豆後，我宣佈縣長已批准我辭職請求，準備即日離開麻豆。區署職員懇切挽留，我對此表示感謝。不久王區長前來接任，我當天離開曾文區，區署全體職工和地方人士列隊歡送，依依惜別。到台北後，向陳儀陳述曾文區在事件中的大致情況。隨後不久同他一起乘專機離台到南京，他向有關方面匯報以後，我又隨他到上海，在那裡沒有停留多久，即搭輪船到天津又轉北京，到清華園重新過研究生生活。

(四)

陳儀在羣魔亂舞的舊中國官場裡，可以說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他操守廉潔，生活簡樸，力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為當地人民做事。他的個人生活是無可指責的。在台北他不住闊綽的前台灣總督官邸，而住在一所二層樓的小洋房裡。每天七點左右，還不到上班時間，就開始在長官公署辦公，午間吃過簡單中飯，打個盹後又繼續工作，直到晚上七點，大家早已下班，而他的大廳裡仍然燈火通明。他甚至星期天上午也照常工作，只當天下午休息半天。有人勸他換個環境，星期天到郊外草山賓館過夜，他不同意，因為這樣做會勞師動衆，攪得保安人員不得安息。他因患相當重的糖尿病而戒酒，抽的是國產的銀行牌香煙。陳儀沒有親生子女。在日俘日僑遣送後，日籍太太曾短期來台，不久又回上海。陳儀獨居索處，看書是公餘唯一嗜好。每天生活刻板，只要不生病，一年四季不變，彷彿一架機器，卻有無窮無盡的精力。有人稱他為「鐵牛」，倒是相當形象的。

陳儀個人生活無可挑剔，在公事方面卻有不少敵人。他竭力想維護公衆利益，辦事認真，因此得罪許多人。他們製造種種流言蜚語，誣陷陳儀，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隨聲附和，給他增加很大困難。

陳儀認為台灣與內地各省情況不同，應考慮其特殊條件而有不同的建制。他主張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除照舊設民政、財政、教育等處外，還將各省建設廳的業務，設立工礦、交通、農林等處由它們分管，添設宣傳、法制等委員會，保留專賣局，成立貿易局等。他主張台灣接管工作由長官公署統一辦理，不讓別的系統插手，免得責任不清，有人混水摸魚；他力拒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來台設立分支行籌設辦事機構；堅決主張台灣暫時保留台幣，法幣不在台灣流通，兩者匯率隨時調整，(後來因行政院長宋

子文作梗，沒有能貫徹）避免台灣金融、物價發生大的波動，影響當地社會安全人民生活等等。這些建議經批准并實施以後，卻遭到非議和反對。有些人造謠說陳儀攬權，不民主，在搞獨立王國，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無異過去的日本台灣總督。

陳儀負責接管台灣，需要大量工作人員，擔任各種領導職務。而日本統治時期，台灣行政和企業大權掌在日本人手裡，嚴格排斥台灣人，不使他們參與擔任甚至稍為重要的工作，致使他們的才智無由充分發揮，工作能力和經驗無從提高和積累。日本還極力使台灣和中國大陸隔絕，使他們完全不了解中國國情，再加上語言文字上的隔膜，陳儀除盡量延攬曾在大陸工作過有能力的台籍人員回台灣擔任重要職務以外，不得不羅致大批內地各省人才到台任職。因此光復後在行政和企業中擔任高、中級領導職務的本地人所占的比例稍小。這是歷史造成的原因，暫時無法避免。但有人利用地方觀念，硬說陳儀和日本人一樣，歧視和排斥本地人。這是一種惡毒的挑撥離間手法，容易引起台灣同胞對陳儀的反感。

關於陳儀搞獨立王國，攬權不民主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台灣接管後半年光景，就成立了省參議會。參議員批評省政，暢所欲言，毫無顧忌。上海新聞報駐台記者到會採訪也認為陳儀治台實在相當開明。他還說長官公署允許言論和新聞自由，極少加以干涉，而內地各省很少做到。一九四六年民政處根據陳儀指示，草成《台灣三年自治計劃》，預定一九五〇年台灣實行縣、市長和省長民選。台籍國民參政員林獻堂、黃國書等在公會堂宴請陳儀和民政處長周一鶚兩人。林獻堂等認為三年時間太長，要求提前民選。陳儀當場表示，「想把台灣的事情辦好，內心的著急不在大家之下，我們即使通力合作，積極努力，三年也是緊的。等到將來回憶今日，決不會嫌太長的」。陳儀談話的態度坦率，雖不同意提前民選，但決意三年後實行全省自治。他曾公開宣布過「不說謊」。上面的話

表明他有誠意、有決心積極準備，如期實現台灣自治。這和搞獨立王國的野心家完全不同。

台灣光復後，長官公署任命高、中級級別的職員，工作人員中本省人所占比率低，這是事實。但那是不得已，硬說陳儀同日本人一樣排斥台灣人是完全誹謗。陳儀常說，「要建設台灣而忽視扶植本省的力量是不行的。」為了較快地有新生力量充實台灣的建設隊伍，他要求改進和增設大專院校，盡量讓本地青年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同時要辦好中小學和各種職業學校。台灣大學是當地最高學府，在日治時代日人限制台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台灣人在大專院校中攻讀文法科比理工科更為困難。據統計，接管台大時該校一六六六名學生中，台灣籍學生僅佔五分之一（322名），長官公署認為台大必須多招台籍學生。它還決定立即在台北設立台灣師範學院和法政學院等。為充實台大籌募院校師資，多去聘請內地著名教授和學者來台任教；為發展台灣的文教事業，長官公署盡量樽節其他開支而寬籌文化、教育經費。在編制的一九四七年度台灣歲入歲出的總概算中，文教項下支出佔年支出總額的25.5%，比經濟及建設項下的支出多10.5%。這些措施是為貫徹陳儀盡快培養大量本地人才，克復光復時台灣人才不足的缺點著眼的。長官公署還辦了省訓練團，招收台灣青年和輪訓在職台籍人員，旨在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業務水平。

物價上漲特別引起羣眾普遍、強烈的不滿。儘管長官公署費了很大力氣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在大陸物價如脫疆野馬似的一個勁兒的奔騰向前的情勢下，它所實施的辦法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要不受大陸的影響根本辦不到。這一點廣大同胞是不理解的。據統計，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七年的十年間，物價批發指數上海上漲13936倍，南京則為13876倍，台灣從1937年到1947年3月，共漲271倍，比大陸小得多。在日本統治下，即使戰時物資

匱乏，台灣物價也有上漲，但仍保持相對的穩定，而台灣回到祖國以後，漲風卻越刮越厲害，這是台灣從未經歷過的。善良的廣大台胞天真地曾滿懷希望，光復後的日子會好過些，但事與願違，使他們大失所望。物價上漲影響到千家萬戶，給惡意攻擊陳儀的人提供方便有利的武器。他們利用台胞對大陸情況隔膜，硬說由於陳儀帶來大批貪官污吏，把台灣搞得一團糟。這種歪曲宣傳很容易被接受，許多人信以為真，把滿腹抱怨集中在陳儀身上。由此可見，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已到處理下了火種，風吹草動就會出事。台北緝私只是引發遍地大火的偶然因素。這裡附帶提一下陳儀為減輕省庫對軍費的負擔，也為了消除駐軍軍紀不良造成軍民之間的緊張關係，他把接收時來台後來一直駐守台灣的62軍全部調走（前已請准暫不在台灣征兵，從而使台灣青年不捲入內戰的漩渦），這實際上類似火災發生前解散了消防隊和救火隊。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全台只有憲兵一團，基隆、高雄兩要塞守軍共兩營，警備總部直屬部隊不到一團，這點單薄的力量是不可能應付四處蔓延的火勢的。有人認為陳儀愛民之心反肇成大禍。這確是沒有料到的。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經過，我不打算細說，已出版的有書可供參閱。這裡只想說這個事件又使陳儀背上嗜殺的惡名。這是不正確的。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前所長陳碧笙在紀念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發言中，說陳儀前在福建省主席任上，曾敢於殺死福建省軍統特務頭子張超，說陳儀殺人如麻，在二二八事件中大批殺人。1945年9月，陳碧笙曾簽名於一份聯名反對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的宣傳品上，我曾見到這份印刷品，張貼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民主牆上；二二八事件剛過去，陳碧笙等乘專機赴台，被當局擋駕，原機折返。陳碧笙的這番講話是否與這些事有關，我不得而知。但我認為給陳儀在二二八事件中加上殺人如麻的罪名，至少是不夠鄭重的。

陳儀任行政長官時，曾多次指示警務處長胡福相，警察和緝私人員執行任務時不准攜帶武器，他批評胡福相沒有貫徹命令。陳儀到台灣初期，有一段時間威望高，即使軍統特務，對他也有顧忌，不敢公然胡作非為。但後來隨著對社會上流言蜚語多，陳儀聲望逐漸下降，他們的行為便日益放肆起來。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對整個局勢失去了控制，軍統與中統合流，便完全不聽他的約束。他們在混亂中，任意闖入民宅，拘捕認為不順眼的人，暗中加以殺害，一些人便下落不明。台大教授林茂生就是被他們殺死的大批人中的一個。曾文初中校長胡丙申是林茂生的朋友，曾托我打聽林的下落，周一鶚也親自問陳儀關於林茂生和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的情況。陳儀很痛心地說：「他們（指軍統特務）事先不請示，事後還要求補辦手續，真是無法無天！」事情就是如此，這些人殺了人，陳碧笙卻把殺人如麻的罪名按在陳儀身上，這樣做是公平的吗？林茂生的兒子林宗光，1983年9月來北京參加「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他是美國德雷克大學歷史教授，仍以爲陳儀殺死他父親，滿腔憤怒。我也參加這項學術討論會，本想跟他解釋，後來考慮其他原因，沒有交談。陳儀是不願殺人的。1946年有一次我去台北，陳儀在家養病，我到他家裡看望他。他對英國工黨上台後議會通過廢除死刑的法案大為贊賞。一向跟我熱情贊揚廢除死刑的人會殺人如麻嗎？這是難以設想的。

二二八事件在一部分台胞心中，留下嚴重的創傷。但到今天，我們對這次事件的研究還很不夠，一些重大問題還沒有弄清楚。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輕率地作出論斷是危險的，也是不科學的。有人以為排除某些主觀因素，相隔的時間愈久，評論才能更加切近於真實。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四十多年，陳儀遇害明年將是四十周年。如果現在的政治形勢還不到實事求是地作出客觀評論的時候，那末我們應努力創造良好的氣氛，提倡科學的求實精神，力圖還歷

史以未來面目。我以為這一天總會到來。

1989年9月28日

【作者簡介】

丁名楠是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外甥，現年 72 歲，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1945 年 10 月隨陳儀到台灣任台南縣曾文區區長，1947 年 5 月隨陳儀離台。

第三部

研究篇



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經濟

撰文／許登源

一、引言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日本投降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國民黨政府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到台灣。從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十六個月這一段時間，台灣的經濟情況，以及這段時間的經濟因素對「二·二八」的發生到底有多大的影響，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問題。

有些對這件事有研究的學者把物價起飛、大量發印台幣、中國大陸的惡性通貨膨脹對台灣的轉嫁等，做為「二·二八」事件的決定因素（註1）。有些學者對經濟因素並不重視（註2）。從台灣官方的資料及據此所做的分析似乎又有利地印證了後一種看法（註3）。前一種看法以劉進慶為代表：

「因為戰後百事待興，但是內戰復起，財政負責加重，經濟復興緩慢。一方面官僚腐化，公營企業效率低，經營不善，其獨佔利益不是充當軍費，就是被貪官污吏橫斂。當局只好依靠銀行所發鈔票來彌補財政，物質供應欠缺，通貨開始膨脹。一九四六年一年之間，台北市物價上漲二·五倍，一九四七年二月則僅在一個月中就上漲百分之六十一，怨聲載道，民不聊生，二·二八民變終於發生了。」（註4）

認為沒有通貨膨脹的看法，有國民黨官方言論和後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西方學者。例如陳儀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記者招待會上說：

「一般人均以為本省通貨膨脹，實者不然。（查民國廿六年即一九三七）本省紙幣之發行額為三萬萬元台幣，今以物價指數漲一百倍而言，倘若現在的工業情形已恢復至廿六年（一九三七年）之程度，則必須有三百萬萬元台幣方夠應用，但現在台幣發行額，卻只有五十三、四萬萬元。足見通貨並不膨脹。而且此後尚須視工商業進展的程度，而增加台幣之發行。」

這種官方的發言和資料，可能是西方學者根據經濟因素以做出對「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不重要的結論。

根據個人的經驗和當時報紙的報導，絕對沒有接受這種結論的可能。相反的，我們認為當時的經濟因素對「二·二八」的發生有決定性的作用，雖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這種官方的數字資料和實際生活的體驗的矛盾如何來解釋？個人的經驗和報紙的報導容易失之於個別、特例和地方性的範圍，而官方資料的可信度又有待鑑別，很多重要的數據又缺漏不全，不利於了解台灣當時的經濟的真相。是不是官方的資料完全不可信？在沒有更可靠的資料之前，我們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參考這些資料，從歷史發展的前因後果旁徵引證。不只是經濟因素，還要對當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加以分析解釋，才能有比較全面的看法。

日本在台灣統治五十年（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五年），對殖民地化台灣有一些成就，台灣的經濟發展對日本的依賴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總的策略下是成功的。台灣的工業品和大部份非農產品的日用品都是來自日本。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鑑於南進的需要，日本才在台灣發展了戰爭工業如紡織、水泥等。一般說來，台灣的經濟並沒有如其他殖民地地區一樣被壓榨吸乾以至使當地的經濟變成枯萎和矮化發展或不發展。這一點並不是日本對台政策高明之處，而是跟台灣的社會結構以及特殊的小農經濟條件有

很深的關係，使日本在它殖民化台灣所施行的一些政策上不能為所欲為，是台灣社會特殊的內部結構上的一種反殖民主義的內因。國民黨接管台灣之後，一方面繼承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和戰時體制，另一方面却破壞了台灣在過去經濟發展的內在因素。這是造成台灣經濟崩潰的重要因素，我們對這一些要進一步探討分析。

最後我們的結論要指出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在那一段非常時期所產生的破壞性和對台灣資源的掠奪，的確是如眾所知的「空前」。而「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一方面是對國民黨在政治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壓迫的反抗，另一方面經濟生活的惡劣情況，有其決定性的作用。

二、日本統治台灣的經濟政策：養雞生蛋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在台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下，國家機器干預台灣的生活幾乎涉及各方面，一切都在管制之下。在「工業日本」與「農業台灣」的原則下，台灣變成了日本工業原料的供應地和工業產品的推銷市場。台灣的農業以及農產品的加工業幾乎是台灣生產的全部活動。其中米、糖就佔生產的七十%以上。台灣的工業產品以及非農產品如牙刷、球鞋、西藥到肥料等都必需從日本進口。整個台灣的經濟是一種「出口導向」的政策，由出口農產品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五的十年間，出口增長了三倍半，台灣的生產總值增加將近四倍（註4）。從表一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每年進出口、貿易收支一直是順差，這是表示台灣生產剩餘大量被日本榨吸的現象。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之後，台灣的進口才有一些工業設備。除了糖業之外，紡織、肥料、水泥、紙業、鋁業、鋼鐵、機械、造船、煉油、電力等工業才開始發展，其資本九成以上都是日本籍壟斷資本。在新興的工業中，台灣本地資本只能

（表一）日據時期貿易與總生產之動向

單位：百萬日元%

年	總生產(%)	出口(%)	進口(%)	順差
1915	140(100)	76(100)	53(100)	23
1920	422(301)	216(284)	172(325)	44
1925	558(399)	263(346)	186(351)	77
1930	550(393)	241(317)	168(317)	73
1935	710(507)	351(462)	263(496)	88
1939	1243(888)	593(780)	408(770)	185

引自劉進慶「從中樞衛星關係……」一文

投資在食品、碾米業部門。一九三九年之後，米的輸出控制在日本總督府手中，以低於市價三·二九%到二四·九四%收購，迫使台灣的生產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產米耕地面積減少了一半。產糖耕地面積則增加了約一成。

台灣的農業產品主要是以米的生產為中心在發展的。米中尤其是蓬萊米的輸出及其價格的昇降影響了再來米和糖的生產。米的生產量到一九三八年達到了這段時期的高峯（一三八萬噸）。當時人口的市場需要量大約是二一八、〇〇〇公噸（註5）。每年剩餘米量超過台灣需要量的三至五倍。所以當時有台灣「生產一年吃三年」之說。在二次大戰的最後一年，由於受戰爭動員的影響，日本大量徵購軍糧，肥料缺乏，加上盟軍的轟炸，一九四五年才下降到不足的現象。但由於歷年的剩餘，民間米需要量尚能自足；雖然工業生產曾一度處於停頓狀態。在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在台灣是施行一種戰爭時期的特殊體制。由於農村的勞動力被徵調兵役，生產略有下跌狀態。日本更藉口戰爭的需要，一方面通過台灣的農會組織以低價收購稻米，另一方面又限制物價，實行米的配給。雖然如此，台灣米的產量並沒有顯著的下降（見表二）。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初始便從改變台灣的生產關係著手，進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整頓各種社會經濟機構，長期的建設和擴張生產的基層結構如鐵路、公路、港口、水壩、水渠等，奠下

(表二) 台灣各類生產產量及指數(1937-1945年)

價值單位：舊台幣千元

年	稻			米			糖			茶		
	產量(公頃)	價值	指數	產量(公頃)	價值	指數	產量(公頃)	價值	指數	產量(公頃)	價值	指數
1937年	1,304,438	208,762	100.00	1,007,532	191,834	100.00	12,932	10,285	100.00			
1938年	1,387,950	222,127	106.40	990,160	188,526	98.28	13,122	10,420	101.31			
1939年	1,293,932	207,080	99.19	1,418,731	207,126	107.97	14,030	11,158	108.49			
1940年	1,116,933	178,753	85.63	1,132,768	215,679	112.43	11,685	9,293	90.36			
1941年	1,186,670	189,914	90.97	814,630	155,105	80.85	11,500	9,146	88.93			
1942年	1,161,499	185,886	89.04	1,101,752	209,773	109.35	11,585	9,213	89.58			
1943年	1,116,716	178,719	85.61	1,041,450	198,292	103.37	7,920	6,299	61.24			
1944年	1,060,476	169,718	81.30	892,290	169,892	88.56	4,282	3,405	33.11			
1945年	638,828	102,238	49.97	327,200	62,298	32.48	1,430	1,137	11.06			

年	樟			腦			肥			料			發 電 量		
	產量(公斤)	價值	指數	產量(公噸)	價值	指數	產量(公噸)	價值	指數	產量100 KWH	價值	指數	產量100 KWH	價值	指數
1937年	572,145	1,259	100.00	30,897	1,573	100.00	579,385	25,492	100.00						
1938年	590,351	1,298	103.23	27,220	1,436	91.31	695,558	30,604	120.05						
1939年	568,896	1,251	99.39	34,858	1,903	121.03	819,534	36,059	141.45						
1940年	633,216	1,398	110.62	33,205	1,805	116.06	832,550	36,632	143.70						
1941年	316,336	605	55.26	30,120	1,720	109.36	1,032,545	45,431	178.21						
1942年	36,378	80	6.36	28,240	1,565	99.50	1,099,414	48,374	189.76						
1943年	217,681	478	38.03	34,466	1,595	101.45	1,189,097	52,320	205.23						
1944年	78,212	172	13.63	8,403	382	24.34	1,046,548	46,048	180.63						
1945年	62,418	137	10.91	400	18	1.15	354,926	15,616	61.26						

資料來源：夏成：論發行、物價與生產，財政經濟月刊第1卷第8期

了台灣農業和出口農產品的經濟基礎。台灣的資本主義的萌芽自明代末期開始到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接收時期，經濟基礎以及相應的社會、文化的資本主義化比中國大陸的社會還要深入和普遍。戰爭固然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對生產關係如僱傭制度、商品分配和土地所有關係却不是戰爭所能摧毀的。因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日本等在已經有的資本關係和基本管理的基礎上，可以很快恢復資本主義的生產。台灣、南朝鮮、新加坡等地區在六〇年代的新興，所以能在短期間內進入美、日為中心的國際分工中參與出口加工的資本主義生產，跟過去奠下的基礎有極大的關係。韓戰和越戰提供

了這些地區一定的美國資本和市場，更促進了這種關係的發展。日本統治台灣的經濟政策就是以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的「出口導向」政策，在日本大量剝削之餘，台灣的生產還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到一九四五年，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程度比之尚處在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中國大陸社會「進步」多了。國民黨接管台灣之後的各種矛盾中，對兩種生產關係的矛盾以及相應的在意識形態和文化教育的程度所產生的矛盾（後來被人歸之為「省籍矛盾」）的比較和研究，到目前還有待進行。當時由大陸來台人士所顯示出來的「無知」和「靈活」，都反應了這種矛盾，並說明了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

三、戰後初期國民黨的經濟政策：殺雞取卵

有些學者常把「二·二八」事件的經濟因素歸之於「惡性通貨膨脹」。台灣在「二·二八」前夕的經濟是不是這種情況？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這段期間，有些經濟學家稱之為「混亂期」。從表面的統計資料來看，台北市的躉售物價指數膨脹了一一八·四倍。台幣跟隨著中國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的法幣的比率猛烈上昇。台幣對法幣的比率不斷的調整，及至一九四八年十月法幣崩潰，不得不改發金圓券。台幣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也崩潰，改換新台幣以四萬比一兌換舊台幣。所謂「通貨膨脹」是指紙幣發行量超過實際需要的商品所引起的貨幣貶值的現象。紙幣是一種國家強制通行的價值符號，如果鈔票印發太多，超過了商品流通所需的數量，鈔票就會貶值，物價就會上漲。通常通貨膨脹的結果，物價上漲，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就會下降，生活日益困苦。資本家乘機囤積商品，投機倒把，藉此斂財。物價上漲的結果，一方面會削弱消費者的購買力，另一方面會使資本家為了追逐高物價所帶來的高利潤而增加投

資，盲目擴大生產。如果消費和生產之間的矛盾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促使通貨膨脹加劇，陷入惡性循環的情況，稱為「惡性」通貨膨脹。

「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經濟被稱為「惡性通貨膨脹」是一種錯誤的觀念。雖然當時台灣市面上的物價上漲，市面不景氣，台幣貶值，商人乘機投機倒把，囤積糧食，但主要是由於物質嚴重缺乏，而不是由於生產過剩。貨物流通不暢，台幣貶值，不是由於發行量過多（事實上是過少），而是由於大陸法幣無控制的發行，不合理的兌換率，政府的大量赤字開銷，無控制的信貸等因素所造成的。真正的「惡性通貨膨脹」是發生在「二·二八」之後，而不是「二·二八」前夕。一九四五年十月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後，基本上承繼了日本戰時的經濟體制。但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在殖民主義化台灣的過程中，台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了很大的改變。台灣在矮化發展中，被日本大量剝削之餘，尚能有一定的發展。台灣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比之同時的中國大陸更為資本主義化，工業化和生活水平高出中國大陸很多倍。當時中國的生產關係尚處於「半封建」的狀態，生產力也很低落。台灣的資源和生產對國民黨接收官員來說是喜見的天堂，對國民黨打內戰似乎是一個取之不絕、用之不盡的寶庫。一方面維持日本的戰時殖民體制，對米、糖等物質放手劫收；一方面打破了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的相對獨立性，捲入了中國大陸的通貨膨脹之中。國民黨到底用什麼經濟和超經濟的手段對台灣進行掠奪和摧殘，以至於以台灣當時的富庶程度，在短短的十六個月之間使台灣變得民不聊生、日有餓殍，不得不起而反抗的地步？對這些現象進一層的分析，對了解「二·二八」前夕台灣經濟的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一）台幣和法幣——台灣的貨幣和信貸政策和赤字預算

陳儀的行政長官公署初到台灣初期台灣民間的流通貨幣，是法

幣和繼續發行戰時日本的台灣銀行的銀行券和銀行本票，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才以新發行的（舊）台幣收兌銀行券。當時只有五十元和一〇〇元兩種舊台幣。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才發行五百元券和一千元券。十二月一日再發行一萬元券（見表三）。光是從台幣發行量來說，有如陳儀所說的，確實是對當時台

（表三）台灣銀行舊台幣發行額（1946年5月至1949年6月）單位：舊台幣百萬元

日	期	發行額	指數	定額本票發行額
1946年	5月18日	2,943	100	—
	12月31日	5,330	181	—
1947年	12月	17,133	582	—
1948年	12月	142,040	4,825	78,696
1949年	6月14日	527,033	17,902	1,213,580

資料來源：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之金融史料，第3頁，表2。

灣的商品流通而言是不夠而不是太多。但是在市面流通的除了台幣之外，尚有法幣和台灣銀行定額本票。其確實數量由於資料缺乏無法估計，但以定額本票而言，其數量加上法幣，必然大為超過台幣發行的數量。這可以由政府的開銷和對公家機關的放款推算出來（見表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台灣放款總額為舊台幣十九億二千

（表四）全體銀行對象別放款總額 單位：舊台幣百萬元

年	月	同業		生產事業		運銷事業		公用交通事業		公務機關		其他		合計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1947年	6月	2,524	13.8	7,389	40.5	2,346	12.9	1,317	7.2	3,655	20.1	1,001	5.5	18,235
	12月	4,202	10.7	17,545	44.8	2,684	6.9	5,944	15.2	7,524	19.2	1,259	3.2	39,160
1948年	6月	9,006	10.3	43,429	49.7	5,960	6.8	12,269	14.0	14,419	16.5	2,441	2.7	87,527
	12月	212,405	48.9	86,144	19.8	18,437	4.2	40,796	9.4	66,364	15.3	10,399	2.4	434,547

資料來源：同表2-6，第33頁，表25。

註：放款總額係台灣銀行、土地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等五家銀行放款合計數。

二百萬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二八」前夕）已增到八十一億八千多萬元。到一九四七年底增到三百九十一億六十四多萬元。

政府墊借款有記錄的到一九四七年底墊借舊台幣二十億元（見表五）。稅收總數為八十二億八千九百萬元。政府開銷是赤字（數目不詳），其款項有些是以台灣銀行本票墊付，有些則是無償「調用」。

（表五）代理省庫收支 單位：舊台幣千元

年	月	收入總門			存款特門		
		小計	稅乘收入	其他收入	小計	銀行盤借款	其他收入
		1947年	1月	1,021	88	933	166,484
	2月	-71	135	-206	268,946	-	268,946
	3月	1,053,871	372	1,053,499	-54,851	-	-54,851
	4月	-53,379	349	-53,728	482,474	500,000	-17,526
	5月	3,488	980	2,508	22,146	-	22,146
	6月	29,473	27,722	1,751	148,985	-	148,985
	7月	40,808	40,794	14	541,891	500,000	41,891
	8月	73,508	73,502	6	61,261	-	61,261
	9月	54,183	54,181	2	40,368	-	40,368
	10月	18,378	14,912	3,466	126,755	-	126,755
	11月	90,715	83,217	7,498	447,923	500,000	-52,077
	12月	18,662	18,438	224	180,039	500,000	680,039

資料來源：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金融年報（1947-52），表58。

一九四六年六月台幣與法幣的對匯率是官定一比三〇。此後由於大陸法幣繼續貶值，每月有所調整，到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的官定台幣對法幣的匯率是一比三五。相對時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台北的躉售物價指數是一二，五五五，上海是六八一，五六三，其比率是一比五四。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台北是二七，二七六比上海的一，三八六，五九三，大約一比五〇（見表六）。從比率上看似乎台幣與法幣的比率是相對的貶值。以台幣作為一種獨立的貨幣，相對浮動應該不會使中國大陸的通貨膨脹嫁禍到台灣。其實不然，問題出在出發點的對比上已減少了將近一半躉售物價指數來進行對比，其後的浮動也使台幣在實際上受到了幾何級數的貶值。尤其是當時的台灣非農產品主要通過上海輸入，樣樣

（表六）台北市躉售物價指數

上海市躉售物價指數
基期：1937年1-6月=100

年	月	台北市躉售物價指數	上海躉售物價指數
1946年	11月	11,164	
	12月	12,555	681,563
1947年	1月	16,195	
	2月	24,427	
	3月	27,276	1,386,593
	4月	29,123	
	5月	32,555	
	6月	35,064	2,905,700
	7月	38,233	
	8月	43,632	
	9月	51,750	4,635,700
	10月	71,142	
	11月	85,063	10,063,000
	12月	97,462	
1948年	1月	103,959	
	2月	121,302	
	3月	139,193	32,576,900
	4月	144,307	
	5月	147,210	
	6月	154,542	197,690,000
	7月	190,700	
	8月	229,239	558,900,000
	9月	284,133	(8月19日)
	10月	589,756	
	11月	1,221,358	
	12月	1,111,364	
1949年	1月	1,514,073	
	2月	2,251,092	
	3月	3,012,997	
	4月	4,560,906	
	5月	9,213,654	
	6月	13,214,952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主計處編：台灣省物價統計月報（1959年12月）第36-41頁。

上海根據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1958, P.71

商品價格又必然較高。就匯率上每進出口貿易，台幣每元就損失八十%。當時台灣對大陸的進出口總額是三十五億五千五百萬元舊台幣到五百四十一億七千九百萬元之間，十六個月之內約損失四十幾億元以上。不僅如此，在長官公署的控制台灣物價上，故意抬高台灣本土的的產品價格以減少市面的消費量。例如米一擔在上海賣二千元台幣，台灣要賣四千元；一斤鹽在上海是賣六元台幣，在台灣要十五元台幣。這些都是有數目可據的公開剝削和掠奪。其間國民黨藉口內戰的需要，任意限制物價，無償借調物資，派糧食徵購隊到農村以低價徵購糧食，其中以米、糖為最多。

(二)台灣的米和糖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中間，台北市民間組成的處理委員會曾提出「卅二條」改革方案，其中除要求台灣人的平等權利，保證個人和財產的安全，經濟政策和機關的改革，停止軍警亂逮捕人民之外，還提出要求償付運輸到中國大陸的米糖的價錢。（當時在大陸的行政院曾調用了民間大量的米糖，其中米有十五萬噸沒有償付。（註6）

我們從（表二）可以看到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之間的戰爭時期，台灣的米、糖、肥料、茶、樟腦等農產品一直保持相當高的生產量。在戰爭的最後一年，由於盟軍轟炸、肥料生產停頓，到一九四五年才有顯著的下降（註7）。就米和糖主要的輸出以及民生的農產品來看，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生產都有大量的剩餘。米的價格當時約舊台幣一六〇元一噸（市價約〇·三元一斤）。一方面當然是由於日本當局嚴加控制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歷年的剩餘積累所造成的低糧價。一九四五年之後米、糖等農產品的生產量很快就恢復了。到「二·二八」的前夕，米糖的產量幾乎恢復到戰爭破壞前的水平（見表七）（註8）。除了當時人口的必需消費量之外，尚有剩餘。可是當時在台灣却有「米荒」，米價一漲再漲。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每斤米價高達四十多元台幣。當時每人的平均貨幣年供給量約一七二〇元舊台幣（註9）只夠購買四十斤米。國民黨強制施行配給政策，每人每日配米八兩，只夠做一頓飯。而當時的六十二軍陳儀的官兵以及行政人員，每人每日的配米是二十五兩。根據當時的報紙，每日都有人餓死以及因缺糧食而自殺的新聞。一般平民收入很低，無力購買米，就是有錢也買不到的民不聊生的情況下，國民黨的行政人員以及軍隊却享受到在大陸所未能享受到的豐衣足食的待遇！這種慘況除了用「殘酷掠奪」四字之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解釋？「米荒」是國民黨一手造成的「缺乏」，而不是由於「通貨膨脹」。當時的私下交易，米價比之公定價格還低。米價是故意抬高以減少市面的銷售。國民黨通過農會大量調動米糖，轉賣到大陸營利。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間對大陸出口總

（表七）光復初期重要產物生產量

年	稻米 (公噸)	茶 (公噸)	香蕉 (千公擔)	發電量 (100KWH)	煤 (千公噸)
1945年	638,828	1,430	322	354,926	795
1946年	894,021	2,919	534	468,350	1,053
1947年	999,012	7,444	1,244	571,392	1,325
1948年	1,068,421	8,452	1,104	840,473	1,662
1949年	1,214,523	10,184	1,984	850,297	1,557
1950年	1,421,485	10,674	1,189	1,035,270	1,405

資料來源：同表2

（表八）台灣進出口貨物價值統計

單位：舊台幣百萬元

年	進出口總值		進 口		出 口	
	對大陸	對外國	對大陸	對外國	對大陸	對外國
1946年	3,555 (94%)	211 (6%)	1,046	38	2,308	173
1947年	54,179 (93%)	5,461 (7%)	20,738	2,758	33,441	2,702
1948年	357,882 (96%)	55,898 (4%)	170,761	16,751	187,120	39,147

資料來源：同表2第149頁。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主計處編：台灣貿易五十三年表。

值是三百五十七億元台幣，其中以米糖為主。對大陸進口約二百一十七億元台幣，其中以非農產品為主（見表八）。如以法幣償付，單是與台幣對匯率上一進一出，台灣就受到四百六十億元台幣的不等價交換的損失。

(三)國民黨萬萬稅

一九四六年台灣的總收入是二八·〇八億元，一九四七年總收入是八二·八九億元。

一九四七年課稅收入是驚人的高，約四一·二億元台幣，佔總收入的一半（註10），其他非課稅收入部份主要並不是來自「專賣」壟斷利潤、稅收和向銀行無息「墊借」。專賣局報帳是虧損的。根據當年「代理省庫收支」（見表五）的報表，實際課稅收入入帳的，一九四七年只有一三·三億元，向銀行借款廿億元，其餘約八億元沒有著落。以課稅的主要項目來看（見表九），一九四七

（表九）台灣省各年度主要稅收實徵數 單位：舊台幣百萬元

年	總計	所得稅	土地稅	貨物稅	戶稅	屠宰稅
1945年	1,828	43	1,449	65	112	37
1946年	8,212	299	4,255	905	844	296
1947年	60,575	5,057	27,513	6,718	2,445	3,371
1948年	83	4	30	8	3	7
1949年	474	44	81	15	7	27
1950年	815	139	101	73	60	64
1951年	1,427	261	141	109	88	115

資料來源：關吉玉主編：台灣經濟輯要（經濟研究社台灣分社 1953年11月出版），第164-165頁。

年光是各種所得稅、土地稅、貨物稅、戶稅、和屠宰稅總計已超過八·二億舊台幣。其他還有「戶口稅」，最爲人民所厭惡（大陸沒有此稅）。當時由日本留下來的比較大規模的企業都在「接收」的名義下歸之「國營」，共有二三七家。其中有農、林、工礦、藥

物、交通、煙、酒、樟腦、火柴、糧食、石油、鋁、貿易等國營企業，國省營有糖、水泥、肥料、鹼、電力、機械、紙等企業。其中專賣和貿易榨取最兇。可是專賣局每年却報大量虧損。台灣在日據時期凡是出口營利部門如樟腦、硫酸、鹼、米、鹽、糖、鳳梨、碳、硫胺、鋁、煤油、水泥、漁產、木材、紙等幾乎全歸貿易局統制。一九四七年的食鹽產量有廿萬噸，收購價格每噸爲一萬一千元台幣，售出價格每噸爲七萬六千元台幣。貿易局轉手之間每噸便有淨利六萬五千元，一年至少有一三〇億元台幣的營利（在上海的市價是每斤六元台幣，在台灣每斤十五元）。糖輸出大陸的數量沒有數據，但台糖以低於蔗農的成本收購、徵購、調用的情況下，使台灣的白糖市價從一九四五年的一噸一九〇元舊台幣漲到「二·二八」前夕高達每斤七十元舊台幣。當時上海的糖價是每斤一三〇元台幣。膠鞋一雙在台灣一一〇〇元台幣，在上海是三〇〇元台幣。米一擔在上海是二〇〇〇元，在台灣是四〇〇〇元。豬肉在上海六十元，台北一二〇元。必須指出，根據當時的物價指數，上海是台灣的四倍。

(四)國民黨的財政透支

自一九四五年陳儀佔領台灣之後，由於一方面要養大量駐軍和「公務人員」，另一方面又要達成大陸準備打內戰之用，一部份開銷都必須從台灣籌出。一九四六年由於百業有待恢復，稅課收入只有五·五億元台幣，其餘不足部份便仰賴向銀行借墊。台灣銀行除發行台幣之外，其餘就是發行「銀行本票」。一九四六年的歲入總數是廿八億元台幣，除稅收之外尚有二二·六億元就是用這種本票來支付（一九四七年政府透支廿億台幣）。除此之外，尚有透支部份，其數無帳可查。到一九四六年度，舊台幣的發行額只有五三·四億元。這種「本票」雖然在當時沒有公開在市面上流通，到一九四八年公開在市面上流通的已有七八七億元台幣（見表三）。

除了有帳可查的政府透支部份，當時大陸來的官僚貪污之風盛行。除無償劫佔民間私產之外，每日報紙多有貪污舞弊的案件被揭發。但是在官官相護的中國封建官僚系統下，貪風日盛。但這還是零頭部份，對當時經濟上的影響只是滄海一粟。嚴重的是國民黨對公營企業的不善或不曾經營，而這些公營企業又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在肆意摧殘之下，台灣經濟到一九四八年之後終於完全崩潰。結帳：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台灣對大陸進出的台幣對換法幣之損失是四六〇億元台幣，歲入總收入（包括稅收）一共是一一億元台幣。僅此二項在這段期間總共五七一億台幣，就是從台灣榨取出來的有記錄可查的大數目。戰後的台灣在這種掠奪之下，那有可能不怨聲載道，被逼上梁山。加上政治的腐敗和高壓，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終於「二·二八」事件發生了。

四、結論

從上面我們的分析，「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經濟並不是所謂由於生產過剩、貨幣發行多於商品而引起的「通貨膨脹」，主要是在國民黨劫收之下恣意掠奪所產生的物質缺乏和無控制的政府透支和借墊。大陸的通貨膨脹對台灣的非農產品的價格有很大的影響，但對民生所需的農產品並沒有直接的影響。由於法幣和台幣不合理的兌匯率，在一定程度上使台幣貶值，但是流通的停滯是由於民間的台幣數量太少而不是過多（當時的失業率也很高）。物價的上昇是由國民黨的操縱和掠奪所產生的供應不足，而不是由於生產量低落和減少。在短短的十六個月間把台灣從一個高產量、豐衣足食、年有餘額發展的經濟，摧殘到民不聊生、日有餓殍的慘況。這是「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台灣經濟，對事件的發生有決定性的影響。不是唯一的因素。我們針對這個時期的國民黨經濟政策提

出下面幾點結論：

(一)對日本殖民地經濟保持台灣經濟發展的正面因素的破壞。

日本對台灣的經濟剝削是大量的，有計劃的鼓勵生產和發展農業，是一種養雞生蛋的政策。台灣的經濟是一種畸形的矮化發展，但確有發展。以一九四五年的台灣社會經濟生產關係而言，其資本主義化的程度較之大陸優越，一般人民的知識、文化、教育水平也遠比大陸人民為高。對現代企業的經營和管理的經驗比之半封建的大陸統治者更為豐富。及一九四五年「光復」之後，由於肆意掠奪，不善經營，對已經存在的經濟內部結構加以破壞和摧殘。小農生產是日據時期台灣主要的生產關係。日本的壟斷資本的糖廠所需的甘蔗生產主要是依靠佃農而不是「會社」。在國民黨的劫收政策下，這種關係被破壞了。米糖的外銷不僅是台灣經濟的重要收入，也是刺激其他各種生產的主要因素。在「國有」貿易局的控制下，正面的因素變成了負面，成為國民黨對台灣農民的吸血管道。

(二)「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台灣經濟危機不是「惡性」通貨膨脹，而是國民黨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政策所產生的物質缺乏。

真正的「惡性」通貨膨脹是在「二·二八」之後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之間發生的。台灣經濟危機的產生不是來自經濟因素而是超經濟因素。國民黨雖然承繼了日本的「戰時體制」，但却不僅沒有安定生產，而且還引起社會恐慌。封建統治政策比之日本殖民地資本主義政策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窒息、停滯和破壞的作用。

(三)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掠奪就有反掠奪，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後，在短短十六個月間把台灣在戰後有待復原的經濟橫加摧殘掠奪。「二·二八」事變的起因，經濟惡化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日本殖民主義「養雞生蛋」做長期剝削的打算，而國民黨却採取「殺雞取卵」短期性的蝗蟲過境式的洗劫。在制度

上沿用了日本對殖民地的戰時體制，可是又不了解如何進行殖民地統治，其後果必然會產生全民反抗。任何新的外來政權如果不能在作為上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以當地人民為主體，改善人民的生活，發展當地的優點和正面因素，反而橫加破壞，則某種形式的「二·二八」事變必然會產生。這不是歷史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種必然性，也不限於台灣這個特殊地區。此外，也是統治當局台灣與中國隔離五十年的歷史所帶來的獨特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態「不了解」的結果。這些因素當然增加事件發生的概然率。但是反抗的行動即使因為特殊的條件或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却是必然的、普遍的。有人說「二·二八」是國民黨對台灣的特殊性「不了解」才會發生。如果了解了台灣社會的特殊性，必然可以避免同樣事件的發生和再發生。這是逃避責任和否認錯誤的遁詞。「隔閡論」是把殊相無限上綱，排除了共相。沒有共相和殊相的統一，就沒有科學。做為一個台灣社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謹以西方哲學家森塔亞那的名言「忘記歷史，就註定要重蹈歷史」，在「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的今天與大家一起共勉和警惕。

【註解】

註1：見劉進慶：(1)「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第一章（東京大學出版，一九七五）。

劉進慶：(2)「戰後台灣經濟的發展過程」。

劉進慶：(3)「從中樞衛星關係的觀點看台灣政治經濟的演變和展望」「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

註2：THOMAS B.GOLD：「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EAST GATE BOOK,1986 GEORGE H.KERR：「FORMOSA BETRAYED」，RIVERSIDE PRESS, 1965 JEH-HANG LAI,RAMON H.MYERS, WOU WEI：「FOURTEEN DAYS AND FOURTEEN YEARS：A STUDY OF FEBRUARY 28, 1947 INCIDENT IN TAIWAN」，HOOVER INSTITUTION 準備出版中。

註3：潘志奇：「光復初期台灣通貨膨脹的分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〇。

註4：見劉進慶「註1」之(3)。

註5：台灣人以米食為主，蕃薯為副。

台灣稻米的生產與肥料的生產量和輸入量有很大的關係。米有蓬萊米和在來米，前者主要輸出日本，在來米是台灣人的主食。台灣由於水壩、水渠的基層建設好，大部份耕地都是水田；所需肥料以氰化鉀之類的化肥為主，而台灣生產的化肥以尿素為主。前者必需從日本輸入，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後者主要是旱田的化肥。蕃薯生產則需肥量少，因此只要水灌溉沒有問題，氣候適宜，產量很多。因此在米產量下降時，台灣人常以蕃薯為補救食糧，但此食物止饑不能持久。在國民黨的米糧配給制度下，每人配給到的僅是需要量的一半，但是由於米商（主要是米碾業）的囤積，仍常有排隊還是購買不到的現象。

註6：見 GEORGE H.KERR：「FORMOSA BETRAYED」，附錄。

註7：肥料生產是農業產品增產的決定性因素。由於國民黨不了解

這種簡單的生產常識，戰後台灣由日本所留下來的肥料工廠（尿素、硫酸等）生產一直停頓。當時中國幾乎沒有化肥的生產，台灣也沒有化肥進口。台灣農業由於缺少化肥，生產恢復緩慢。

註8：根據 STATESMAN'S YEARBOOK 1949 年的統計數目，台灣的稻米產量比國民黨所給的數目高出甚多。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台灣稻米的年產量有一四四萬五千四百公噸，台灣官方的資料是九五萬公噸，相差四九萬公噸。

註9：見「註3」潘志奇著作五七頁。

註10：見林霖著：「中國經濟之出路：認真收稅與平衡預算問題」，第二一三頁，稅務月刊社，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本文發表于「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紐約，一九八七年三月

歷史傷痕四十年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

■ 撰文／陳玉璽

區別羣衆暴動與改革運動

發生於四十年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從一般民衆的觀點來看，是一場訴諸暴力的羣衆抗議運動。但從與事的台灣知識份子和處理善後的本土民間領袖的觀點來看，則是一場民主改革運動，甚至是革命運動。這場改革運動與許多國家的改革運動不同——並不是精英階層倡議改革的行動帶動羣衆的抗議風潮，而是羣衆暴動的聲勢激勵了民間領袖去提出改革方案，企圖利用羣衆運動的餘威，迫使戰後接管台灣的國府行政當局改弦更張，以期改變黑暗腐敗的社會政治現狀，實行台灣的民主自治。正是由於這種暴動先行、改革隨後的特點，當局打擊報復的矛頭，不但對準了羣衆的抗議運動，也對準了倡議改革的民間領袖和知識份子。結果，在成千上萬民衆慘遭屠殺的同時，效忠國府的大批本土精英份子，也紛紛被捕、遇害、全島精華，付之一炬。

區分二·二八事件中的羣衆抗議運動與知識階層及精英階層的改革運動這兩層概念，對於探討該事件的社會及政治後果，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如果只是單純的羣衆暴動，其後果可能僅限於生命財產的損失，但改革運動及倡議改革者的被撲滅，則可能對長期的社會、政治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光復初期無和平抗議運動

台灣光復初期，在政治上，貪污腐敗的情況十分嚴重，且來台接收的大陸人員佔據了絕大部份的政府公職（註1），本省人才受到排斥；在經濟上，陳儀集團對台灣的財富資源進行大規模的巧取豪奪，加上經營管理無方，造成了生產劇降、民生凋蔽的蕭條境況；在社會上，部份來台接收的官員和軍隊，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驕橫傲慢，目無法紀，軍警人員持槍威脅百姓、魚肉良民的事件層出不窮。這些污黑的現狀，使得台灣民衆盼望光復、回歸祖國的熱情，在極短時間內變成心灰意冷；民衆的憤怒，在全島各地埋下了暴動的火種。

研究光復初期的台灣歷史，我們驚異地發現：儘管在一九四五年終戰以前，抗議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社會運動曾持續達二十年之久，然而面對光復後比殖民統治更令台民失望和不滿的社會現狀，台灣的知識階層和精英階層竟沒有發起任何類似的非暴力抗議運動。如果說「光復」意味著台灣人民從日本殖民者的高壓統治下解放出來，那麼台灣知識份子應該擁有比日據時代更大的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才對。但實際情形是，從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光復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為止，台灣社會沒有發生過一次和平示威抗議活動，沒有舉行過類似從前文化協會的演講會，也沒有人帶頭向陳儀當局或南京國民政府請願、訴求改革（註2）。當時的台灣省參議會雖曾在職權範圍內，針對行政專制、軍紀不良、官吏貪污、省籍歧視、治安日壞、糧荒嚴重等問題提出質詢，並通過一些提案（註3），但在陳儀一手控制行政、立法、司法的專制局面下，參議員的質詢和提案，只不過徒具形式而已，並沒有產生任何振衰起敝的制衡效果，亦未能化解日益嚴重的政治危機與社會暗流（註4）。

爲什麼台灣光復後，非暴力的抗議運動反而銷聲匿跡呢？這一方面是因爲國民黨政權的反革命專制性格，不能容許民間對政府的批評、抗議；何況陳儀當局認爲台灣之所以能掙脫異族的殖民統治，是祖國浴血抗戰八年的結果，期望台灣人民感恩戴德，是當時接收大員們的共同心態；民間如果敢於發出抗議的聲音，必然被視叛逆；而當年抗日的活躍份子，均被列入黑名單，受到監視。另一方面，台灣民衆經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戰爭的痛苦歲月後，大多數人都嚮往回歸祖國，對國民政府產生效忠認同的感情；加上本地民間領袖和從大陸回台的所謂「半山」份子，在社會上發起學國語、唱國歌，慶祝光復等各種活動，灌輸忠黨愛國的思想，對國府及其領袖蔣介石、甚至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歌功頌德，蔚爲一時的風氣。

民主改革運動導致鎮壓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民衆敢怒而不敢言，和平的抗議運動發動不起來，民怨沒有紓解的管道，日積月累，最後終於導至全面性的大暴動。本來懾於陳儀專制統治的本省民間領袖，在二·二八事件後，看到民氣可用，遂乘勢提出改革要求。首先，他們於事變後兩天，即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草擬政治改革綱領，請求當局該採納。委員會的組織大綱第一條便指出該會「以團結全省人民，處理二·八事件及改革台灣省政治爲宗旨」。其政治改革綱領包括：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各處（包括警務處）處長應以本省人充任；公營事業歸由本省人負責經營；立刻實施縣市長民選；撤銷專賣制度；保障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及生命財產安全等。誠如歷史學者李筱峯所指出的：「以民意代表爲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從一個原本

只在平息事件、料理善後的臨時組織，發展成一個推展政治改革運動的團體。」（註5）同時，全省各地以縣市參議會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分會亦相繼成立，紛紛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註6）。

同年三月六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指出：「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並呼籲「關心國家的各省同胞」給予支持，「爭取這次鬥爭的勝利」。由此可以看出，這個由林獻堂等眾多本土精英所組成的委員會，不但敢於倡議政治改革，而且把二·二八事件的羣眾暴力抗議運動視為一個改革運動。三月七日，該委員會公佈「處理大綱」三十二條，其根本精神在於廢除行政長官陳儀的專制政治、撤銷警備司令部、實行全面自治、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權利，而且主張軍事、政治、經濟大權均應掌握在本省人手裡。

同時，左翼的「台灣民主同盟」也在社會上聲援「處理委員會」的主張，並呼籲「打倒分裂民族、歧視台胞的政策」、實行憲政自治、重用本省人才、健全司法獨立、取銷軍警暴政和保障七大自由，等等（註7）。

這種本土主義的民主改革主張，乃是對陳儀集團的封建獨裁統治及污黑現狀的大膽挑戰。但如果沒有二·二八大暴動，這些改革要求是不可能在大環境下提出來的。羣眾暴力抗議運動的激進本質，引發了部份精英份子的激進改革主張。惟其過於激進，卅二條「處理大綱」首先遭到了精英階層（處理委員會）內部妥協派的「放水」抵制，繼而引起陳儀和國民黨最高層的震怒，指控該會的要求「踰越地方政治範圍」、「演變為一非法團體，從事叛亂行為」、「跡近反叛祖國」（註8）。不到幾天工夫，該處理委員會即被陳儀下令解散；而從大陸開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第廿一師，除

了屠殺成千上萬的民衆以外，並處決了眾多主張改革的本地政界及知識文化界領導人物至少四十餘人，包括張七郎、林連宗、林茂生、王添灯、陳澄波等知名的本土俊傑，而被捕和被通緝的知名人士至少達六十餘人之多（註9）。因此，國民黨所鎮壓的，不僅是民衆的暴力抗爭，同時也是台灣精英及知識階層要求和平改革的勢力。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是四十年來台灣民主運動的首次大挫敗，對此後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反對運動的力量被削弱

如上所述，二·二八事件除了直接參與暴動的一般民衆外，還涉及知識階層和精英階層。精英階層主要包括政界民間領袖（大多數為中央及省級民意代表）和農村地主；知識階層主要是指醫生、教師、新聞從業人員，作家等城市中智羣，並包括一些左翼知識份子；而城市中智羣與地主階層又具有密切的家族關係。許多農村地主家庭成員和城市中智份子被控在二·二八事件中擔任煽動、動員或窩藏的角色，在三月大屠殺後，紛紛被捕和被處決。根據人類學者蓋茲（Hill, Gates）教授的研究，由於二·二八事件後的處決，農村地主及城市中產（智）階級被消滅了相當一部份（註10）。而搜捕二·二八涉案者的恐怖行動，一直繼續到五〇年代末期。其結果是台灣反對運動的社會動員力量大大地被削弱了，直到七〇年代後期工商中產階級和新一代中智羣興起以後，才得以恢復元氣。同時，中智羣和若干政界精英份子及地主份子，目睹改革無望，紛紛流亡海外，從事台獨革命運動。正如清廷鎮壓康梁變法，促使改革運動質變為革命運動一樣，陳儀與南京國民黨中央聯手撲滅台灣光復初期的本土改革勢力，直接導致了以推翻國民黨政權為目標的台獨運動的誕生和興起。

與懲處地主家庭成員相關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土地改革運動。晚近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均同意，國民政府之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撤退到台灣以後，立即著手土地改革，其政治的迫切性遠大於經濟的迫切性（註11）。根據陳誠在其「台灣土地改革」一書中的解釋，土改的原因是鑑於大陸失敗的教訓，政府必須防止農村動亂，以杜絕共產黨的滲透（註12）。陳誠沒有提到的是，農村地主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參與角色，使當局對這個游離於國民黨權力結構以外的前台灣社會支配階級深懷戒心，因此不能容忍地主勢力繼續存在而與統治權威分庭抗禮（註13）；另一方面，因實施土改而生活獲得改善的廣大農民，則可以成為安定農村和擁護政府的力量。由此觀之，二·二八事件無疑是促使農村地主階級最終瓦解的因素之一。在城市中產階級尚未興起以前，這個舊支配階級的瓦解，更進一步削弱了台灣反對運動的資源及動員力量。然而在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及地主階級的消滅，又是台灣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一部份重要過程。因此，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曾經促使國民黨當局全力撲滅反對運動在農村的根據地，那麼它也間接幫助建立了七〇年代以後反對運動在城市根據地。

就台灣民主改革的前途而言，損失更大的是具有改革理想的眾多本土政界領袖和知識份子。他們或被處決，或判重刑（許多人終生監禁於綠島），或自我流放於中國大陸和海外，使民主改革運動因失去知識的燭照和政治的領導而陷於停滯，直到七〇年代才又重新起步。我們只要省思一下，碩果僅存的李萬居、郭國基等人在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對民主政治所起的先驅作用，就可以想見，二·二八事件後陸續被殺、被關或自我流放的眾多本土精英，對台灣民主改革的事業而言，是多麼重要的一筆資產！這筆資產的損失，也就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損失。

事變導致台獨及長期戒嚴

研究台灣現代史，我們發現台灣的族羣關係（外省人與本地人的關係）一方面隨社會、政治的發展而演變，另一方面它又是影響社會、政治發展的一項重大變數。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從社會層面來看，是族羣關係的迅速惡化，而事件本身及事件後的大屠殺、大鎮壓，又進一步加深了族羣的裂痕，進一步破壞了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凝聚力，其對四十年來台灣社會和政治發展的負面影響，可分兩方面來說明：

第一，台獨分離意識及運動的出現，並不僅因為前述政治改革希望的幻滅，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感情的因素，亦即族羣的仇恨導致民族分裂的危機。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早期台獨人士的文章得到佐證：「『祖國』的同胞愛在哪裡？當時全島民情沸騰，終於爆發空前活劫的『二·二八』事變，而『中央』派來的蔣家援軍繼陳儀之後無情鐵蹄繼續殘殺，至此台灣歸附中國是幸福的期望完全幻滅。我們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使我們徹底醒悟要追求台灣人真正的自由與幸福，要自己的 IDENTITY（認同），只有自力建國，別無二途。『二·二八』可以說是台灣歷史的轉捩點。」（註14）

第二，族羣裂痕的擴大和台灣民衆對國民黨政權的離心意識，促使當局一方面採取若干收攬民心的改革措施（如土地改革、擴大本地人在地方上的參政權等），另一方面則加強控制，以防暴動重演和軍、政大權旁落本地人手裡。台灣戒嚴之所以持續長達卅七年之久，官方的說法是為防止共黨的滲透顛覆，然而台灣從五〇年代初到七〇年代末，一直仰賴美國軍事保護，固若金湯；台灣社會所發生的幾次動亂事件，從一九五七年攻擊美國大使館的五·二四事件到最近桃園機場事件，均與共黨無涉。因此，為對付共黨威脅而長期戒嚴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環繞著二·二

八事件的前因後果所造成的族羣裂痕與官民鴻溝。長期戒嚴統治對社會、經濟生活雖無大礙，但卻阻塞了政治發展的生機、滯延了民主改革的過程；同時，國府軍事當局從四〇年代末期開始，假借戒嚴令大興政治獄，繼續囚禁或處決二·二八事件涉案者及其他政治犯，也在相當程度上剝奪了民主化運動所需的政治動力和知識資源。

二二八事件並非無可避免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幾點重要的反思：

第一，二·二八事件不僅是一個暴力抗議事件，更重要的是一場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運動；與事者不僅是一般民衆，更涉及為數衆多的本地政界精英（民意代表）和知識份子。當局在暴動平息之後以大軍壓境，進行大屠殺、大鎮壓，其目的不但是要對民衆施予威嚇和報復，而且要鎮壓本地人的民主改革勢力。後者對於四十年來台灣的社會及政治發展，具有特別深刻的涵義。

第二，環繞著二·二八事件的抗議運動和改革運動，均與台獨意識無關。然而，此後台獨意識及運動的出現，卻是種因於陳儀當局的專制腐敗統治和歧視本地人的政策措施，以及在二·二八事變後堵塞民主改革之門，並以大屠殺、大鎮壓激發族羣仇恨，進而造成民族分裂的危機。時至今日，台灣的民主運動仍然擺脫不了台獨運動的陰影，改革意識與分離意識糾纏不清，而不能像其他國家那樣，在民族一體的前提下謀求民主改革，追根究底，與二·二八事件及事件前後的一連串失政、暴政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第三，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族羣矛盾和官方對本地人的不信任感，是長期實施戒嚴及排斥本地人參與權力中心的主要因素之一；七〇年代以來族羣矛盾的逐漸緩和，為解除戒嚴及擴大本地人

參政創造了條件。從這個論點來看，一般把當前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及本土化歸因於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壯大的觀點，看來只有一半道理。強調這種觀點的人，有意或無意地迴避了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特殊政治因素和族羣因素。

第四，近來美國學界有人撰寫重新評估二·二八事件的著作，作出了任何官員於一九四五年到台主政都不能避免二·二八事件的結論。筆者認為這種論斷除了替國民黨卸責以外，並無任何歷史研究的意義可言。在紀念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的今天，國民黨當局切莫以「二·二八事件無可避免」自我安慰，以逃避對該事件的歷史責任，而應該以嚴肅的心情反省一下：如果當年中國的執政者能從民族的長遠利益著想，體察殖民地台灣的特殊情況，提出「台人治台」的前瞻性政策方針，任命一位具有民主素養的行政長官（例如吳國楨），並選派一批廉能的軍政幹部赴台，輔佐行政長官推行台人自治，則何止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今日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說不定還可以提早一個世代實現！「後見之明」雖無補於糾正歷史的錯誤，但歷史的反省卻有助於惕勵來茲！

彌合傷痕謀求民族再團結

最後，我們必須談到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問題。該事件肇因於陳儀失政，天怒人怨，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此為國府責任之一。當年事變後國府蔣主席允諾不對台民報復，然而不旋踵即屠殺民衆數以萬計，罪魁禍首陳儀及彭孟緝不但未被究辦，反而同獲榮升重用（陳儀調升浙江省主席，其後槍決，係因裡通中共，而與二·二八事件無關），此為國府責任之二。事變平息後，國府不但未作公開檢討，反而發動輿論界將該事件抹黑為「少數奸黨」、「無知流氓」的暴動行爲，並令全省各縣市參議會通電國府領導人，譴責

二·二八事件，感謝國府派兵「除暴安良」；國民黨報紙社論甚至指責該事件為「日本教育的迴光返照，日本思想的餘毒從中作祟」（註15），顛倒歷史事實，此為國府責任之三。事變中死難同胞數以萬計，至今猶未昭雪平反，對遺屬亦無分文撫卹；其中冤情最著者，包括光復當時籌備歡迎國府最力的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及其二子張宗仁、張果仁，竟未經法律程序而被國府軍方槍決於花蓮公墓旁；而林茂生（台大文學院長、國民參政員）、林連宗（省參議員、制憲國代、律師）、王添灯（省參議員）等二十餘位知名本土領袖，被捕後失蹤，屍體下落至今未明，此為國府責任之四。

值此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也正是國府決定解除戒嚴、大力推行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的時刻，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先賢先烈，其夙願得償，然冤屈未直，子孫代代相傳的仇怨，更是綿綿無絕期；二·二八的陰影，仍然籠罩在許多人的心靈，妨礙社會的和諧與民族的團結。國府領導人在努力推動歷史的車輪前進之際，也應該對四十年前的重大錯誤作一個明白交待。因此，筆者建議就上述四項責任予以公開檢討，並為死難同胞——特別是張七郎、林茂生、等有名有姓的先賢先烈——昭雪平反、立碑公祭，以示對歷史負責的光明磊落態度。

同時，海峽彼岸的中國人也應與台灣的人民一起省思：二·二八事件雖然發生於當年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但事件所造成的創痛，卻一直由中國全民族在承擔；如何彌合未癒的傷痕、放下歷史的包袱，以謀求民族的再團結，是全體中國人在紀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之際，所應共同深思的課題！

【註解】

註1：據調查統計，當時省府行政長官、秘書長、處長、副處長、主任秘書共廿一名，其中台灣人只佔一名，其餘廿名為外省人。省府

各處秘書、專員、科長、股長、視察、主任共三百十六名，其中台灣人只佔十七名，其餘二百九十九名為外省人。參見李筱峯著「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一九八六）第一八四——一八五頁。

註2：楊肇嘉在其「回憶錄」中（第三六四頁）提到，他曾於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半年「到中央請願」，但當時他在大陸，不在台灣。

註3：參見鄭梓著「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台北一九八五），第三六——三七頁。

註4：參見鄭梓前著第三八頁。

註5：參見李筱峯前著第二〇〇——二〇一頁。

註6：參見李筱峯前著第二〇一頁。

註7：參見韋名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香港一九七五），第六四——六五頁。

註8：參見李筱峯前著第五章第二節。

註9：參見林木順著「台灣二月革命」（一九四八），並參見李筱峯前著。

註10：參見 HILL GATES, "ETHNICITY AND SOCIAL CLASS", IN EMILY AHERN AND HILL GATES, ED.,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STANFORD 1981), P.269。

註11：參見戴國輝編「もつと知りたい…台灣」（東京一九八六）第六三頁。

註12：參見陳誠著「台灣土地改革」（台北英文版）第四七頁。

註13：參見 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1965)，並參見 HUNG, CHAO TAI, LAND REFORM AND POLITICS (1974), P.85。

註14：參見「台灣青年」（東京出版之台獨機關刊物）一九七一年五月號所載「二·二八——台灣歷史的轉捩點」一文。

註15：參見李筱峯前著第一八二頁。

本文發表于「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紐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不要替歷史戴面具

——評對「二二八」史實的歪曲

撰文／李哲夫

「歪曲」史實，並不必指捏造不存在的事實。而是在複雜的歷史的人與事之因素當中，選擇部分來強調，或掩蓋某部分，作以偏概全的處理。為什麼要歪曲歷史？政治動機常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台灣史上，二·二八事件是個最大的諷刺，四十年來，國民黨政權殺害、逮捕和流放有關的歷史見證人，以政治迫害使得二·二八史實變為一個白色恐怖的政治禁忌，這是不可原諒的。

如果四十年後的今天，在台灣統治政權仍堅持對二·二八此一歷史事件的敏感，不願去正面對待，或仍以歪曲的態度來處理，則台灣當局仍犯有嚴重的封建主義，認為國民黨政權的基礎是一脈相承，始自接收台灣起，站在同一個陣線上不變。從這個觀點看來，目前國民黨政權所採取的一些相對較開明的措施，就變成表面上的因應局勢，而統治者自居的基本心態，仍未有些許動搖。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發展以及事件後的處理都有其相當複雜的背景因素。例如：

- ▲戰後經濟百事待舉，亟需復原的情況；
- ▲政權轉接當中台灣人民所需的調適；
- ▲與大陸長久隔離而產生錯誤的期待；
- ▲大陸接收人員的良莠不齊及軍閥作風；
- ▲國民黨官員的封建官僚主義；

- ▲大陸上國共內戰的波及；
- ▲國民黨內特務派系的傾軋；
- ▲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風潮；
- ▲美國對華政策的徘徊。

以上以及其他因素對事件發生的影響，都有待日後對史實公正、冷靜的分析整理。由於台灣特殊的政治原因，二·二八這段史實，顯然在台灣歷史教材上形成了一個斷層。四十年過去了，我們必須改正過來，尊重人民對自己歷史「知」的權利。

下文主要是以政治動機所向，來分析現存對二·二八事件的三個論點，以及它們對史實的歪曲。藉對現存觀點的置疑，期能達到較客觀、較全面地對待歷史的正面作用。

「奸黨叛亂」論

傳統的封建統治者，遇到反對政權的運動，就方便地指是「少數」「奸黨匪徒」的「陰謀」，避免正面承認民怨，自慰說多數的人民為支持政權的善民。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年半之間，從陳儀以行政長官公署接替日本的總督府，公賣局代替專賣局，接收大員之貪污腐化，對台灣籍人士之歧視，並且在戰後經濟困難之下，運走台灣的米、糖、煤等物資等，在在都引起台灣人民的憤懣。當局的政策錯誤，以及執政的無能等，是不能迴避的重要起因。但是，在台北事件爆發的第二天，即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駐台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日記上這樣寫道：「『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這是論語上的話，我自己這樣想，本省政治的失敗，並不是政策上有什麼錯誤，或者人事上的不臧，而完全是這『信』字沒有樹立。本省同胞，因為尚缺乏中心思想，又沒有國家觀念，對國家的一切都沒有信心，所以一切的施政，他們都以為是

壓迫，是虐待。一切的誤會都從此而生。」

這種統治者的偏見，不幸地伏下了日後大屠殺、大逮捕的基調。更不幸的，這不是一個個人的偏見，當時的南京政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於三月十七日到達台灣「宣慰」，其對台胞廣播詞裡，有如下言語：「此次事變的原因，即是台胞青年過去受日本狹隘偏激的教育，由於日本對殖民地所施奴化教育的遺毒，不正確的思想，不了解國情，以致輕視祖國政府人民和軍隊。近因即是受少數共黨份子暴徒浪人的煽惑脅迫，台胞青年羣起盲從，造成叛變，使社會不安，人心惶惶。這反動派的野心，是要顛覆政府，奪取政權。」

如果上述原因站得住腳，白崇禧怎麼沒問說，在他到台灣之前所派的「旅京滬台灣代表團」所組織的先行隊，包括今天仍健在的廈門大學陳碧笙教授（福建人，非台籍）等十六人，他們乘國防部派的專機於三月十一日到台灣，從機場開始到旅館裡，前後十一小時受緊密監視，然後被迫原機回南京。這是為什麼？陳儀長官要隱瞞什麼呢？

當時隨代表團的記者，記載了下列事實：「吾們到達台北，是在十一日下午五時。到了台北一看，完全充滿戰爭氣氛，酷似當年虹口被日敵封鎖的情形，路上沒有行人，武裝軍憲滿佈崗位，軍用卡車上裝著機關槍梭巡示威，商店和居民都關上了大門……陳長官命令新到的軍憲，嚴查行人，大街上如果四、五個人在一起走，即被開槍射擊。……」根據這些觀察，這位記者問了下面一個問題：「中樞（即指南京政府）要用政治手段和平處理，陳儀硬要用武力解決，中央派大員來台宣慰，陳儀有何權力和理由可以違抗，將先遣人員趕回南京去？」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在四十年後深思。如果陳儀當時違背了中央的旨意，為什麼當他被調離台灣時，是接任了浙江省省長呢？另外，白崇禧以國防部長的身份，派了先遣隊，受

到在台十一小時那樣的待遇，他自己到台之後，所採取對事件的態度，仍與當時長官公署的報告，如出一轍呢？陳儀的長官公署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發佈「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記要」，稱這事件的遠因為：(1)潛伏奸黨的死灰復燃，(2)「御用紳士」及歸台浪人之煽動，(3)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4)戰後經濟問題之刺激。近因則是：(1)經濟風潮之刺激波動，(2)特殊階級之陰懷怨恨，以及(3)不法份子之勾結蠢動。」

欲了解上述歷史文件上的用詞，就必須也認識到一些當時的史實。所謂「御用紳士」以及「特殊階級」原是陳儀在大陸援兵未到時所妥協的對象。由陳儀答應，官民共同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在三月一日成立。待到三月七日，處委會提出卅二條處理綱要時，許多複雜因素的介入，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了。

原先由王添灯起草的二·二八處理綱要提出卅二條綱要，求其內容不外(一)不要擴大武力鎮壓，(二)台灣省政治正常化，並改革實施民主以及高度的自治。在三月七日下午三時半提出時，在台北中山堂開會的成分，已經有許多是特務佈署混入的，當時會場秩序嘈雜，特務趁機提議一些激烈的意見，追加十條綱領，諸如「撤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反對國軍駐台，陸海空軍應由台人充任」，「釋放戰犯漢奸」等。這些追加的綱領是特務陰謀栽贓，為陳儀後來的恐怖鎮壓，埋伏了藉口。因此，在長官公署後來的事件報告裡就說：「故利用機會，以要求改革政治為烟幕，進而逐步發表其叛亂之言論，由所謂『高度自治』而變為叛背國家脫離祖國之獨立主張，其陰謀毒計，至是真相畢露。」

在二·二八有關的文件史料當中，所謂「叛背國家脫離祖國之獨立主張」是絕無僅有，溯源於這個長官公署的事件報告。對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指謫，可能是當時南京政府，在大陸內戰自顧不暇，仍派兵鎮壓台灣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來從封建統治者的眼光看，人民要求高度民主自治就形同於「叛背」「要求獨立」。最不幸的是，此後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政府」退居台灣彈丸之地，爲了維持中央的「法統」，對二·二八事件史實的歪曲，混淆民主自治的要求與獨立的主張，就不能不有意無意地沿襲下去了。因爲在全國以及全省的兩級政府完全重疊的現實情況下，要求全省的自治，等於是架空了國民黨的中央政府，不能也。在這個政治現實仍未改變的今天，以國民黨統治台灣的立場，對二·二八史實這樣的歪曲，是不能改變的，有例爲證。

最近流傳一部準備應二·二八四十週年出版的書，提名爲「十四天與四十年：台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這初稿是由台灣來與國府有關的兩位學者，在史丹福的胡佛中心合作編寫的。作者在這本書裡提出對二·二八事件起因的「新理論」，這新理論的要義竟然與當年「行政長官公署」的報告總結，大同小異。他們認爲當時陳儀帶至台灣的大陸官員，即使誠心誠意，要做好統治台灣的事務，也會照樣碰上不幸的誤會，就如希臘「悲劇」一樣，是令人同情但不能歸咎於任何一方的。他們說，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尤其最後幾年大戰期間，日本殖民者爲了動員台灣人參加，給予台灣人民相對地與日本人地位較爲平等，以致台灣人在政治上的期待較高，在回歸祖國時，更想要參政，當權當官了。而從大陸來的官員，首先對「看起來不太像中國人的台灣人」大爲驚訝。認爲台灣人沒有當政經理的人才，思想上也需要一段時間的再教育，所以不能廣招台灣人入圍台灣的管理事務。台灣的士紳階級則因此大爲不滿。再者，台灣人不能同情大陸上的內戰所需，不滿接收大員運走台灣的物質資源；而大陸來的人自認八年抗戰的犧牲，解放了台灣，台灣人民怎能不感激，反而抱怨？顯然，這些史料根據大多來自國府官方資料。至於其他有關二·二八事件後的鎮壓，系統性地殘害台灣人民的菁英，以及當時國民黨內中統、軍統

238.

的特務派系間在台灣鬥的矛盾等，此書的作者就「方便地」給遺漏掉了。一旦此書印行問世，是亟需對台灣史有研究的學者，嚴肅地予以批判。

「外國干預」論

二·二八事件是否有外國力量的因素，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是究竟有多少影響，則另當別論。一味地誇張外國干預的因素，是爲統治者供給鎮壓的藉口。相反地，也給主張分離主義者增強幻想。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時，以及後來的發展，美國駐台的領事館予以密切注視，並透過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報告到美國國務院。

當華府郵報（三月七日）呼籲參與日本和約諸國，將台灣管理權移交聯合國，或從中國收回台灣時，他們針對羅斯福總統同意將台灣交予中國作了批評。可見當時美國執政是不願插手台灣問題的。從美國國務院檔案當中，也曾經有在台領事接受簽名請願書一事，請願要求「改革台灣省政府最快的方法是由聯合國參加台灣的行政，在台灣還沒有獨立之前，先切斷台灣和中國本部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但事實上，國務院沒作什麼指示。甚至在二·二八事件後，一些人要求透過駐台領事館向外發佈消息，都沒給接受。領事館沒有國務院政策的指導，仍謹慎保持中立。縱使有一些領事館有關的人員，在部份台灣人中間，從事活動。也只看是個人行動，未必代表美國官方的政策。

遲至一九五〇年一月，杜魯門總統仍強調美國應尊重波茨坦宣言，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並且不干預中國的內戰。這個中立立場是一九五〇年夏天，韓戰爆發而突然改變的。理由是，共產黨佔據台灣將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等，因此而派第七艦隊駐巡台灣海峽。這說明了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美國雖有人道主義式地關切到台灣

人民受到腐敗政權的迫害，但在支持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政策下，並未採取什麼積極行動；雖然有些主張分離台灣於中國的意見，但也沒有造成氣候。反而到了一九五〇年，在反共政策下要圍堵中國時，才在台灣有效地保護了國民黨政權。畢竟美國的外交仍以戰略政策為主，人權問題次之。

「革命起義」論

二·二八事件的當時，在台灣的知识份子當中有少數的進步份子。在台灣的地下黨也才成立一年左右，說不上策劃什麼民主起義。當時政治領導的主流應歸於在台灣中產階級，及有專業的精英，尤其是各階層民意代表，國大以及省市參議員所組成。形容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仍以「官逼民變」較為適切，而中產階級知份子所循的策略戰線，仍主要是和平方法，要求民主改革，地方自治。並且相當部份的人，因為對大陸國民黨政權缺乏了解，仍是寄望南京的中央政府能體諒撫卹，並沒有明顯地要全面性地打倒國民黨政權。

這樣的觀點，當時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三月八日向台胞廣播時，也確切地認識到：「如果略為溫習抗戰勝利以後台灣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台灣的自治運動完全是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迫出來的。……台灣人民的要求是極其平凡的，不過是要自治，廢除專賣制度，要台灣人民能在台灣當行政官吏等而已。」

可是後來，中共為了適應對台政策的需要，對二·二八事件也作出較不確切的曲解。例如一九七五年在「二·二八起義二十八週年座談會」上，廖承志這麼說：「一九四七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在全國整個革命形勢發展的鼓舞下，有著反帝愛國鬥爭傳統的台灣省人民，英勇地發動了『二·二八』武裝起義……。『二·二八』起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一環。」這樣過份強調中共對二·二八的領導，不僅不符合史實，也給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人民，要談論、整理二·二八有關的史實，徒增不少困擾。

四十年過去了，也許中共中央對台灣問題作了較細心的回顧，或因為現時局勢所需提出的「高度自治」的對台政策。過去對二·二八事件的週年紀念，都以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物來主持。聽說今年在北京召開四十週年紀念，將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包括許多時參與其事的人物來主持，中央領導以及其他黨派是受邀參加的。我想這樣的作法，是較開明，較恰當的。

歷史是人民的

對於史實的歪曲，如上述三種偏向執政當權的利益觀點，不僅不能汲取歷史教訓，鑑古知今，反而誤導後人，包括之後成長接班國民黨當局的第二、三代人。沿襲「奸黨叛亂」論者，以及強調「外國干預」論者，無非是延續封建統治者唯我獨尊的心態，對於民間持異議者往往方便地劃為叛黨或甘受外人利用的走狗，進而以此類標籤來進行政治迫害。堅持中共領導的「革命起義」論者，也徒給台灣人民要求民主自治的主張增加困擾，在台灣當局反共的藉口之下，要求台灣人民當家作主，也被指定為中共統戰的同路人。

時至今日，事件已經四十週年，台灣國民黨當局仍未採取任何有效行動，開放歷史檔案資料，使上述三種論點以外的史實公諸於世。顯然，如上述歪曲史實，進而沿襲誤導歷史的教訓，仍然是適合國府當局要在台灣維持其統治者利益的。

更具諷刺性的是，對於事件取「奸黨叛亂」以及「外國干預」

的歷史論斷，也正好給當今主張分離台獨的「情結」作為正其名的註腳。當時，台灣人民要求民主自治，在陳儀所代表的外省藉政權的眼光裡，被視為叛逆，陳儀對於「處委會」的妥協，最終證明是緩兵之計。四十年後的今天，這個省籍對立的陰影，仍然是相當部分台灣人士懷疑大陸政權，對統一政策不信任的依據。而強調事件的「外國干預」因素，促使台灣的「民主」問題與「民族」問題更形混淆。偏激主張分離台獨為最高目標者，終歸擁抱「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民族」論等口號，來證明外國干預的正確性。這些形勢與趨向，又意外地，或者不意外地，與當前台灣當局在兩岸問題上採取的反共拒和的政策，有異因同果之效。

今天我們紀念四十週年，對史實清楚公正的交代的要求，遠超過事件本身的意義。回顧台灣近百年來的歷史，一九四七年的事件正處在前五十年日本統治台灣與大陸隔離，以及後幾近五十年國民黨據台與大陸對峙，兩個時期間的軸心是短暫的四年台灣與大陸直接交會的經驗。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文化與民心取向是什麼？這些問題應該是亟需研究台灣的歷史學者填充空白的。有了更充分關於台灣人民的史料，對於事件的歷史研判自然會是比較公正的。

本文原發表于「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紐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是個結束，也是個開始

——主辦二·二八紀念研討會的一些感想

撰文／葉芸芸

有關「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的報導與反應，此間華文報刊已有很多。因為「台灣與世界」是本會的主要負責單位，本文專就研討會的籌備、經過和感想，向「台灣與世界」的讀者、作者做一個簡短的報告。

籌備工作是去年九月份開始的，經過幾次討論，決定重點在於邀請歷史見證人與學術研究者共聚一堂，期能對此不幸歷史事件有嚴肅的探討，構想與歷來海外舉辦的控訴傾向的「二·二八紀念會」有所不同。因而，籌備會的公開邀請函，對研討會的主旨，做如下的闡明：

台灣「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會，即將來臨。這個不幸的歷史事件，對一個世代以來，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舉凡省籍的矛盾，政治的迫害，台灣人民運動的興起，……等等，無不與「二·二八」有密切的關係。時至今日，「二·二八」的歷史傷痕，仍然沒有完全癒合，「二·二八」的陰影仍然籠罩著許多人的心靈，妨礙著台灣社會的和諧與團結。

然而，經過四十年時光的流逝，今天我們應該以冷靜的心情和坦然的態度來省思這個影響台灣歷史進程的事件。我們認為有必要撥開感情的迷霧，積極正確地認識歷史，汲取教訓，藉以謀求和諧、團結及合作，共同締造美好的將來。

因此，我們計劃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廿八日及二月一日兩天舉行

是個結束，也是個開始 · 243

探討性的紀念會，回顧此一歷史事件。凡對此歷史事件能作學術探討的學者、當年與事的歷史見證人，以及想對「台灣情結」中的「二·二八」因素進一步澄清、作一個總結的人，都歡迎來參加，共聚一堂認真探討「二·二八事件」的起源、經過及其對過去四十年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衝擊，以及如何放下此一歷史包袱，往前邁進。我們覺得，台灣的光明前途，必須建立在熱愛台灣、而又能立足台灣、關心中國、面對世界的共識上。

演講人的邀請工作，是籌備過程中最費周章的部份，尤其是考慮全面性與平衡的問題。然而，如今健在的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大多事後出走大陸，並在那兒定居至今，這是歷史的現實；幾乎所有我們想到的居留大陸的歷史見證人，我們都邀請到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和「台灣同胞聯誼會」並資助他們旅費。事件後四十年的台灣，「二·二八事件」還是極為敏感的話題，我們向台灣島內人士的邀請工作很不順利，所幸能請到一位歷史見證人——周合源老先生，和一位學術工作者——蕭新煌教授。定居在北美洲的幾位重要歷史見證人，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沒有接受邀請；其次，我們也邀請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海外人士對事件做一理性的現實分析，這方面得失各半；我們感謝來參加而有堅定立場的人，而遺憾有人因所謂「立場」而不參加，原接受邀請的謝里法、呂秀蓮、陳芳明等三位，在最後又退出研討會；也說明海外的「台灣政治」環境現實，是存在著一些難以超越的格局。

我個人對這個二·二八事件的「紀念研討會」有比較強烈的願望，我期待「四十週年」是個結束，同時也是個開始。就「紀念」而言，希望這是最後的祭奠，對不幸歷史事件的所有受害者——無論是台灣籍或大陸籍，祝福他們的心靈自由，從此不再背負歷史傷痕的創痛或包袱。就「研討」而言，希望是客觀學術研究的開始。

四十年前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富於爭論性的一段歷史，僅

由一次研究會，絕無可能得到什麼結論的；雖然如此，做為一個開始，這次研討會上所提出討論的一些觀點和問題，是可以做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與題目；因而，在此整理出來做為參考：

(一)事件的時代背景。事件發生一九四七年，二次世界大戰方結束不久，世界秩序重整，美蘇爭奪勢力範圍的冷戰方興未已。台灣不僅面臨本身經濟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又直接受到大陸國共內戰的波及。

(二)文化差異的問題。戰後回歸祖國的台灣，因為歷史上的特殊經驗——移民社會與受日本殖民統治，確實與大陸有一些文化的隔閡。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曾運用教育、法治的方法，嚴密制約著台灣的人民的社會日常生活；雖然如此，絕大多數的台胞，在歷史文化傳統上認同大陸，以中國人自居是毋庸置疑的。把文化差異的問題解釋為台胞受日本奴化教育，是推卸責任的說法，也無法合理說明，光復當時的台胞熱烈歡迎國民政府，學習國語、研讀三民主義那種認同和效忠的表現；矛盾呈現在台胞的愛國熱情所得到的回應——代表祖國的部份貪官污吏，以「征服者」的姿態君臨台灣。就社會和諧而言，文化差異非不能克服的問題，政治不得人心才是社會和諧的嚴重障礙。

(三)轉換中的社會結構。戰爭結束後的台灣，無論政府或經濟都處於轉換時期，等待南京國民政府來取代日本殖民統治；但是在國民政府接收人員抵台前，台灣人有過兩個月「自治」的體驗，參與政治的要求很高，不過本土力量的組成極為複雜，粗略可分為(1)戰前的抗日民族、社會運動人士；(2)戰前與殖民者合作的歸順者；(3)海外歸僑——包括一般僑民、被日人強迫徵召到南洋、大陸當「皇軍」者，以及曾到大陸投效國民政府抗日的「半山」；(4)一般沉默的大眾。再加上，南京國民政府派來的良莠不齊的接收官員和軍隊，如此複雜的社會組成其利益與矛盾如何？事件前、事件中，這

些利益與矛盾的互動關係又如何？

(四)陳儀的評價問題。這是台灣人最難抽離感情來看待的問題，但籠統地，把事件的責任歸罪於陳儀，也是過於簡單的看法。無可置疑，事件係因陳儀失敗而起，更有必要進一步探究，陳儀在台灣一年半的統治，他的行政班底的人事組成？國民黨內的權力派系在其間的因素與比重？行政長官公署和日本總督府的職、權、統治的比較？尤其是經濟政策，沈仲九為何主張保留專賣制度？亟待重建的戰後經濟，在短短一年間演成瀕臨崩潰，其功過如何？

(五)羣衆抗議與改革要求。由於政治上的方便與需要，四十年來事件被指陳為奸黨叛亂、革命起義、獨立建國或帝國主義干預；這些不同論點，彷彿在平行線上背道而馳，時快時緩，有時被放大，有時被縮小，甚或染紅添綠的；然而，歷史真相的挖掘，卻往往需要一份「平常」或「合理」的心。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有其客觀環境的必然性——政治腐敗、經濟惡化；也有其不幸的偶然性——緝毒事件引起暴動。事件的發展，是羣衆抗議暴動在先，而社會菁英、智識份子組織要求政治改革隨後。

(六)事件的處理與影響。事件能否避免？這是很有爭論的問題，惟不具有現實意義；南京國民政府與陳儀對事件的處理，影響既深且遠，省籍矛盾、分離意識皆衍生於此；衆所周知，事件其時，本土民間並無台獨分離意識，「處理委員會」所提要求，也無非政治改革而已。事件後，雖然蔣介石有「不許報復」的訓令，但全島各地大軍壓境，不僅暴動人民被殺害，倡議改革的社會菁英和智識份子階層，也大批被捕殺，似是有計劃的剷除要求改革的本土政治力量，甚至其後的「土地改革」，也可視為鎮壓的延續。

(七)彌合傷痕。不幸歷史事件的創傷，影響四十年來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創痛籠罩兩個世代的心靈，台灣籍與大陸籍同是受害者；再下一代人，還要他們繼續背負嗎？彌合傷痕是這一代人殷切

的願望，解鈴還需繫鈴人，值得台灣當局深思再三。歷史悲劇會不會重演？也是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疑懼，北京當局如何思考此課題？讓歷史的歸歷史，只有透過對歷史真相的了解，人們才能省思，才能汲取歷史教訓。

原載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七年四月

後記

撰文／葉云云

二·二八事變發生時，我還未滿兩歲，談不上有任何印象。但是，隱隱約約地，「二·二八」這個名詞或陰影的確伴隨著我成長的。

小時候，父親的書房，對我就好似探險家的金色非洲草原。書房裏有一個加鎖的書櫃，最是讓我好奇，裏面大部份是魯迅、巴金、冰心、郁達夫……等三十年代作家的書，還有一大本二·二八事變的剪報。記得是小學四年級的暑假，父親由書櫃裏拿出一本冰心的「寄小讀者」讓我讀。這以後，我常常偷開書櫃找書看，最吸引我的好像是巴金的小說，中學時，我曾偷偷地把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借給同學傳閱。

魯迅是父執輩常談起的作家名字，父親年輕時代最崇拜他，據說在任「台灣民報」編輯時，父親曾經刻意模仿魯迅的文筆。中學時代的我，無論是讀魯迅的雜文，或巴金的小說，其實都是一知半解的，翻看那些書想來也都只是好奇罷了。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那本厚厚的二·二八事變剪報，我卻從不曾去翻閱過。雖然，我很喜歡那位常來家裡賣花的「陶姐仔」，也知道她的先生「貴伯仔」就參加過二·二八事變，當時還被關在火燒島。

真正接觸到二·二八事變的文獻資料，還是到了美國以後，說得準確一點，是十五年前到耶魯大學時，我的先生在那兒唸研究所，我游手好閒，常在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流連忘返。

圖書館裏找得到的「二·二八」文獻資料其實不多，結集成書的更少。有的史料甚至遭到有意的損毀，我曾爲了找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新生報」而大費周章，雖然美國許多家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都有收藏「新生報」的縮微影片，但是，絕大多數都獨缺了一九四七年三月份。

史料蒐集的困難是可預見的，大部份文獻資料立論之簡單化與絕對化才是最困擾人的。我竟發現，自己很難被那些文獻所說服。慢慢地，我才理解，完全依靠文字記載的所謂「史料」，要去認識、解釋複雜多面的歷史，其實是相當危險的。文學畢竟只是少數人選擇使用的表達工具，同樣地本書的受訪者與作者，也只是二·二八事變的一部份參與者，見證者或研究者。

在這本集將要出版的時候，我特別懷念家父葉榮鐘以及蘇新先生。他們倆人並不是深交的朋友，但是，這兩位已謝世的前輩，一生的軌跡與台灣近代史的變遷是雷同的，他們都出生于日本領台之初，青年時代都投身抗日民族運動，壯年之時才脫離日本殖民回歸祖國，儘管這兩個人的政治理想並不一致，二月事變同時摧滅了他們成爲有自主尊嚴的「公民」的追求。從此，他們分別在海峽兩岸渡過挫折、抑鬱的晚年。意外地是，蘇新成爲我所訪問的第一個二·二八事變的歷史見證人，我卻不曾仔細聽過父親說他事變中的經歷，他甚至不知道我在從事這項工作，這仍然是我的遺憾。

我希望借此感謝兩位忘年之交的朋友——胡鑫麟先生與戴國輝教授，多年來不吝地與我分享他們的智慧與經驗。若是沒有文典長年的鼓勵與批評，這份工作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陳映真先生和人間出版社的催生，本書乃得以和讀者見面，在此深致謝意。

葉芸芸 于華府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日

證言2·28

主編：葉芸芸

封面設計：陳映真

出版者：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陳映真

社長：陳映和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91-9號5F

電話：(02)3222357・3222358

郵政劃撥：1008791-0號・人間出版社

印刷：漢陞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79年2月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685號

總代理：流通書報行銷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200元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